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07 年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我们也和总理谈谈心（袁鹰 章诒和 李锐等）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

张劲夫：薛禹谷《微生物驻痕》读后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目 录

新年献辞

- 1 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本刊编辑部

本刊特稿

- 2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温家宝

7 我们也和总理谈谈心

……袁鹰 冯健 高放 章诒和 李锐 雷颐 吴思

怀人篇

- 15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杜瑞芝

- 22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赵德新

亲历记

- 27 1975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陶 涵

- 31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张 彦

人物志

- 36 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申晓亭

- 41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刘仰东

春秋笔

- 46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李 妍

- 52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楚泽涵

品书斋

- 58 薛禹谷《微生驻痕》读后……………张劲夫

- 61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朱 正

往事录

- 65 回忆红二十八军一次未完成的长征……………朱国栋

- 69 我的大学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周 密

- 73 1925年：加拉罕清华演讲引起的风波……………金富军

群言堂

- 75 说文解字话和谐……………雷 鸣 谭举正 王 瑾

一家言

- 76 谁的红色 何来经典……………张 鸣

古镜台

- 78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张绪山

本期执行主编 徐庆全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阔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

● 本刊编辑部

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参加上海人大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温家宝总理在“人大”结束后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胡锦涛的讲话,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只能向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最好的回应,表明了中央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毫不动摇的信心和决心。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共产党的哲学”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人用“姓社姓资”的问题阻遏改革。面对诘难,邓小平在1991年底就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告诫大家,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针对当时企图动摇改革开放思潮所作的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今天,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也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开始暴露,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需要我们不断认识、探索、实践的重大课题。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国庆讲话中,再一次阐明坚持改革毫不动摇的态度,并把改革的方向系统地提升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层面。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

括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等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在诸多方面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带有基础性,在整个改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特殊的相关性,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支持。早在20年前,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今天,改革攻坚进入新阶段,更加凸显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质性地推进政府转型直接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也在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总理的讲话,顺应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

在中国改革推进近30年的历程中,不管是“居庙堂之高”的决策者,还是“处江湖之远”的黎民百姓,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换句话说,改革是每一个人的事情。经济改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否则不会产生这样大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

诞生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大背景下的《炎黄春秋》,走过了15年的历程。15年来,不论社会大环境如何起伏,我们当年创刊时所奉行的宗旨——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始终没有改变,作科学的、民主的改革促进派是我们自然自觉承担的责任。我们一直坚信:社会进步,改革深化,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新的一年自然会有新的气象,但我们办刊的宗旨绝不改变,格调绝不改变,责任绝不改变。我们仍与我们的读者一起,为进一步推进改革而努力!

温总理跟我们谈心

我们也和总理谈谈心

【编者按】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的报告,其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经整理和文字修改,以《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为题,11月28日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次日刊载于全国各大媒体。

温家宝总理这个讲话,反响强烈。我刊一些读者在其它媒体读完后,纷纷来电、来函提出建议:希望《炎黄春秋》转载这个讲话,让我刊的读者都能读到。同时,一些读者在来函中还写来热情洋溢的读后感。我们这里转载温总理这个讲话,并摘选部分读者来信、来诗刊载于后。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2006年11月13日)

● 温家宝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点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讲,可能还要求你们用心创作,用心演出。许多老的文学艺术家,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许多比我年轻的文学艺术家,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心里又感到非常高兴。在座的许多文学艺术家,你们的许多作品我读过,有些人认识,有些人未曾谋面,有些人还通过信。但是,你们不一定很了解我对文学家、艺术家的感情。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个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

为人,喜爱她的作品。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2003年,我到上海看望巴金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太清醒了。我过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吴祖光先生病重期间,把新凤霞先生画的一幅牡丹送给我。我不懂得画,但也觉得好,画如其人,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两年,季羨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龙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天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

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为豪。”很多老文学家、艺术家经常把他们的著作寄给我。比如,周巍峙先生、王蒙先生、乔羽先生、冯其庸先生,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启迪,受到了鼓舞。

和文学艺术家的相处,使我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前年,戴爱莲先生还在世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家宝同志,在50年代的时候,我曾跟周总理照过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屋里,我很想再跟你照一张照片。我说,那好。在教师节那天,我来戴先生家,她约了几位舞蹈家,记得有贾作光先生,在她的家里,谈舞蹈艺术,谈舞蹈史,谈舞蹈教育,谈舞蹈事业的发展。老人侃侃而谈,大家非常愉快。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她病危了。我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她神志还清醒。因为她的英文比中文还好,所以她一会儿说英文,一会儿说中文。我拉着她的手,她本来就非常清瘦,疾病折磨后,显得更瘦弱了。她的声音依然很大。她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我也曾收到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是他们的家属给我送的,这常引起我对他们的怀念。比如,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严文井文集》,严文井同志的爱人康志强同志给我寄了一套。我过去读过严文井同志的作品,这次收到新出版的文集后,再次重读了多篇。我给康志强同志的回信中说:“他的作品和人品就是一个燃烧的火种,留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用来点燃希望的明灯。他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最后这一句,是他作品里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

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没有想到,记者把这六段诗章,连同采访内容用两个版登在《泰晤士报》上,而且中国的五段诗句全部用中文,把作者、文章、年代都注释得清清楚楚,还用半块版登了一幅屈原的水墨画像。在英国居住的华侨告诉我说《泰晤士报》用中文登中国的诗作,还很少见。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心,谈谈我对文艺工作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同大家一起讨论。你们是老师,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过去向你们学习,今后还要向你们学习。

第一,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要”包括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是基础,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满足物质需要,就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要满足文化需要,就要切实发展文化,包括文学艺术。

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真善美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都是重要范畴,我们这里不来讨论。今天我要说的是,从当代中国文艺功能和文艺家实践活动的层面上,追求真善美。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对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长期进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综合产物,是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产物。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追求美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诗。我们说“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就是说要给人以美。中国文化中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在世界上是毫不逊色的。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发现美、创造美,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

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第二,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为人民和国家而努力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真正形成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发展。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

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鸦片战争后,他被流放,途经河南,时逢黄河大水,道光皇帝责令他留在那里治水。他本来就深谙黄河水势,并有一套治水的办法。相传他为治理黄河,每天骑马在黄河两岸奔跑。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一位民间画家把他骑马奔跑的形象画了一幅画。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后,仍然被发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独身西行,从西安到伊犁要走几个月时间,在从西安至兰州的路上,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两句至今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还想起清末的著名诗人,也是外交家的广东人黄遵宪。他曾做过清朝驻日本的公使。《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首诗,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间,曾在演讲时读了这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侬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死了以后,梁启超为他写的墓志铭是“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惟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著名的《国富论》,这为世人所知,但他还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合人情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

胁社会稳定。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对人要有爱的感情。我们讲和谐,就是要讲友爱。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要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爱父母、爱老师,爱惜自己的人格和荣誉。同情心是爱的表现,也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我们必须尊重和同情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树立这样高尚的品德。

第四,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然后,他就很有感触地说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说,希望搞科学的学一点文学艺术,搞文学艺术的学一点科学。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钱老有绘画的历史,年轻时画的一些画,现在流传在国外。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由此,我想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语)。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

文学艺术的成就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内容。文艺复兴分几个时期,开端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家乔托,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和“欧洲绘画之父”。文艺复兴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文艺复兴晚期还出了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国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两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许多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

同志们!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珍惜这样的好时代,理解这样的好时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努力为繁荣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这是温家宝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发表前作者根据记录整理,作了文字修改。)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也向总理交交心

● 袁 鹰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从 1953 年 9 月到 2006 年 11 月先后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 ,我有幸都参加了。第一次是作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列席 ,后六次都作为代表。每次大会 ,都有中央领导同志致祝词或者做报告。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 1953 年周恩来总理对文代会的报告 ,热情鼓励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建设。第二次是 1979 年经历了十多年政治运动加上十年大动乱之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 ,祝词中说 “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 ,从总体上看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 ,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 ,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话不多 ,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多年受屈受辱受残之后顿时有解放感和温暖感。小平同志会上那句关于对文艺创作 “不要横加干涉”的话 ,更是传诵一时。第三次是 1984 年底的第四次 “作代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作的祝词 ,再次强调要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 ,批评许多党组织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等等错误做法。他的话引起广泛的热烈的欢呼 ,有人称之为 “第二次春天” 。可惜那个春天太短暂 ,不久就被寒风冻雨驱散了。

第四次就是今年这次 “作代会” 上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了。本来是请温总理向大会作国内经济形势报告的 ,他却敞开心扉 ,以相当多的时间 ,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 ,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 ,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

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 ,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 ,掌声不断。温家宝总理讲话开始就提到他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和对几位老文艺家的问候。他说曾有一首诗向诗人李瑛同志请教 ,还问 :李瑛先生今天到会了吗 ?李瑛连忙站起身来向温总理招手 ,温总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 ,全场上又为这场面热烈鼓掌。那天晚上 ,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晚会 ,中央几位领导人应邀出席。我的座位正好在第一排的圆桌边 ,家宝同志同我握手时 ,我说了一句 “非常感谢您今天下午精彩的讲话” 。这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客套话。中央领导人对文学艺术界这种有真情实感而又平和亲切的讲话 ,大家许久没有听到了。

温家宝同志援引了自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一连串仁人志士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诗篇和警句 ,激励文学艺术家们加深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 ,特别使大家受到鼓舞和启迪。讲话中很有针对性地说到他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几点希望 ,头一条就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将真善美列



1960 年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周扬等接见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的第一条，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他说：“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他特别指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民去追求真理。”这几句话含意深刻，但是冷静想一想，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当今社会上，包括文坛艺苑，不少地方滋长蔓延着令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歪风邪气：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浮躁成风，斯文扫地，假大空的文字时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上，真正的民声民意遭到漠视和扼杀，真实情况被掩盖、隐瞒、歪曲，遇到这类事，自然就会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慨。文艺工作者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讲真话，就需要坚韧的胆识，需要极大的勇气。凡是有良心、党性强的正直人士，包括报刊电台记者和作家艺术家，对此都会有切身感受。例如，揭露大小官员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钱权交易、欺凌百姓的种种大案，揭露不断发生、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大多数都会受到重重刁难、打击、恐吓、诬告，甚至暴力。但是这些记者编辑和文艺家仍然冲破阻力、冒着危险，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细致地采访、调查、核实，写成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继续公之于众。也就是温总理说的“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温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想必是都能了解的。讲真话，反映真实，表现真情，本不该成问题，理所当然而且应该得到帮助、受到保护的事，实践上却要经历千辛万苦。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

激励，但是不知道对那些玩忽职守、漠视民生、损害国家利益以至草菅人命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奸商企业主们是否能得到警示，有所触动，引以为戒，我实在不敢乐观。因为，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依靠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群众举报也许更有效些。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同志，心平气和地同文学艺术家像知心朋友那样说古道今，在当前举国上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特别令人兴奋和欢畅。他开了一个好的头，倡导了一种真诚、团结、宽松、祥和的风气。文艺工作者，像所有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衷心拥护党、衷心愿为国家民族献身尽力的。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漠视；多一点宽容，少一点限制；多一点温暖，少一点冷酷；多一点帮助，少一点棍棒，不是更好吗？在真正的和谐社会里，文学艺术必然会繁荣，人民群众满意的文艺精品和人才也必然会不断涌现，百花齐放的灿烂春光也一定会到来。和谐和谐，“和”字从禾从口，“谐”字从言从皆，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能发言。就是要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真正地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四句话我们听了好多年，说了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年，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亲身体会到的，却常常是知不能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如果民主受限制，法制不落实，言论自由成空话，何来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呢？

温总理讲话的题目是《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也算是对他讲话的一点反馈，向他交交心吧！

含着三个“真”字

● 冯 健（新华社原副社长）

看到报载由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连读了两遍。我以为，这篇“准备了一点素材、没有文稿”的谈话，蕴含着三个“真”字：

一个是真诚：他真诚地向作家艺术家袒露胸

臆。

再一个是真情：流露出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真情，把作家艺术家视为朋友的真情。

第三是真知：宣示了他在国务政务工作中的一些理念以及实践中获取的真知。这些，正是人

民群众所思所想的。

欣喜之余,不免又生出几点感想:

其一,关于执政为民。

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得去操心。与此同时,他还为农民追讨工资,到传染病医院去看望艾滋病人,去幼儿园给幼儿喂食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糖丸。既抓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也关心草根黎民的安危冷暖,这说明,他真正在践行中央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这理念是一把尺子,在工作岗位上执掌着各种权力的公仆们如若都能以这把尺子来度量自己,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则国之幸也,人民之幸也。

其二,关于“双百”方针。

谈话中说,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解放思想、倡导创新等等。

“双百”方针的提出,盖多年矣。不知怎的,此番听来,却有些新鲜感。纵观我们现今的文化艺术领域,宣传思想领域,有多少执行了“双百”

方针,有多少是有条件地执行“双百”方针,又有多少已经把“双百”方针淡忘甚至抛到了九霄云外?恐非一切尽如人意。

其三,关于监督工作。

新的一年到来了。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监督法。这部历经多年讨论、十几遍修改而后制订出来的重要法律,执政需要,人民需要。

加强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党政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并使之形成合力,这有利于惩治贪腐,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之一句话,通过加强监督,把权力的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这是执政要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北宋力主改革、推行新政的宰相王安石说过:“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监督法是一部善法,企盼在新的一年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不再盛行,而能以“令出惟行”、“法不阿贵”的决断,从严执法,以期国治民安,社会和谐。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 是发展党内民主

● 高放 (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我读后心情非常激动,深感他其实也是同我们社会科学家谈心,备受鼓舞。只可惜我国迄今尚未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家协会这样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否则中国社科联、中国社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有机会亲聆温总理的亲切教诲。

温总理谈古论今,说洋道中,高瞻远瞩,语重心长。他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彩斑斓的时代,“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他说:“中国要

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他把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紧密联系起来,主张要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我以为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切中当今实际的真知灼

见和指针明示。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为何难以再现思想解放时代?唐朝之后我国为何难以再现最文彩斑斓的时代?“五四”以来为何难以持续高扬“科学、民主”旗帜?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以往历史上长期盛行专制统治,缺少民主政治,思想和创作自由也就缺少保障。当今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建设,防止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党同伐异办法来对待不同学术观点,来评判学术上的是非得失,才能真正为学术繁荣创造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是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亲自掌权的民主政治,是维护全体劳动人民权益,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它理应是比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高类型的民主政治。在劳动人民之间,依据每人独立研究和思考,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评判。”在当今我国,可以说如果不加快完善先进民主政治体制,就难以形成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就缺少先进民主政治体制的切实保证。可见,大力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正是当务之急。

温总理博闻强记,视野宽阔。他在“谈心”中还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他列举了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三个英杰以及三个杰出科学家和思想家,还引用恩格斯的话盛赞了这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4至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顺应当时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一场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促进了16世纪以来的经济革命,17世纪的科技革命(以牛顿力学与达德利用煤炼铁为标志),18世纪的政治革命(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为标志),到19世纪完成了社会革命。正是这场持续约六个世纪的六大领域的革命,使西欧北美诸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完成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其中文艺复兴

的思想文化革命起了先导作用,而政治革命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多党竞争的共和制度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这场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成果。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又造成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等等。为解决这些新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为人类指明了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前景。20世纪社会主义首先在较为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开创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列宁第一次提出并且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它包括共产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多党合作民主。由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列宁曾经指望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靠苏维埃政权来加速实现俄国的工业化、电气化、科技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然而天不假年,1924年他才54岁就病歿!随后在斯大林时期破坏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实行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大搞个人崇拜,形成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员特权制等等,加强指令性计划经济和文化专制主义,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带有众多严重弊病,社会科学界一味阿谀奉承,死气沉沉。我们中国党汲取了苏共和苏联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逐步由传统计划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民主政治,贯彻“双百”方针,重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想,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建设也会受到党和政府同样重视。只有以先进民主政治建设为先导,才能加速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只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民主政治与先进文化三者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要按照党中央规定,做好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改选工作,加强对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做好党的十七大代表差额选举工作,争取党的十七大能够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实

行年会制和常任制。因为坚持党代会年会制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实现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规定党代会常任制这是1956年我党八大党章对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当今亟待恢复。只有以党内民主来推进人民民主与多党合作的党际民

主,才能避免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全面成功,完成列宁当年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当为此胜境竭智献议。

关于文人以及艺人

● 章诒和 (学者,作家)

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的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

我现在写信给你们,也是想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这个感受涉及到关于文人以及艺人的问题。

啥叫“文人”?有人说: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我认同这种看法。那些有大学文凭,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那些官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师等等,他们也都会写文章,有的甚至有作品,但他们本质上不一定是文人。

我以为文人原本就地处边缘,是可有可无的一群,自由是他们的底色,追求自由是他们的特性。所以,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可以胡言乱语,可以傲视权贵,可以纵情酒色,可以一掷千金,某些颓唐行为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文人、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像张伯驹的收藏,叶盛兰的脾气,马连良的摆弄小玩意,言慧珠的钻戒、一百多件的毛皮大衣。他们中有人还有恶习,如抽大烟。总之,“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他们这种生活状态,风姿样式,人生观,价值观都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字里、歌咏里、表演里、画作里。梅兰芳一生崇尚的是“美”,他在家,从早上起来就是皮鞋光亮,头发光亮,一派雍容华贵相。所以,他扮演的杨贵妃,才是贵妃。张伯驹说是金融家,其实不会理财。天天游东逛西,应酬唱和,戏院堂会,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文物,唱戏,诗词。但就是这么个散淡之人,在这三个领域都搞出了大名堂,为国家做出

了杰出的文化贡献。他们都去了,却是我们永不消歇的话题,难怪孙毓(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称民国人物为“狂士”,都那么地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

五四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上所说的事往往为我们一些同志所不容、所不齿。有时说文人是落后的,戏班是封建的,科班是反动的,生活是腐朽的。于是清算,批判,扫荡,下放,斗争,戴帽,在被强制化、规范化、驯化的同时,文人艺人自己也开始不得不学着“自查”,“自律”,直至“自觉”。比如,程砚秋在1957年9月20日的入党申请书里对自己一辈子扮演的角色居然觉得是在忸怩作态,甚至觉得干戏曲艺术无意义,向党要求去做有意义的事——这就是说自己一生从事表演艺术是无意义的。读着这样文字我非常心痛。

那时我们国家的文化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对他全部工作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网开一面。批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几大头牌继续可以“抽”,但严格控制。1958年大跃进,所有的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彭真知道后,让他们陆续回城。并说,把手指弄坏了,今后还怎么演戏?北京市文化部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彭真在一次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90多万元(旧币,折今币900元)不干,非要1000多万(旧币,折今币1000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同志们的思想。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就是唱戏的。就是 我

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脚点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显而易见,我以为当年的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宣传文化部门一些领导干部深刻得多。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不错的戏。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张派。这是1949年后唯一形成的京剧流派。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管理文人、艺人,其方法

是把他们纳入“单位”,由“组织”管着,每一个人的头上有中宣部、文化部、省委、省文化厅、剧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层层叠叠且相互关联的各级官员领导着。你的思想,你的工资,你的写作,怎么写,能否出版,你演什么,能否公演,怎么演,谁站当中,谁站旁边,谁给你拉琴,都往往由领导研究,批准。这样管理的结果,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什么叫文化状态,说穿了,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想把中国的文学艺术搞得有点样子,恐怕不是出什么“经典”(我们早已没有经典,原来的经典也快消亡),而是尽可能去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读《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有感

● 李锐 (学者,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

一言堂下众无声,万紫千红春送情。

社会和谐希望在,百花齐放百家鸣。

能否有探索真理的更大空间

关系到中国未来是否光明

● 雷颐 (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温家宝总理的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读了以后有些想法,写给你们。对这讲话,我体会最深的是他谈到的五四运动,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因此,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积极性。目前,中国文化影响力很弱,大家都很关心。

中国怎样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我是搞社会科学的,主要是要求真,这就要有更宽松的环境,例

如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才可以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文化才可能繁荣。

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叫“软力量”。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文化影响力比较弱,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如何提高文化影响力呢?现在中央的政策一是加大投资,二是加大对外宣传。这都是好的。但是,这还不够的,因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更自由的创造空间,宽松的创作环境,这样,文化才能有

所发展和创新,才有生命力。

比如说韩流,韩流是韩国的流行文化,而过去日本是看不起韩国的,但是现在韩流在日本的影响都很大,这是因为韩国在经济腾飞后,有一种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给文学艺术家们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文艺创作者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下就上来了。

如果不创造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空间,探索真理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不能够发展,而且必然会萎缩。因此,我以为温家宝

总理深刻感觉到这个危机,于是才这样语重心长。他的谈话,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担忧,也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千万不要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

魏晋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发展,是少有的丰富多彩,其中的规律很值得探讨。创造一个更民主自由的空间,给人们一个探索真理的空间,这是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的大问题。

国家的理想形象与金规则

● 吴思 (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我认为我们国家很久以来缺少理想。毛泽东时代有理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跃进,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过渡失败了,理想也破灭了。

毛泽东时代之后当然有追求,温饱、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属于穷人或穷国的梦想。一个人整天想着吃饱穿暖,不挨饿,不挨打,能算有理想吗?这些追求都属于物质层面,而且是防御性的,努力达到及格标准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物质方面的,富强梦也是如此。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看到满脑袋这种梦想的人,一门心思赚钱,甚至不择手段,抓紧时间学习各种赚钱本领,再练练武,以免被人打,我们会觉得他有点粗俗,近似经济动物,恐怕不会认为他文化水平高,不好说他有理想有抱负。

温家宝总理这次和文艺界谈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温家宝总理有理想。他说:“我常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

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

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我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我们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在物欲和权势横流的世界,这种理想非常可贵,让我感到很温暖,如沐春风,带着春天温馨的气息。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他非常体谅人,尊重人,经常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用老话来说,这是一个仁义的人,厚道的人。所有文明教化,最终都体现在对人心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之中。政治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民主法制就是对民众的尊重,就是对每个人一视同仁的尊重,就是现代的大仁大义。

所谓精神文明、国民素质、道德力量,这些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衡量其品级高下?这条标准,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将心比心就能找到这些标准。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同情心就是仁的发端。王阳明把内心的仁义标准称为良知。温总理这个讲话提到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道德也是刻在人们心底的东西。这些说法,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心自有一杆秤”。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是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金规则”。遵守这条规则,就要像尊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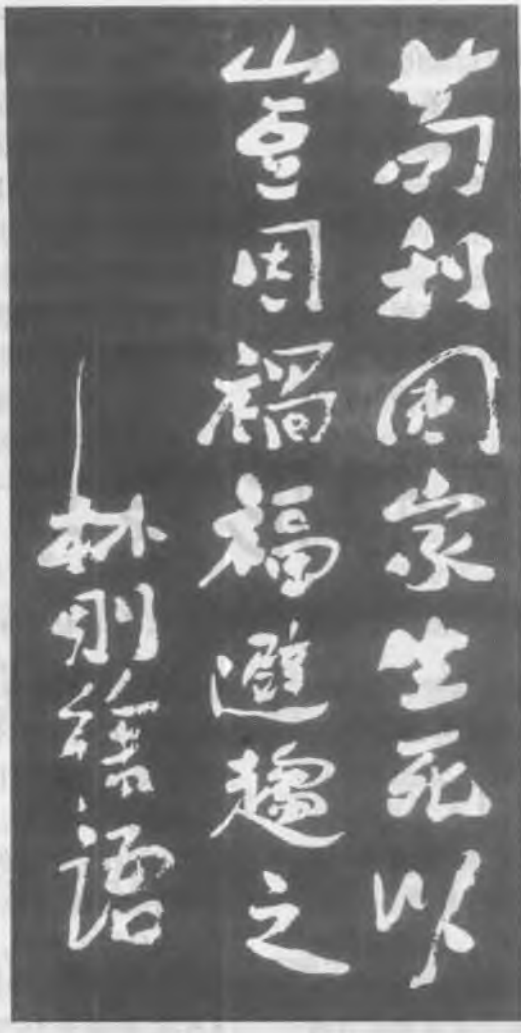
一样尊重别人,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各种平等权利,尊重和这些权利,让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顺着这条路走,就是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走,这样的理想可谓顺乎天、应乎人。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尊重这套道理。反过来,不尊重这个道理,不仁不义,说破天也别想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心悦诚服的尊重。

总之,我认为,温总理这个讲话表达的立国理想,是可以得到世界各民族理解和尊重的理想,也是可以得到中国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理解的理想。我认为这也是分寸恰当的理想。如果理想再伟大一些,伟大到需要人们牺牲的程度,需要剥夺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分寸恐怕就过了,或许这可以成为某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团体的理想,却不适宜成为全社会的理想。

民主法制不仅是目的,不仅是构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形象的核心,还是促进文化繁荣的有效手段。

温总理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总结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思想解放是对作家头脑的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温总理说:“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我认为,这两方面的条件,一内一外,正是文化繁荣和创新喷涌的必要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有什么特点呢?魏晋南北朝是乱世,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思想解放有了可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于是有百家争鸣,而不是罢黜百家,一家独尊。



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读温总理“谈心”后感而书

强汉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汉朝的文化创造,最精彩的不是铺陈张扬的大赋,而是民间的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唐朝最伟大诗人也不是官方御用的。诗仙李白不断在正统之外寻找生活的意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毫无阿谀奉承之色。官方容忍或忽略了这种行为和作品,最伟大的诗人因此有了诞生的可能。

北宋苏轼时代,官方的控制力也不弱,我细读过每一首苏词,这位诗词成就极高的豪放派大家,有一段时间的作品却惨不忍睹。那就是乌台诗案之后的挨整时期,风格委琐,近乎谄媚。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自由的保障,中国历史上最具天才的创造精神也会被权力和小人联手扼杀。

作为一种科层组织,政府的优势在规范,不在创新。政府从事文化活动,主要成就也

是工程性的,体现在可以发挥组织优势的领域,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紫禁城,颐和园,御窑的陶瓷,精美的丝绸等等。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文化地位,哪里比得上元曲、明清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这些民间创造。再往前说《诗经》的精华,就是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民谣。孔夫子也是私人办学的首创者。

中华民族有伟大而强盛的创造力。一旦思想解放和对创作自由的法律保障结合起来,再加上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化创新将获得千古难逢的好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以上这番话,是我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社一个编辑,读了温总理的讲话,又读了许多作者的来信来稿,冒出来的一些想法。

让子孙后代记住 任仲夷这个名字

● 杜瑞芝

任仲夷同志离去，失去一位最真挚的同志，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很悲痛！回顾过去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开怀交心，使我获益匪浅。如今失去最可信赖的兄长，内心的痛楚，谁人知晓？！惟一能做到的是按照任仲夷同志的忠告，多读各家的书，多听各家之言，多想问题，继续发挥余热，又不患痴呆症。一年来，我正是这样度过的。

在纪念任仲夷同志逝世周年之际，让我再次倾诉我对师长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老是“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的楷模

在任仲夷同志病逝前两个多月的2005年9月初，广东省顾委联谊会，组织原省顾委部分老同志去华东参观学习，原定仲夷同志带队，我陪同前往。未料，仲夷同志患病住院，我成了领队。临行前的9月8日，我特地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在华东各地十二天，我天天挂念着仲夷同志。9月22日下午返穗，23日和月底，我又两次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彼此亲切交谈。我还和仲夷同志夫人王玄，一起听医生讲述病情与治疗方案。10月18日我第三次去看望仲夷同志，他已转到重症监护室，谢绝探望了。据医生介绍，已请专家会诊，还看不准，在观察。11月12日，我和老伴李秀文去看望仲夷同志。医生说，他病情严重了，仍在观察。此时，我还在想，仲夷同志那么乐观豁达，相信他会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康复过来，我们又能天天见面，晚上一起散步聊天的。我万万没想到，过后三

天，仲夷同志竟然驾鹤西去，从此永别了。

在仲夷同志家，协助王玄同志办理丧事时，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痛哭了一场。也就在这时，我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要求专访，介绍和任老交往的详情和感受，我当即答应。然而，没过两天报社同志告知，采访任老的报道都不让发表了。对此，我深感遗憾。

仲夷同志说“我的一生很平凡”，这是他的谦虚，事实决非如此。可以这样说，打从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算起，仲夷同志长达七十年的社会经历，可歌可泣。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和国家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阶段，是仲夷同志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一段乐章。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仲夷同志就充分显示其在政治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的大智和“舍得一身剐”，敢为人先的大勇。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揭开思想大论战帷幕第三天，仲夷同志便着手撰写，随后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同年，他还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这篇针对性、战斗性更强的文章，提出与华国锋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正因为如此，仲夷同志成为参加全国思想大论战，批判“两个凡是”，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我



1984年任仲夷在广州(梁伯权摄)

国处于两个历史转折关头，仲夷同志均被赋予重任：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他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期间，他冒着政治风险，伸张正义，为当代奇冤张志新平反昭雪，震撼全国。二是在1980年11月，他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担纲、领航，历尽艰辛，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为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开始搞活经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带了个好头。我把仲夷同志的生平业绩，概括为“三立”，就是立德——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立言——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坚持与时俱进，常有富于哲理和深度、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的创新；立功——千方百计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仲夷同志是“三立”的楷模。

给“包”字划上句号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以“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应当说，相当复杂。主要是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

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在省、地和农口部门领导中，往往形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对农民，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硬纠硬扭，越扭农民越不接受，越纠搞“双包到户”和所谓单干的就越多。作为主管农口的省委领导，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因为我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曾受到某些领导的责难，是有压力的。好在到了1980年11月，仲夷同志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众所周知，仲夷同志思想解放，很能坚持实事求是。仲夷同志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在1981年1月22日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用搞了“双包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更密切了；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他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仲夷同志的总结，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打上了句号。诚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仲夷同志的讲话后，有位县委书记忿忿不平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这不奇怪，因为长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有人一时很难消除。但是，如要继续反对“双包到户”，已不成气候。

此后，争论还很多。“包”字之争解决后，到争一个“富”字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争一个“商”字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到争一个“股”字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到争一个“雇”字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其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仲夷同志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例如，在1982年时，广东对鱼菜果等已放开市场经营，部分专业户开始富起来了，“万元户”成为议论的热点，被患“红眼病”的人责难。仲夷同志和我都认为，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因此，在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仲夷同志特地赶来讲话，他说：“‘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一语惊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给带头搞商品经济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又如，关于冲破

“雇工”这个禁区,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农民搞了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能人带头拓展生产领域,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生活富裕,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乃至加工业方面,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搞雇工经营的承包大户。他们在千家万户中起了推动商品生产、繁荣市场经济的示范带头作用。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的红头文件,如1980年中央75号文,还规定“不准雇工”。而承包大户都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当时“生产技术科学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服务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基本上靠手工操作,不准雇工,就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承包大户也就很难存在了。所以,如同包产到户一样,对于“雇工”这个“不准”,更是一个严重的“禁区”,甚至可以说是个“雷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继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论争。就因为这样,仲夷同志和我在支持承包大户发展过程中,曾遭受到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责难,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麻烦。我们碰到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陈志雄这个闻名全国的承包大户问题。

陈志雄“雇工事件”引发的一场姓“社”姓“资”大争论

从仲夷同志和我当时的想法看,对雇工问题看得并不重。因为我们懂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必须允许土地、资金、技术、劳力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联合,会出现各种形式的雇工,这个雇工,是在农民人人占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后出现的;这同旧社会农民的破产被雇,不能相提并论。据当年部分到经济特区的外来工反映,在这里干活一个月能赚几百块,比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倍。“你说雇工剥削不好,我情愿受其剥削”。这就是我国农村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不能只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无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陈志雄的承包经营状况是怎样的呢?这位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从1979年起搞承包经营,当年他承包8亩鱼塘放养

鱼苗出售,没有雇工;1980年他跨越两个大队,投标承包鱼塘141亩,除放养鱼苗,还养大鱼、种茨实,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一个,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他继续投标扩大承包,全年承包面积共497亩,有部分是别人投标转包给他经营的,主要是种茨实和养鱼,自身投劳两个,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2年他跨越四个大队,继续大面积投标承包,承包面积354亩,计划搞“茨实——水稻——鱼苗”轮作,拟雇请固定工两个,临时工1500个工日。

对于陈志雄这样搞承包经营,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高要县委和肇庆地委的主要领导,向来采取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的态度。省委有关部门以及省委领导,总的来说也是采取肯定态度。早在1981年初,肇庆地委办和高要县委办调查组,联合采写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认为陈志雄这样做,“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同年2月26日,省委办公厅将此调查材料加按语打印上送省委领导同志参阅。

既然如此,为什么陈志雄这样一个承包户会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而且惊动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出面要广东制止、纠正,并通报全省呢?起因是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至同年8月30日,历时3个月,共发表21篇讨论文章,最后以发表北京读者余大奴、黄克义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事情并非到此了结。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印发了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而且,随着这种经营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一、社员之间的关系逐渐起变化。大户承包一发展,其他社员就被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劳动,有些农民甚至被迫失去土地,只得外出谋生,或者当承包大户的雇工。承包大户则借此发了财。二、生产队收入的性质起了变化。随着这种包金收入在生产队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按劳分配就失去了基础。三、冲击粮食生产。对这份上了“资本主义性质”大纲的调查报告,新华社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年1月17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中央领导重视,作了批示。耀邦同志在“内参”登出当天,即1月17日作了如下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润生同志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一个是“请注意并提醒”,一个是“请酌处”,这种温和、商量的语气,有利于下面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然而,在1月18日,×××同志所作的批示,就大不相同了。他给仲夷同志的信抄送耀邦、万里同志和国家农委各一份,是这样写的:“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下发这个批示,无疑是下了一道讨伐“雇工”令!

这些批示信发到仲夷同志和我手里,虽然我们对×××同志批示中吓人的话不以为然,但一方面作为下级要遵守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由我组织人下去作调查,并于同年4月22日,我签发了以广东省农委致省委并报国家农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强调“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其次,对省社科院经研所两同志所说的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作了重要更正。值得庆幸的是,仲夷同志和我自始至终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

“纠正”,更未向“全省通报”,因而也就未对全省专业大户承包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省,面临非常复杂的种种难题。中央一领导同志甚至问“任仲夷是共产党员吗?”任老“一进宫”“二进宫”顶风前进

身为同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我,感到仲夷同志处理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得心应手。但是,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决策,仲夷同志和广东省委“一班人”驾驶着这艘“先驱号”航船,开辟一条前人从未驶过的航线,做到改革开放真正先行一步,并非一帆风顺。因为遇到上下左右压力很大,同级告状,左右干扰,特别是来自上边的压力。所以,仲夷同志差一点过不了关。这是从我于1982年2月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我把它叫做“一进宫”会议),以及后来仲夷同志和我多次交谈中,所得出的真切体会,使我深深懂得仲夷同志为改革开放用心良苦,懂得作为“班长”的他工作艰辛。

这是仲夷同志调任广东后,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看到中纪委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这位领导同志随即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并且认为,中央纪委会的报告反映的问题,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必须极端地重视,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同年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听到了会上严厉地批评广东,也听到了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由于对会上的议论,别人已作过详细介绍,我就不必赘述了。这里只略举仲夷同志会后给我说的二三事,也足够了。仲夷同志对我说,

耀邦同志让我“二进宫”，讲清楚”问题，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广东还不放心。其实，主要就是对我没放心。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仲夷同志说，我身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难道他还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吗？他是故意这样问的嘛！仲夷同志还告诉我这



左起：杜润生、杜瑞芝、朱厚泽（2006年10月摄于北京）

么一件事：中央确定增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我的提名。名单送给这位中央领导过目，他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仲夷同志还问我，知不知道我给中央写过检讨信？耀邦同志劝我，对我说：“我和紫阳同志都做了检讨，你不做检讨行吗？”我当时听到仲夷同志说的这些事，吓了一大跳，心情非常难过！后来，我仔细琢磨，便逐渐想通了，感到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问题，总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离开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在那时，恰恰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多年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观念，还在人们的脑海里作祟哩！思想观念不同，对人对事怎么会有共同的语言呢？正如当年仲夷同志所说：“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看来，这是个要害！

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在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中，仲夷同志是怎样正确传达贯彻“一进宫”和“二进宫”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的呢？原来，仲夷同志早有思想准备。他对我说，在中央召开第一次两省座谈会后，我就深感如何传达会议精神的为难。如若是不将上头各位说的都传达，会违反组织原则；如若把上头各位说的和盘托出，那就很有可能造成思想紊乱，后果严重。究竟怎样传达好呀？他向耀邦同志作了请示。请示时，他特别向耀邦同志汇报说：

“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我认为，仲夷同志真明智。明智之一在于他这一步棋走的实在好：因为有了耀邦同志的尚方宝剑，他就获得了如何传达的选择权；明智之二在于具有“特区情结”的他，非常珍惜上级特许的这个权力，懂得传达的内容如何“扬弃”。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用15天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仲夷同志传达两省座谈会精神时，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没有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广东省委也没有采纳：因为仲夷同志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搞一次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他认为，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在这期间，他还果断地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

性循环,仲夷同志在这次会上,将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16字方针,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管越活,越活越管”的24字方针。也就在这期间,仲夷同志还提出了著名的“执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而仲夷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开场白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结果,广大干部担心出现的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人心惶惶、‘杀气腾腾’的状况并没有出现,而是保持着‘热气腾腾’、‘朝气蓬勃’的局面。仲夷风趣地对谷牧说,我只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为‘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仲夷同志这样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并在打击经济犯罪与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实践充分证明,具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仲夷同志,紧紧依靠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乘风破浪,终于把改革开放“先驱号”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史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并为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仲夷同志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从容面对,敢于和善于“扬弃”,既不“偏听偏信”,又不“矫枉过正”。仲夷同志的头脑总是那么清醒,思想总是那么解放,态度总是那么坚定。故此,仲夷同志没有辜负耀邦同志书赠武侯祠联“特地将‘蜀’字改为‘粤’字,寄语‘后人治粤要深思’”的期待,没有辜负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重托,不愧是一位慧眼独具、胆识过人的改革家和政治高手!

任仲夷离休后二十年,与我交谈最多的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退居二线和离开工作岗位这二十年间,仲夷同志和我的交往更多了。除了外出,只要在广州,我俩几乎天天接触,晚间在河边散步聊天。仲夷同志见多识广,能指破迷津,和他常在一起,感到很充实,成了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仲夷同志也乐意和我交谈,因为我直肠直肚,实话实说。记得2004年2月10日,我的老秘书给《秋光》杂志写了一篇专谈《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我让仲夷同志审阅。大约个把钟头,仲夷同志就退回来了,他在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认为写的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仲夷同志对敢说真话的人最尊重,对口是心非的人最反感。

我们的交谈,海阔天空,但最感兴趣、聊得最多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民主与法制问题。除了交谈,有时彼此看到有什么珍贵的材料,还相互传递,提请阅读,扩大视野,拓展思路。例如,2003年11月17日,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邓英淘对水利界泰斗林一山关于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的治理问题的四次访谈录,谈的很好,“关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问题,而且是‘涉及子孙后代的大事’”,很有阅读价值,便推荐给仲夷同志看。仲夷同志阅后批曰:“杜瑞芝同志,这份材料很值得保存。”2004年9月1日,仲夷同志给我推荐一批材料,他在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着“要件”,“妥交杜瑞芝同志亲收”。在信上写着:“瑞芝同志,费了好大劲,把网上材料找出来了,送上十一份请你阅参……阅后请退我。”我认真看了,在这些材料中,有作为一个公民、党员,向国家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建议,本来合理合法,后来却传来不幸消息,说他因此失去自由的;有告诫掌管宣传的领导机关,不应以新闻自由为敌,公然践踏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有揭发其主管领导“小题大做”,“杀鸡给猴看”,限制办报言论自由的;有对当局关于现在正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提出种种质疑的,等等,都是关乎民主与法制的大问题。

以思想型、学者型领导著称的仲夷同志,平易近人,脾气很好,待人笑容可掬,说话斯斯文文的。然而,近几年我却先后三次见到他发起脾气。第一

次是在2001年初,北京某权威院校的一位常务副校长,特地来广州约请仲夷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仲夷同志应邀赶到鸣泉居宾馆相会,准备开怀畅谈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和见解。岂料,来者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论”一番,却毫无倾听仲夷同志发言之意。因此,仲夷同志感到大失所望,愤愤不平,扫兴而归。第二次是在2002年5月24日,仲夷同志作为“特约代表”,应邀出席广东省委召开的党代会,他给大会送来一份书面发言材料,谈了自己对如下三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一)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为了把国家治好,这是两者的共性,是一致的。但是又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特别是对两者的认识、理解和实施方法上,必须有所区别。“依法治国”是具有强制性的,而“以德治国”则只能采取教育、启发和引导的方法,决不可采取强制或各种变相强制的办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犯。我曾为一位作者写的有关“法治”与“德治”的书上题了兩句话:“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意思就是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又有所区别。(二)关于“法治”和“法制”。过去人们常用“法制”这个词,不少人以为“法治”和“法制”并无什么区别,其实“法治”和“法制”的含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实行“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我国要实行“法治”,是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法治”一词为广泛使用起来。实行“法治”,反对“人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包括领导的“指示”和“批示”,都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而不能有所违反。更重要的是,对于“德治”的内涵,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解释。不然,从“人治”改变为“法治”仍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成为空谈。(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先进文化及其正确的前进方向,其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很清楚。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认为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进方向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认真实践的。根据同样的标

准来判断,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文化都不是先进文化;因此,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前进方向都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坚决反对的。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和理解,对或不对,供同志们参考。奇怪的是,仲夷同志这个言简意赅且针对性、说服力极强的发言,大会简报组当天即印出,却未见发给与会全体代表。何故?仲夷同志十分关心,让我打听打听。随后,我问了好几位有关领导,都说不清楚。仲夷同志又问会议主持人,他也说不清楚。这样,推来推去,最后不了了之。仲夷同志愤愤不平,又一次发了脾气。第三次是在2004年初,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仲夷同志接受采访,强调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仲夷同志根据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经验,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篇访谈录,在几家杂志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然而,两家杂志的主编却受到批评甚至被免职,采访者还被追查是不是他主动找任老采访的。诚然,仲夷同志对此种种所为十分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要问就来问我嘛,为什么不找我来谈呀?也因为如此,他辞去该杂志顾问职务。

对于仲夷同志这三次发言的遭遇,从不让他讲,到讲了不让发表,再到发表后整人,我也愤愤不平,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因此,我对仲夷同志半开玩笑说:“你不要‘半夜鸡叫’了。”我的意思是,人家把你的铮铮之言当成政治杂音,是半夜里发出的影响他安静睡眠的噪音。你越讲人家越反感!仲夷同志却对我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态度很坚决,语气很有力,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为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正因为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仲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仲夷同志非常执著。仲夷同志说过:对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关于“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的教导,不要忘记!

(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珠江三角洲即原佛山地委第一书记)

(责任编辑 杜晋)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 赵德新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一生扎在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能写出各种形式的文章,通晓民间的吹拉弹唱。毛泽东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摧残,蒙冤去世。而他离开人间时,竟然还背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死敌”的罪名。

扎根农村获得创作不尽源泉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赵和清在农业上是把好手,还是村里“八音会”的拉弦能手。赵树理小时候放过牛、驴,挑过炭,拾过粪,跟着大人参与村里的婚丧大事,走亲戚拜年,参加“八音会”活动。这使他从小就了解农村各个阶层的经济生活,懂得农村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农民的各种语言,把根深深扎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是赵树理以后进行文艺创作的不尽源泉。

1925年,老赵考上了长治师范。在这里结识了王春、王中青、史纪言等进步青年,接触到了党的组织,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有很大提高。他开始写新诗,新小说,成了新文艺的爱好者。但这时候写的东西,还是欧化句子、“学生腔”那一套。

1926年,山西的形势有了大变化。阎锡山大抓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老赵不得不跑来跑去,被捕、坐牢、受审,又四处流浪。生活无着落,就写点小文章糊口。他一面和文艺青年来往,一面和

农村老百姓接触。从这两方面文化生活的对比上,他看出了新文艺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人民群众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封建迷信、武侠、淫秽等读物笼罩着。许多文艺作者不屑去理他们,他们也攀不着文艺的门坎。这时候,赵树理认识到,要使文艺为广大群众接受,非通俗化不可。于是,他开始实践用农民的语言写东西,提倡大众化、通俗化。在这里,王春给了他很大帮助。王春是当地较早的党员,老赵的同学、挚友和入党介绍人。他同老赵一样对旧社会农民所受的痛苦怀有义愤,对农民如何得到新知识充满热情。这样,他便同老赵一起研究、实践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赵树理把王春称作自己“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头一个启蒙老师”,“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

几篇经典作品使他名扬四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工作。这时候他一改过去的风格,开始写通俗化的作品。《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整个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经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仅1941年,他在《中国人》报发表的文章就达150多篇。他用多种笔名写言论、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揭露敌人残暴、丑恶,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

1943年1月,赵树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下乡调查研究 and 进行创作,又由于平时老赵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自身生活的积淀,他一年之内便写成并出版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这两本小说，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是写新农村、新农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之作。

以往作品中的农民，是悲惨、痛苦的农民，甚至是被污辱、丑化的农民。老赵笔下的农民，则是获得解放、当了主人、扬眉吐气的农民。他们在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减租减息同封建恶势力进行斗争。

以往写农民的作者，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农民看不懂，听不懂。老赵则是用精炼的群众语言，干净、利落、生动、幽默。他处处考虑农村读者的习惯和需要，不写长句子，不用生僻的字，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赵树理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由于解放区通讯不便，他这时候还没有看到这篇讲话）。1946年1月赵树理又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

他的小说一出版，立刻震动了解放区文坛，受到农村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人口不足500万的太行区《小二黑结婚》就销售四五万册。彭德怀副总司令题词说：“像这种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他的小说在其他解放区也相继出版，甚至在当时的蒋管区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解放区农村剧团还把小说改编成各种戏曲演唱。一时间，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等成了人们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赵树理的名字也几乎家喻户晓。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新的作品，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风格，使赵树理像一棵参天大树，立于我国现代作家之林。他和他的作品还成了许多国家的研究对象。

这是赵树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被公认为写农民的伟大作家，文艺创作的方向，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不过，赵树理把“作家”



看得很淡，他看重的是为群众服务。赵树理表示自己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他说：“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

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倾思潮

1949年初赵树理进了北京。进城后，他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许多小戏园里人总是满满的，而上演的内容基本是“神仙托梦”、“公子中举那一套”，感到很惭愧，便东奔西跑找有关方面，想组织更多的人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改变这种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也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例如：

《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内容讲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恶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骗来一个女难民，说要给长工娶妻。后地主强奸女难民未遂，要将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长工未死，投奔了



赵树理

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农村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赵树理看不惯，接受不了，因此他后半生没有写出更多好作品来。他说：“自己没有看透，就想慢一点写。”他还检讨说：“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不是“检讨”，而是赵树理自觉地抵制“左”的一套东西。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以后的“反右倾”、“拔白旗”，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头脑发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工农业卫星”一个接一个。

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没有跟风，而是自觉地顶住了这种歪风。在“大跃进”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进”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这个时期赵树理不写吹牛的东西，却写了歌颂先进人物和实干精神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

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赵树理下乡写不出太多东西来，回城市，作家协会也不断在内部“批判”他：“批他跟不上时代”，“批他只会写‘中间人物’”。这种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老赵并非“只会写中间人物”，他写了不少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第二，“写‘中间人物’”的确是老赵的“强项”，也是他作品中的突出特点。但“‘中间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对当时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上强调写阶级斗争、强调写先进人物“高大全”等倾向，赵树理多次提出过不同意见。1956年6月，赵树理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

解放军。小说发表后读者提出批评，有人甚至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在《文艺报》上两次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进城不久，胡乔木就批评赵树理，说他“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老赵也感到自己对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写农村更有优势，便毅然离开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较贫穷的太行山老区，继续写农村，写农民。1955年，出版了小说《三里湾》，发行近百万册。

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

过去我们写东西,要求各种人物都要有——党员、团员、群众等——结果一个也没有写好。我认为不必照顾那么多,只写一个人物也可以,能写好就行。

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还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思想写法的意见。他说:

《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因为许多东西不能写,赵树理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拿去研究戏曲了。

“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文革”惨遭迫害,品德永留人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当1966年“文革”开始时,老赵在晋城挂职当县委书记。他到河南兰考搜集素材,正在写剧本《焦裕禄》。

6月以后,晋城开始给他写大字报。7月中,地委召开会议学习《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在会上赵树理开始受到批判。

7月20日、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很长的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的“揭发”、“批判”。文中说:赵树理是一个披着“人民作家”的外衣、“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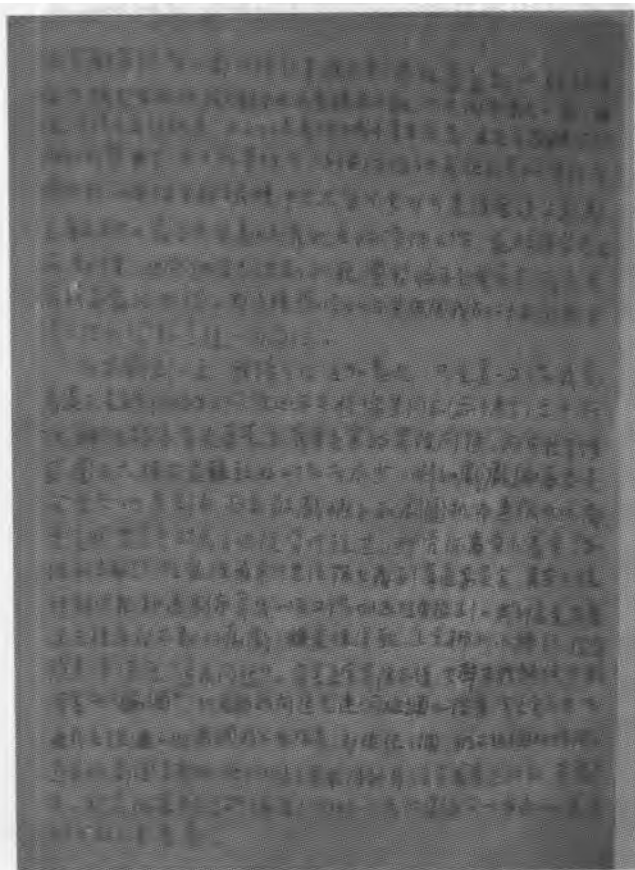
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赵树理自然没有

思想准备。他在一份揭批他的大字报上写道:“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他在一份书面检讨中,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解剖,对各种诬陷不实之词进行了驳斥。他的检讨材料还幽默地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纠正了。我愿意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

但是,赵树理太天真了。

7月下旬到8月初,赵树理接连被造反派拉出去揪斗。8月8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斗。赵树理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帮”牌子,轮番被游街、批斗。8月,“揪”到长治,顶着烈日批。11月,“揪”回晋城,冒着大风在广场上斗。

1967年,全国性的报刊开始批判赵树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诬蔑赵树理是“资产阶级权威”。《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



赵树理手迹

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的文章《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与此同时,造反派对老赵的批斗也升级了。在太原批斗他时,一个造反派竟把他从主席台拉下来向他胸部猛击一拳,老赵倒下后,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脚,赵树理三根肋骨被打断。1969年再揪回晋城时,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摆起三张方桌,让赵树理站在最顶上接受批斗。批斗中,有人故意将下层的桌子推倒,老赵摔下来跌断了髌骨。肋骨断了,刺入肺部发炎。髌骨断了,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成了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他经受着人间最残忍的折磨,但造反派依然不放过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老赵被押进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7月中,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以晋革发[1970]第185号文件,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接着,“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写了《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的文章《山西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等五篇文章(从7月到年底《山西日报》发表批判赵树理的新闻、文章达70多篇)。

在“文革”中,赵树理坚持实事求是,不讲假话,不怕淫威,顶住了造反派的诬蔑,并且针锋相对地同造反派进行斗争。造反派让他低头认罪,他说:“我没有罪。”造反派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是有益于人民的人。”造反派让他交代怎样反党的,他说:“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反自己的党呢?”又说:“我就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说我反党,反掉了党,我往哪里摆?”造反派让他交代写了多少“毒草”?他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样种呢?”

赵树理早就患有心脏病和肺气肿,到1970年他的病更严重了。他由儿子搀扶着到医院看病,医生说“没有床位”,将他推出门外。他的病情继续恶化。

1970年9月18日,造反派在太原工农兵会堂(湖滨会堂)对赵树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批斗。他儿子赵三湖这样写道:

70年9月18日,父亲被转押到省高级法院

已几个月。这时候,病很重了,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连走路也得扶着桌子、墙壁。走一步,喘一口气。这天早晨,突然又接到参加批斗的通知。我见父亲成了这样,忙找到军代表说:“我父亲病的厉害,不能参加批斗……”军代表不屑听我的话,冷冷地说:“不能站着批,坐着批也得去!”

8点半钟,父亲被押到湖滨会堂。偌大的大厅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见父亲进门,马上呼起雷一般的口号:“打倒……”我搀住父亲一步步走上台,扶他坐到椅子上,口号不响了,批判开始了。每一个批判者,雄赳赳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抬头示众”,“低头弯腰”。听到一声声呐喊,父亲条件反射般地立起来,困难地弯下了腰……一次又一次“示众”,一次又一次“认罪”,父亲支持不住了,突然倒在台子上……

20日左右,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对于任何人的劝说,都报之以无声的闭目和摇头。22日,老赵在狱中一脸苍白,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嗓子呼噜呼噜说不出话来。但军管组仍不给他请医生治疗。1970年9月23日,这位伟大的作家、我们敬爱的老赵终于在“四人帮”及其在山西的爪牙残酷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终年64岁。

老赵去世前不久,向自己女儿说:“孩子,我们党,现在可就坏在一文(指江青)一武(指林彪)手里啊。”他还忍着打断肋骨的疼痛,抄下了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对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帮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后来,他女儿把父亲写的字交给了周扬。

他留给老伴和儿女们的遗言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

“文革”夺去了赵树理的生命,但他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那200多万字的作品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自然,人们更不会忘记摧残赵树理致死的那场悲剧。

1978年10月17日,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为赵树理彻底平反昭雪。以后,他的生前好友还在沁水县尉迟村他的故乡为他建了墓碑。

(责任编辑 致中)

1975 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

● 陶 涵

我原在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湖南农学院，曾任该院英语讲师，文化大革命十年都是在农院度过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一上来就迅速整顿各条战线，包括政治、经济、文教、科学、内政、外交和军队，无不立竿见影，全国各方面重新萌发了生机。在这一形势鼓舞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向农村派遣工作队，我也奉命参加了。成立工作队的原意是要贯彻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指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不料下去不久，形势突然逆转，工作队被迫接受“批邓”任务。这个弯子是怎样转的，当时干部群众心态如何？本人根据亲见亲闻，择其中有史料价值的一些事情，简述如下，作为历史的留念。

成立省委工作队的背景

1975年9月，我在讲授英语三周后，接到通知，要我进城听报告，并准备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工作。

9月30日，报告会在省委大院内一个礼堂中举行，到会800多人。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复职以来，今年上半年抓了军队、工业、铁路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成效显著。前几天，小平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示说：“农业要整顿”，并说这项号召是毛主席同意后作出的。省委连夜讨论贯彻问题，决定采取几项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成立30个省委工作队，分赴全省12个最穷县，帮助县里把农业搞上去。下去的时间是一年。下去后各项工作都要管，但最重要的是抓好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这项工作如做不好，或走了过场，以后工作队一撤走，一切又恢复原样。他还宣布了工作队出发的时间安

排。

到最穷的公社去

到辰溪后，10月6日，工作队负责人与县委常委一道开会，讨论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问题。10月7日，召开工作队全体会议，宣布了一些事项：中共湖南省委驻辰溪县工作总队的总队部设在县委大院内，总队长由湖南农学院院长张明义担任。下设三个省委工作队，其中之一是由湖南农学院教师和干部组成，队长由副院长翟定一担任，副队长由政治课教师魏泽颖担任。下设四个工作组，由魏泽颖和3名中年教师任组长，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工作队要下到离县城最远也是最穷的一个公社去。其他两个工作队由几个省直机关干部混编而成，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下乡以后，我们4个组长自然要住进4个最穷大队中的4个最穷生产队去。我住定后一了解，该生产队1974年人均口粮300斤，劳动日值4角，即每个工分只有4分钱。这个数字令人吃惊。300斤是原谷，碾成米后只有210斤。看来，全村300多户中，能吃饱肚子的怕是没有几家了。

面对如此贫穷落后的局面，大家信心都不足。但我们很快打开了局面，改变了当时面貌。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挨家挨户宣讲邓小平整顿农业的精神，同时了解情况。访问中要宣读毛泽东和邓小平语录，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工作队员心里都明白，宣读毛泽东语录只是起个“保护伞”作用，而宣讲邓小平语录，才是能否与农民沟通，能否了解真实情况的关键。听过宣讲的农民，都反映如果照邓小平所说的去做，改变农村面貌是大有希



1974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一起

望的。农民对省委工作队员，也从敬而远之改为主动反映情况。

(二)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我们进驻时，支书已被调走，大队长50多岁，工作不得力，但无多吃多占等劣迹。经我们调整后，支书和大队长换为30多岁的青年，原大队长仍任支委。调整后大队领导班子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三)减轻农民负担。我住进的生产队3名干部，即队长、会计、记工员向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负担太重。县、社、大队三级领导向生产队下达的摊派任务一年数千元，另外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动外出的情况，也一年比一年严重。我向工作队队长报告后，召开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会，传达工作队的意见。凡县里下达的筹款和派工任务，经工作总队和县委研究后调整。凡公社下达的任务，由工作组调整。我随后表示，大队以前的各种摊派，从今天起一律停止。派工任务中，保留大队抽调修水利民工的权利，其余派工今后一律停止。

(四)恢复生产队长的指挥权。生产队长向

我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实际上没有生产指挥权。大队任何干部都可以命令他改变原生产计划。我随即召开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会，重新划分了各自权限。大队干部有权按生产队上报的年度生产计划检查生产队执行情况，但无权改变生产计划。生产队长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具体安排，大队干部无权干涉。

(五)将工匠户组织起来挂牌营业。我们工作组进驻不久，就发现全村最穷的并非农民，而是有手艺的工匠。例如裁缝和竹编工匠。合作化后允许他们挂牌营业，每年上交大队和生产队若干现金后，收入全部归己。裁缝的年收入为大田壮劳力的五至六倍。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人被认为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被取消营业资格，赶至大田劳动。然而这些人虽然长在农村，种田却不内行，因此工分甚低。我将情况了解清楚后，要大队干部通知裁缝和竹编工匠开会。宣布允许他们恢复裁缝和竹编工匠职业，但要走合作化道路。他们听后都很高兴，说没想到工作组如此“开明”。两个组挂牌营业一个月后，收入现金3000多元，3个月后得现金超万元。

(六)落实子女政策。该大队有地主富农20多户，其子女中的男青年全部流亡在外。流亡的原因有的是不愿受歧视，有的是有特殊技能，只有外出才能发展。工作组了解到流亡男青年每年回家过春节，还要大队出面召集他们开会。我在会上宣讲毛泽东有关“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几条语录，然后宣讲政策说，歧视你们或歧视另一部分青年，都不是党的政策，过去你们流亡在外，不怪你们，刚才大队干部已作了不再歧视的保证，你们今后就不要在外流浪了。十多名男青年都发了言，对党的关怀表示感谢。有一名青年说，没有想到共产党还在关心我们这些“新中国的贱民”。

形势逆转——批邓消息传出以后

1975年冬，我们听到北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工作队员对这一消息都很不安。诚然，以前也发生过180度大转弯的事，如林彪事件中，对林彪的称呼一夜之间由“副统帅”变成

“林贼”。但那毕竟是中共党内高层斗争的事,地方和基层干部对此并不关心。这次却不同,省委工作队本来正是为了贯彻邓小平一系列指示而成立的。有一位队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来自北京的批邓之风刮得太猛,你们这些当队长、组长的都会变成邓小平的黑爪牙”。

1976年1月,工作队员回长沙休假,我利用这短暂的机会,到图书馆查阅《人民日报》。该报从1975年12月起,就连续发表批邓文章。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翻案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含义分别作了阐述。几篇文章都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文章的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为什么不点名,这就不是我们这些干部所能推测的了。

春节过后不久,省委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开了一整天。会后我作了以下判断:1、大会安排十多人发言,都是驻各地工作队队长、组长和队员介绍他们如何打开局面改变当地面貌的。所有发言都避开邓小平,既不说成绩的取得是贯彻邓小平指示的结果,也不在发言中批邓。这表明工作队员中无人赞成批邓。2、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工作队下去以后要抓紧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并无撤离之意。关于批邓,只说回县以后工作总队与县委共同决定。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省委对批邓不积极,调子甚低。我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处境,估计不会有变。

下去后,县委和省委工作总队将公社一级干部的批邓活动安排在3月,有工作队进驻的公社由工作队正、副队长主持这项工作。我未与会,因而不知详情,事后我曾向副队长魏泽颖问批邓情况如何。魏的回答

是:“货真价实走过场”。

要我领导大队批邓

1976年4月的一天,魏泽颖召集工作组组长开会说,凡有工作组进驻的生产大队,都要开一次批邓大会,大会由工作组长主持。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虽然处境不佳,但未说过违心的话。我不赞成的事,保持沉默也就过去了。这次却要讲违心话做违心事。我和其他工作组员几个月前还在卖力宣讲邓小平语录,而今又要我们带头批邓,这个反差太大,我们都难接受。然而,如果公开反对批邓,或撂担子不干,无异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为此,我几夜睡不好觉,陷入心理失衡状态。

后来我想通了,由我领导批邓也有一个好处,我可以将批邓造成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由别人领导批邓,情况会更糟些。我之所以很快恢复心理平衡,得归功于从已读过的鲁迅著作中得到启发。鲁迅笔下的阿Q,不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当然我也知道,鲁迅对阿Q是“怜其不幸,怒其不争”,三分同情,七分批判。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却非常有用。



1976年10月4日下午,张春桥手夹着烟,阴沉着脸倚靠在高背椅上说:“要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当时我还决定，批判会由我一个人设计，大会哪些人发言，每个发言内容是什么，都由我通知当事人，并不征求副组长和组员意见，为是避免有人出歪点子，使我左右为难。

搁置推行政治记工制

1976年6月的一天，工作队长翟定一来到我住地，要我转告大队干部，通知社员晚上开大会，有重要事情传达。人到齐后，翟定一作了调子很高的讲话，要点如下：（一）批邓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二）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至今已十年，到了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的时候了。（三）大寨人这次又给全国农民做出榜样。他们改革了现行记工制度，除按照每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记工外，还加上按政治表现记工。表现好的多记工，表现差的少记工。（四）县委已作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大寨式记工制。本大队是有工作组进驻的地方，更要率先实行这一制度。

他讲完后，我问他，按政治表现记工行得通么？他王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天，我主持召开工作组员和大队干部联席会，讨论执行县委决定问题。7名大队干部都在会上发了言，而且都表示了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是：（一）县委虽规定今后记工要看政治表现，但未具体说明表现好和表现差的衡量尺度是什么，下面执行起来很难掌握。弄得不好，就会将工作勤奋的人认为表现不好而少记工分，又会将干活偷懒的人说成表现好而多记工分。（二）工作组进驻后，大队工作有起色，外流劳力的多数已返回本村。如果实行这一制度，这些人将再度外流。

对县委的决定，基层干部通常是顺从的，而这次却表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这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在会上作了以下表态：（一）工作队是受省委托付帮助当地干部工作的，当地干部是主体。大队干部认为行不通的事，工作队不会强迫你们去做。（二）政治记工制在本大队暂缓执行。（三）此事不向上级请示报告。如果县里来人查问，就说是我决定的，要他们找陶组长。

我为什么敢于搁置县委决定呢？当时的考虑

是：（一）我是省委工作组长，在县干部面前，我是钦差大臣，逢官高一级。我不担心县干部会找我的麻烦。（二）工作队长翟定一曾私下向我表示过对极左思潮的不满。而这次这个明显反映极左思潮的政治记工制他却又摆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势。我断定他是在逢场做戏，不必认真对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按照省委规定，派驻各地的所有工作队将于9月底全部返回长沙。在离开前，工作组要将本大队各生产队1976年预分方案制定出来。我住地的生产队，1974年的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劳动日值只有4角钱。工作组进驻后，1975年人均口粮增到350斤，劳动日值增至7角钱。1976年预分方案达到人均口粮400斤，劳动日值1元，还有人均100斤口粮储备。工作组进驻仅一年，我们又都是外行，能取得如此成绩，也就算不错了。

我们返回长沙不到10天，“江青四人帮”就被捕了。农学院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逮捕“四人帮”的文件时，事出突然，全场只有一个党员起立鼓掌，满座骇然。可见十年文革全面专政为害之深，比北京消息一传出即几百万人上街的反映慢多了。

我当时自然也很兴奋，而且将前后情况作了比较。记得文革初期，流行过三句话九个字的顺口溜，叫做“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以表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后来不知谁加了六个字，顺口溜变成“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修则革，革则穷”，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从我下乡一年的体验清楚地表明，按照“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搞下去，只能是越革越穷。

1975年批邓这件荒唐事，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确是一件值得研究和回味的今古奇观。你看，举国上下，党内党外，报纸刊物，洋土喇叭，中华大地无处不是一片批邓声，舆论导向更极其张扬。可除极少数四人帮分子外，人人口里批邓，会上批邓，心里却都痛心疾首地反对批邓，批邓成了文革中最突出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异化和人格异化运动，可笑复可悲，时间虽短，不可忘也！

（责任编辑 萧 徐）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 张彦

1979年1月1日,唇枪舌战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由于两国政府的正式宣布建交,终于正常化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划时代地访问了美国。就在这时候,我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任务是向国内读者报道美国。从此,我们两大国之间、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与之息息相关的演变。自两年多的旅美记者生涯以后,我又采访过中国总理对美国 and 加拿大的国事访问、应美国政府新闻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rightScholar)在美国匹茨堡大学(UNIVERSITYOF PITTSBURGH)里讲过一年半学、随后又多次赴美探亲、访友、开会。我似乎与美国和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距今不过二十几年。但是,在此期间,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之快,今天说起它来竟已有“隔世”之感了。回头看去,不能不承认,在这一不平凡的历史段落里,我一直生活在“困惑”与“释惑”的不断交替之中,而且往往由于一些小事引发我不得不去思考许多一直困扰着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感受

今天,中美之间的空中交通已经如此便利,北京至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机12小时直达,单是我们中国的班机就有几家航空公司任你选择。不久,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也将直航了。今天,你恐怕很难想象,我们1979年去美国当记者是怎样走的。由当时《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王飞

带队、连同我和青年司机贾梦醒一行三人,头天乘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到巴黎过夜,第二天又换乘美国TWA公司飞机绕地球一周才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第一次在飞机上看了电影,巧的是TWA那天播放的片子正好是《中国之梦》,讲一个美国佬辛辛苦苦凿通地球中轴线的故事。这个美国人好不容易从中轴线爬出来以后,他才意外惊喜地发现:那一端竟是一个偌大的中国!

到华盛顿的第一天,我就闹个笑话。走进大使馆为我们准备的卧室,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一盆鲜艳的郁金香在等待着欢迎我。原来,这是我35年前在昆明结识的飞虎队的美国老朋友们送的。当时,他们还身在几百公里以外的纽约。我多么想马上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来美国了!”我向站在身边的使馆同志们打听:“邮局在哪里?我想打一个长途电话。”因为,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国内。那时,在国内,除了机关单位,私人很少有电话,打长途就必须上邮局。没有想到,这竟引起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笑我这个“土包子”,指着桌上的电话机对我说:“邮局就在这里!”于是,我立刻拨通了长途电话,对方听了欣喜若狂。我说:“将来出差去纽约时,一定去看望你们。”回答却是:“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明天就来看你!”果然,这两个曾经于1945年在重庆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美国大兵贝尔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夫人露西和诺玛,一早就从纽约搭乘一小时一班的穿梭飞机来了。在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驻美大使馆里,我们终于圆了共同拥有了35年的一个“重逢梦”。我们之间颠扑不破的国际友谊,又展开了新的篇章。

初到美国,首先使我最吃惊的是,我们两国

之间在物质上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少说,当时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至少要差 50 年以上!仅仅以交通为例,美国自 40 年代就已建设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网已经遍及全国城乡,几乎家家都拥有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就像自行车在中国一样普及。飞机四通八达,连小城市也有机场,甚至还有专门供私人小型飞机起降的机场。贯穿东西南北的火车,此时在美国已经显得很落后了,以至必须想出各种招数来争取旅客,才能维持它的正常运营。其次,商品是那么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跨进超市什么都能买到。而且,服务态度非常之好,把顾客当作“上帝”对待,买了东西不喜欢几天以后还可以拿去退或换。与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物资还相当匮乏的中国相比,对照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时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计划经济的垄断思想依然统治着一切领域,对商店里的服务态度怨声载道。

更深入地了解美国

历来的政治学习教导我们,要牢记列宁的教导:“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临出发前,报社为我们制订的《华盛顿记者站工作方案》,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它早已越过鼎盛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它在经济上……由于制度原因,身患痼疾,面临一系列无法根本解决的严重问题。”然而,现在,我眼前展现的这个活生生的“美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垂死”,而且还在继续向上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怎么去向国内广大读者介绍美国呢?国内报社的审稿人能通得过吗?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我们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报道原则,一切以事实为依据,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两年多下来,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报道很受广大的读者欢迎,他们认为是大大开阔了眼界。

美国城市里的十字路口,即使没有红绿灯,也往往在路旁立有 STOP(停!)标志。不管是谁,汽车开到那儿都会自动停下来,经过左顾右盼以后才继续往前开,这已成了每个开车人的习

惯。如果遇上红灯,那就更不用说要停下来等候了。一次,一个城市的教育局官员开车带我去参观学校。走到一个僻静的十字路口,正巧遇上了红灯。当时,前后左右,空无一人,而定时的红灯却老不变。干嘛要这样傻等呢?我有点想不通,建议我们何不闯过去。没有想到,这位官员反倒给我上了一课。他说:如果我这样做,明天我的名字就可能上报,因为红绿灯会给你留下录像,而报社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天天都会上警察局查记录。当官的闯红灯,岂不正好让他捞了“一条大鱼”,没准还能成为“头条新闻!”这位官员还告诉我: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女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如果他们有违规行为,也会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引人特别注意。

区区小事,却发人深思。这个例子说明:第一,法治的观念已经深入美国人心,一般地说,他们是在自觉地守法。第二,特权思想不为美国一般人所接受、所认可,甚至引以为耻。他们为什么能这样?追溯得更远一点,这也许与美国人背上没有封建历史包袱有关,他们的《人权宣言》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来平等”。二百多年前,来自欧洲的这些移民是通过革命手段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才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所以他们一直把 7 月 4 日自己的国庆节称为“独立日”。建国伊始,他们就崇尚自由、民主。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体制,使任何违规行为都受到限制,在法律面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总的来说,美国社会虽然问题很多,但能一直保持相对比较稳定,这大概是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国家,报刊电视的新闻报道无不争先恐后。本着“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原则,杀人放火抢劫案件往往可以成为头条新闻。媒体的确大胆自由,对什么事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往往造成很大影响,当官的也怕它几分。不过,有时自由得过头了,它也得低头认罚。它果真这么自由吗?也不尽然,至少它必须受两条约束:一是法律,报道没有准确依据,构成诬陷就要负法律责任;二是,冒犯了老板,就有可能被炒鱿鱼,而且其中往往涉及这些媒体所属财团的利益,这已经不乏其例。

舆论监督威力之大,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

是《华盛顿邮报》记者揭发的“水门事件”丑闻，竟把尼克松拉下了堂堂总统宝座。但是，在这里，并不因事废人，否定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破冰之旅改写了历史，至今仍是世界公认的丰功伟绩，美国人至今以此自豪。在今日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里，他当年访华的各种记录（包括图片、录像、录音、文字）最引人注目。尤其是“世界伟人”这一屋的等身雕塑，更成为这个图书馆的最大亮点。在满屋尼克松打过交道的世界级人物中，在中央沙发上赫然坐着的就是他所十分敬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美国的权力机构，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上至总统下到地区学监无不如此。竞选、投票已成为美国人的家常便饭，一年到头，没完没了，更不用说是一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我采访过1980年总统选举从头到尾的全过程，如果从竞选的锣鼓敲响算起，前后长达一年，活像一场马拉松式的大戏。虽然经联邦选举委员会承认申请竞选总统者已达112人之多，但是最终还是由共和民主两党包办。其实，这两个党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倾向、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总统大选耗费之大，都是些天文数字，除了一小部分由国家明文规定予以补助外，就看支持你的财团愿意拿出多少钱来为你夺得这个宝座了。说什么穷小子也能当上美国大总统，那纯粹是神话！每次的大选竞争都是那么激烈，因为厌倦了旧总统的人们都期望换个新人来试试，虽然明知道他们的后台将决定他们的大方向。不过，总统任期四年，一般只能连选连任一届。所以，人们手中这一票投给谁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能起多大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在三权鼎立制度下，总统是不允许独断专行的，不可避免要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牵制。我看，这可能是美国社会能维持长期稳定不乱的根本原因，许多重大错误正因为有这种相互的监督而得以避免、制止，或者暴露以后加以处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也有雷锋?!》。这并不是什么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我在马路边拿着地图东张西望，就会有人主动过来问我：“MAYIHELPUYOU?（需要帮忙吗？）”有的热心人甚至亲自带我一起去寻找我要去的地方。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都有同样的

经历。一次，我的儿子开车送我去一个小城市看望老朋友，已经快到了，因对当地路不熟就向路边一个妇女打听。没想到，她跳上自己的汽车说：“跟我来！”她引导我们拐弯抹角到达我们要去的那地方时，只是伸出手来做个手势表示：“到了！”然后就开车扬长而去，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不正是“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在美国大学讲学期间，我和老伴是租房子住在学校以外一般居民区里，和美国老百姓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他们的为人处世有了更多的感性知识。初期，我们因为不开车，只能步行到附近一个小镇去买东西。正发愁找不到超市在哪，只好向从一家诊所走出来的一个白发苍苍老太太打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不仅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还豪爽地说：“上车，我送你们去！”于是，她把我们送到了另一个镇上的一个大超市。一小时后，我们购物出来，意外地发现她还在那里等我们，并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才了解她叫格蕾斯普丽斯特，已退休多年，一直热心于社会服务。从此，我们结成好友，常通电话，她一再表示愿意为我们义务开车。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帮别人的忙，是我的乐趣。”圣诞节前夕，她开车来接我们去参加教堂的圣餐会，上车才发现已经有两位老太太在座，也是她沿途接送的。在盛大的聚会开始之前，牧师在祷告祝福之后，还热情洋溢地表彰了一大批教友造福社会的先进事迹。使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的格蕾斯也在其中，而且名列前茅，她助人为乐的桩桩事迹感人至深。当她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领奖的时候，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这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在美国住久了，就让人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教文化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威力无处不在。

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两极分化非常悬殊，富的可以花天价上太空旅游，穷的无家可归只能靠救济过日子。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拥有枪枝。吸毒、强奸、洗劫银行、校园枪击，已经是不是新闻的新闻。初来乍到，无不恐惧三分，不知自己掉入了什么可怕的深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里大多数人都是有是非的共识和助人为乐的习惯。大小城镇都设有各种提供援助或慈善救济机构，专门从事援助贫困家庭和惨遭不幸的人们。我讲学的大学所在地约

翰城，是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地方，竟也有“救世军”、“妻子行动委员会”、“妇女援助中心”、“妈妈之家”、“老年人活动站”、“受害者服务处”、“残疾人协会”……都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为的是通过互助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的经费主要都是来自各方的捐献，有的可以按法律规定得到政府的补贴。人力主要靠志愿者的义务劳动，即使常规任职的也只是拿半义务性质的低工资。为所有这些社会慈善事业撑腰的是一个专门为民间团体筹集资金的机构：“联合基金会”，全国各地都有。它拥有一套训练有素的人马，一年四季举办活动，吸引各界人士通过他们赞助公益事业。它和许多大公司、大企业保持友好关系，使之成为长期的赞助人，甚至让他们说服职工从每个月薪金中自动扣除一个很小很小的百分比作为捐献。这样一来，既为社会慈善事业开拓了一个长期性的财源，又使这家公司及其参加捐献的职工，按照美国法律可以享受一定比例减税的优待，一举而两得。所有民间团体都可以向“联合基金会”申请补助，至于能分得多少，决定于你的活动性质、规模和效益。

拥有两亿多人口的美国，已经是一个老年化的国度。老年人处处受到优待，福利措施比比皆是。看电影、上剧场、乘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都享受特殊优待。对此，我和老伴深有体会。只要出示证件证明你是62岁以上，在大小城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是免费就是半价，还受到特殊照顾。“老年活动中心”也是我们爱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和当地老年人一起喝茶聊天，健身学艺，有说有笑，令人有返老还童的感觉。中午，这里还供应只收一美元成本费用的营养午餐。这种不以盈利为目的“老年活动中心”，除了能从政府民政部门得到一定补助以外，主要是靠各方的捐献和众多志愿者的义务劳动或半义务劳动。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有老移民也有新移民。他们取得永久居留证（即“绿卡”）后，就可以享受廉价租屋、医疗优惠、每月领取最低生活补助等权利。据我们所知，不少华裔老人就因此长期留下来了。至于许多人留学不归，甚至设法转换身份而长期居留，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他们这样做，也许都有各自的理由，不一

定就是不爱国。

美国和中国

根据我的亲身感受，生活在这个移民国家的美国人，一般地说，对于将近二百万来自亚洲的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友好感情。这不仅是因为大批的华工曾经为美国东西大动脉铁路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因为中国人以勤劳和重视家庭教育著称，他们的后代往往是获各种学科奖项的佼佼者。一般地说，美国人往往只关心自己国家，国际知识较差。但是，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特感兴趣，开始出现学中文的热潮。不过，由于生活在西方媒体笼罩之下，因而脑子里有的只是好奇、困惑、疑问，有的甚至极其偏见，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飞快发展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进入蜜月时期。1987年，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NBC（国家电视台）曾经派来大批精兵强将来中国做了一周的现场直播《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CHINA），向美国观众介绍今日中国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倍加赞赏。连我这样与美国有过来往的人也被请到长城上去接受NBC著名主持人耿宝（BRIANGUMBLE）的采访。但是，自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转折，一落千丈到了冰点。

从此，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大转弯。其间，甚至发生过美军弹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以及美国大型侦察机被迫降海南岛的异常现象。所有这些严重问题，无不是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谈判才得以解决。但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中美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又逐渐地缓和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由于中美又共同站在反恐战线上，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近年来，特别是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在中美的峰会上都显示出良好关系的趋势：中美双方都在努力运用求同存异的智慧，以增进合作减少对抗，朝着维护和平

与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回顾往事，从26年前踏上华盛顿土地的第一天起，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到今天，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仍然是：究竟应该怎样去认识美国？我没有对美国进行过学术研究，只能以有限的感性认识来解释自己脑子里存在过的一个又一个“困惑”。如果套用国内凡事总爱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习惯，该怎么看美国呢？当然，毫无疑问，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在外交上目空一切的唯一超级大国。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垂死”，依然还影响着全世界，科技创新往往居于领先地位。就其国内社会秩序而言，一般比较稳定，事事以法律为依据，制度不容许特权的存在。美国人个性自由解放，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有时可能自由得过了头。他们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容侵犯。社会矛盾当然不少，工人罢工和群众示威是常事。每届总统，为了保住宝座并争取连任，都不得不讨好选民，不得不重视社会福利，在税收、失业、养老、救济、福利、公共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政府都予以相当的补助。按照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但是，不能不承认，它通过采取种种手段可以缓解危机，甚至解决了矛盾，又继续前进。有人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民主可以促使资本主义滋生社会主义因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政府要存在下去就不得不照顾大多数的利益。也有人说，这是市场的自由原则与社会均衡

原则相结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挽救了资本主义走向崩溃。

但是，谁又不能不看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都摆脱不了财团势力的笼罩。每届政府政策的差异，除了因为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财团的利益所在，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今的布什政府，目前正处于严重的外交困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企图凌驾全球的单边主义政策，在海外部署兵力，扩大军事存在，妄图以枪杆子打出一个个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权，听从它的使唤。这样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全面的反弹，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美国统治集团内的有识之士，将此称作“超级大国疲劳症”，早已对他们的朝野敲起了警钟。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其前途实在堪虞。

当今世界，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快速发展的最大市场；美国是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具有领先的经济与科技优势。二者之间，在根本利益上，谁也离不开谁。中美两国的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都具有善良勤奋、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彼此业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之间，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必然互利互惠。当然，两国之间，不可避免还会出现磕磕碰碰。但是，我深信，我们两国的高端会运用他们的智慧，经过协商达到解决。两国人民都万分珍惜我们之间已经结成的伟大友谊，不会容许它受到伤害。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第75页）猛，民主和法制建设也要快些。各种监督，人大这个最高层次的监督不可或缺。”

原省人大副主任程里说：“现在应从制度上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真正做到少数服从多数。”

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感慨道：“延安时代，毛泽东回答解决‘人亡政息’执政周期问题时说得很清楚，靠人民的监督。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出在没有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在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老同志个个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原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范希贤直道：“有些干部汽车一辆还不

行，出差公干一辆车，出去游玩一辆车，一人三四辆车，这不是腐败吗？”他希望国家制订严格的《制度法》。

方苞建言道：“如何清除腐败，最根本的，还是民主和监督。民主要制度化，监督要法制化。搞民主不能像西方那样搞，但还是要有所作为。比如在选举方面可以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比如在县一级可推行一把手差额选举，一把手有什么问题的话，老百姓看在眼里，明在心上；一把手差额选举乱不到哪里去。”

（原载《羊城晚报》2006年12月16日A11版，标题为本刊所拟，略有删节）

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

● 申晓亭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英国记者勃脱兰，在写中日战争时，第一句话就说：“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是从骊山的华清池边响起的。”

当年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如果活着，差不多都是过百岁的老人了。我父亲申伯纯就是一个西安事变的亲身参加者，如果活着，今年108岁了，可以说父亲的一生都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亲历西安事变

父亲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怀有报国之志向，毕业后赴广东汕头参加大革命，1927年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离开广东，投奔西北军，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授予少将军衔。1934年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父亲认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毅然决然排除一切困难，参加了革命，为党做地下工作。1934年秋，父亲曾向南汉宸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南汉宸说：“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1月初，父亲奉南汉宸之命去南京见杨虎城，首次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并提出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12月，父亲将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示与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同意。

1936年2月，杨虎城与党的代表王世英、汪锋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从此杨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关系。

此后，父亲一直在杨虎城身边，1936年2月，

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任父亲为交际处长，开展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同时进行秘密联共抗日的活动。这一年，父亲在取得党的联系下，为推动杨虎城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祛除张杨间的猜疑，形成张杨间的联共抗日合作，以及掩护党的交通，向党供给重要情报等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12日清晨，捉到蒋介石后，在新城大楼，张学良对高崇民和父亲等人说：“我这个人胆大包天，现在我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这件事究竟怎样收场，你们要想办法。现在全中国的命运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们不能胡闹，我们要对全中国人负责！你们马上要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善后问题，对我和杨先生两人负责。你们就去开个名单来，送给我和杨先生批准后，马上就开始工作。”

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杨虎城又任命我父亲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

12月14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由父亲代表设计委员会作报告，宣讲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到会群众反应非常热烈。父亲还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连排级以上官佐作过几次同样的报告。

继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29日，在西师大礼堂，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学生开会，到会约千余人，要求当局对放蒋介石回京一事进行解释，军委（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特派身为绥靖政治处长的父亲参加。父亲即席讲演，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宗旨解释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和放蒋的保障条件，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之后，蒋介石背弃信义，调遣大军威胁西安，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加剧的分歧和斗争。父亲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因此几遭极端者的暗害。

当年的父亲,英俊潇洒,激动起来,面色白里透红,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声情并茂:“我们为什么要捉老蒋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洪亮的嗓音牵动了数万人的心。父亲在西安事变中能有所作为,做出贡献,他总是归功于时代的造就和党的引导,他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庆幸自己“在歧路彷徨的时候,总是走比较光明的路。”其实这一切跟父亲的性格也有关系,父亲是个有志气、有勇气、有魄力的血性男儿。“当亡国奴我是绝对不干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父亲完成了思想政治的转变,而一旦皈依革命,便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实,在任何危险的时候都没有动摇过”。

西安事变后,1937年3月,叶剑英找我父亲谈话,中央批准,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从此父亲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华北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军调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一直没有忘记西安事变

194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心意逼成的……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父亲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述张杨被逼上梁山,逼蒋抗日的经过,写文章《回忆双十二》,由新华社发到各解放区报纸登载。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问等职。

父亲亲身参加西安事变,一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亲知亲闻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只是长期的战争环境使他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开国伊始,也是工作繁忙,无暇及此。直至1955年,父亲到政协工作,公余有暇,才开始着手实现这个

多年的宿愿。

1956年6月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两年以来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以西安事变作题材写一本长篇的统一战线小说。我想这在统战工作方面和文艺工作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一工作是极艰巨的。为了准备做这一艰巨工作,两年以来我曾读了不少中外文艺的书籍。我也曾就我记忆所及写出了一些有关的西安事变的史料和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个工作我准备作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也准备作为我一生有价值的贡献。不过我现在担任的事务性工作相当多,使我构思写作的时间太少,因此感到相当吃力。希望组织上今后对我的工作安排上能够适当地减少一些事务性工作,帮助和鼓励我完成最后的志愿,这是我衷心迫切的请求。”

1956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称张学良、杨虎城“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号召有关同志写文章。在总理的支持下,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他在自己的回忆的基础上,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进行采访,随问随记。在那两年他采访西安事变亲身经历者就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罗青长、南汉宸、徐海东、高崇民、郭增恺、刘多荃、王菊人、王卓然、洪钊、于学忠、应德田、李维城、赵彦青、卫立煌、邵力



1930年左右申伯纯在北京

子、李志刚等。其中许多人已经陆续不在了。父亲还大量查阅并记录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如《西京民报》、《上海大公报》、《中央日报》、西安和延安之间信件来往、张杨之间的信件来往、有关人士发表的文章等。

1959年夏《西安事变记》初稿完成,父亲将其送交领导和相关人士审阅,征求意见。

1959年8月,叶剑英元帅谈:“这是一件大事,张学良对党有功,现在写出来很有好处。如不出版,还可以多写一些,有些情况还可以写详细些,如:张学良曾向我谈过要求入党的问题……。”范长江说:“第一手资料,权威资料,搜集这样多的资料真不容易,真是内幕核心的资料,可以藏之深山,垂之永久。”张奚若说:“两天的功夫,全部看过,一个字未忽略过。看了以后增长了许多知识,纠正了过去许多不正确的认识。”

也有人提《初稿》不够突出政治,叙述人事往还的多,从阶级分析,用阶级观点看具体问题少,因此不够深刻等。

1960年至1962年,父亲根据各方面意见,对《西安事变记》进行第一次全面补充修改,1960年12月1日记:“这次修改西安事变记的目的有三:1、落实,将虚假的去掉,将空虚的填补起来。2、求平,将歪的邪的去掉,求正求平,去掉一些杂质,使它内容更纯正。3、更好地组织起来,如设章。这次修改拟完成下述三点:1、更深刻正确的论断。2、把偶然的事件从内在的联系找出它的必然性来。3、尽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观点去分析这个事变。”经过两年的努力,1962年5月《西安事变记》二稿打印出稿。

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事变记》也成为父亲阶级立场有问题、阶级观点不清、成名成家、个人野心的罪状。虽然身处厄境,但父亲不忘自己的历史责任,于1972年至1973年,进行第二次全面修改。1972年12月12日记:“为了纪念西安事变,我今天下决心,从明年(1973年)1月1日开始,着手对《西安事变记》进行最后的修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修改,务期使它成为一本像样的历史书,预计在西安事变四十周年(1976年)前完成,以偿我的夙愿并纪念我故去的朋友们!这是誓言,不死决不改变!”

父亲此时已是74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许多

的坎坷和曲折,又是病痛缠身,但他心中想到的是: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父亲说到做到,从1973年1月1日到2月6日,日日伏案改稿,新年、春节,两个节日,均未休息一天。本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指导思想上有了一些框框,但在实际修改过程中,父亲仍推翻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本着再现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真实地记录了瞬息变幻的历史真相,热情歌颂了两位将军的不朽功绩。之后,他又根据李克农、刘鼎、南汉宸、高崇民、王炳南、王菊人、孙铭久等各位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和知情人所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反复作了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刘鼎,在最后的审定出版工作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自1959年初稿完成,大的修改两次,小的审查和修改不计其数,到1976年,三稿基本完成,定名《西安事变纪实》。

1976年4月下旬,父亲因天安门事件的刺激,突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病,造成口暗手颤,难于行动。右手不能写字,他练习用左手写,坚持修改《西安事变纪实》。1978年,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西安事变纪实》,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最后地写下了“编写说明”。1979年,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父亲,在病榻上看到《西安事变纪实》校样时,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西安事变纪实》于1979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出版后成为重要的党史研究资料。《西安事变纪实》也许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风行一时”,但确实是“难得的史料、非常宝贵”,可以“垂之永久”。

《西安事变纪实》的影响不仅在历史还在文艺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安事变就被编成话剧,登上舞台。根据父亲的记录,1959年2月18日晚,在南汉宸家,父亲曾与吴雪、曾凌等谈西安事变话剧剧本问题,对于剧情设计,人物性格把握等方面都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981年上映并轰动一时的电影《西安事变》是著名导演成荫的作品,而成荫是父亲的女婿,经常听岳父讲起西安事变。1975年10月17日父亲

记：“今天想到一个问题，想写一出西安事变剧本。因想到近来看《车轮滚滚》和《万水千山》两出剧，一个是侧写，一个是由下边写。西安事变剧本也可以由侧面写、下面写。想到这一点，心怦怦然动。立即打电话找成荫同志去看他。见面后我讲了我的意见。成荫认为很难写，因主要人物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均不能出场。问题又太复杂，从侧面、下面写困难也很多。他对我泼了冷水。我还不死心，还要继续想。九时回家，十时寝。”

文化大革命后，电影《西安事变》终于问世，而且一举成功，获得1982年第二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这些，可以说也是《西安事变纪实》成就的折射。

主持西安事变史料整理小组

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全国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父亲任副主任委员，主管全面日常工作。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贯彻总理“把亲身经历留下来，传给后人”的指导思想，广征博采，充分调动了各界人士的积极性，稿件如潮水般源源涌来。仅在父亲工作时期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并留下了3亿字的历史资料原始文稿。《文史资料选辑》不久就显示了它的特殊作用，在国内外久负盛名。

1961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纪念二十五周年之际，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西安事变参加者，宴后决定成立九人小组和七人小组编写西安事变史料（九人）李维汉、林枫（七人）刘鼎、申伯纯、高崇民、阎宝航、赵寿山、南汉宸、杨明轩。七人小组以申伯纯为召集人，由刘鼎负责审查。从此西安事变史料的征集工作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

1962年4月30日父亲召集七人小组开会，讨论西安事变史料的征集方法和七人小组的活动方式。决定着手整理已有稿件，号召有关人士写稿，并邀请专人来写尚未弄清楚的具体问题。到文革时已收集有关西安变变的史料约200万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7月，全国政协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就是主持文史资料工作的父亲。文史资料工作被批判为美化“帝王将

相”，为反革命“鸣冤叫屈”，所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大右派”，遭遇批斗、专政、下干校劳动等不公平待遇，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也因此整整被搁置了十年。

父亲在被审查期间，念念不忘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1971年2月20日记：“张*同志来同我谈话，先问我有什么活思想。我讲了三件事：第一、希望问题能早日解决。第二、腿疾未痊，是否还去沙洋（干校），什么时候去沙洋。第三、西安事变材料的整理。张说：……第三个问题他可以反映。”1971年9月1日记：“今年8个月又过去了，我的问题的解决仍杳无音信，不禁令人焦急。最近人民日报社论看到‘将功补过’这句话，又不禁引起我从新整理西安事变材料和文史资料的想法，这两项工作是需要做的，也是我‘将功补过’的机会。我过去曾向李代表提过这个问题，李代表也表示赞成，但又事隔半年多，一点消息没有，我得不到解放，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再提。眼看我一天天地老了，没有多长的时间要我补过了，想到这里，焦急万分！”

1972年12月14日父亲给总理写信说：“……西安事变史料征集工作，已征集了一些零散资料，约200万字，我也写过一本《西安事变记》草稿，约20余万字。这些材料都需要审定、修改和补充。我现在除读书外，闲着没事干，决心以衰老之身，患腿关节炎已不良于行）对这些材料进行修整提高，务期在1976年（西安事变四十周年）前将这一工作做好，完成您的委托，留备历史参考。”

1973年4月父亲恢复组织生活，在父亲的积极争取下，1975年12月正式恢复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1975年12月16日召开西安事变史料工作会议。首先的工作是清查稿件，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稿件有所丢失，然后计划编辑出版几个专辑，要求“工作限明年上半年整理完竣，下半年印刷、归档。”

1976年，父亲78岁，他不顾身体衰弱，不辞辛苦，每日亲自审阅西安事变稿件，每星期开一次整理西安事变史料工作会议，父亲想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内把西安变变的史料整理出来。

1月8日周总理逝世，父亲极度悲痛，1月14

日记：“夜四时半以后再睡不着，默念七律一首：《在整理西安事变史料中悼念总理》：西安事变四十年，史料编写近周全；为挽民族危亡劫，暂抛阶级血海冤；旋乾转坤成枢纽，掌舵撑篙仗巨拳；一部统战模范史，未蒙鉴定竟长眠。”

不料，三个月后，父亲悲愤成疾，也病倒了，终究未完成在西安事变四十周年出版西安事变史料集的心愿。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1986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文史资料委员会将所征集的西安事变史料编辑出版了《西安事变亲历记》、《西安事变简史》两本书，三亿字文史资料存稿也成为巨大的历史文化财富，在被开发利用，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双十二”纪念日

父亲的一生都与“双十二”有联系，因此，父亲也更加关注这个日子，即使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他在心里也要纪念这一天。这是父亲的日记：

1963年12月12日：“今天是双十二，是西安事变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在到政协办公批文件时，才想起今天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日，否则简直就忘却了。周总理不久前对特赦人员讲话时，曾告诉徐冰同志西安事变三十周年时（即66年）要开一个纪念会，我这几天曾同有关人士研究这个纪念会如何开法，并印几本西安事变史料，画几张油画，在西安筹办一个纪念馆等等。我是最关心西安事变的人，但今天这个日子连我几乎都忘记了，可见记载、图片、实物纪念展览的必要。”

我对张汉卿先生还有一个幻想，就是台湾问题在二三年内能有和平解决希望，如蒋介石病死，蒋经国继承，美国地位在国际形势日趋衰落，台湾返回祖国怀抱，那时张汉卿还健在，以他做代表返回大陆讲条件，那将是多么好的事情。我更幻想这个美梦能在西安事变三十周年时实现。”

1970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当着这个日子，我不禁感慨万端，原计划三十周年的时候，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给冲掉了。现在转眼又过了四个年头，明年是三十五周年，不知会有什么纪念活动……过去几年征集到二百多万字的史料稿件，现在还乱放着，没有最后整理，我写的《西安事变

记》一书，经过文化大革命迫切需要改写，但这些事我现在因为尚未解放，也无从着手，心中未免焦急。”

1971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原想找几个有关人，如米暂沉，在一起聚会一下。后来想我刚刚从干校回家，这样搞不方便，怕有不好影响，所以作罢。”

1972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和兴奋！感慨什么呢？不但杨先生牺牲了，张先生的苦难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就以西安事变史料九人小组来说，五个人去世了，三个人还关着，就剩我一个尚能勉强地自由自在地活着，怎能不使人感慨！兴奋什么呢？西安事变毕竟伟大胜利了，成为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打垮了日寇，驱逐了蒋匪，建立了新中国，国家日益昌盛，怎能不使人兴奋！……”

1973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七周年纪念日，我每逢这一天总是心情激动，浮想联翩。特别是今年这一天是《西安事变记》第二次修改稿最后完工的一天，使我更有无限的感触和无比的高兴。今天清晨五时醒来，我就考虑今天这个日子我怎么过呢？先想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请几位熟朋友，如王炳南、米暂沉、吴波（他那时也在西安）到展览馆餐厅去吃西餐，聊表纪念……”

1974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八周年纪念日，中国新闻社向我征稿，又看到台湾中央日报蒋经国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不管写出来的稿子是否有用，我竭力写了《忆往事》一文，以纪念西安事变三十八周年。写了好几天，今天整天抄写，算是写出来了。文章写好，感到轻松高兴。”

1975年12月12日：“晚上刘鼎来，我们二人共同纪念双十二纪念日。可谓冷落极矣。”

1976年5月父亲罹病，没有再留下记录。1979年7月，父亲怀着没有见到两岸统一的遗憾溘然长逝。

2006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我感到父亲那颗炽热的心仍在跳动，好像在对我说：“每年我都要纪念这一天……”

我想告诉父亲：“现在许多人都在纪念这一天，您梦想统一的那一天不远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 刘仰东

花十年心血几译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穷二十年精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大量学术著述,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五老”,大体就可以概括侯外庐先生留给学术界的遗产。但是,和其他一些名家不同的是,侯外庐这些成就背后的人生阅历,记载寥寥,更非广为人知。正因如此,前些时候我走访了他的长孙、如今也已学有所成的侯且岸教授。

结识李大钊

侯外庐 1903 年生于山西一个著名的地方——平遥。相对其他几老,他要年轻 10 岁上下。侯且岸认为,爷爷的经历在同辈学者中,是颇具典型性的。即生在世纪之交,幼年受私塾教育,启蒙于五四时期,求学于二三十年代(接受新学、出洋留学),成就于三四十年代。这就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个看上去有点不近常理的现象:被视为对文化事业是一种摧残的战火年间,却成为国内一代学人成果叠出的时代。侯外庐的四部力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船山学案》,都诞生于抗战年间。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侯且岸说,祖父的个案绝非孤证,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因而没有理由忽视抗战期间的文化建设与思想启蒙。

说到祖父的学术之路,侯且岸特别提到了李大钊。也可以说,李大钊是侯外庐一生为之献身的学术事业的引路人。上世纪 20 年代初,年轻的侯外庐从家乡进京赶考,被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同时录取,一般考生此时面临的是选择哪个学校或哪个专业的问题,侯外庐则断然决定,同时就读两校,在政法大学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可见

他的求知心情有多么迫切。苦学期间,他最早接触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便是李大钊所写的文章。

1924 年,经早期共产党员高君宇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此后,侯外庐经常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对各种理论的见解等问题登门向李大钊讨教,并借阅一些相关著作。直至晚年,他还清楚记得向李大钊借过的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英译本)。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李大钊又介绍侯外庐认识了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陈瀚笙。后来,侯外庐和几个朋友筹办刊物《下层》,但资金短缺,便向李大钊求援,李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仍帮忙从邻居李石曾家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并嘱咐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下层》问世后,尽管很受读者欢迎,但麻烦也随之而来,由于刊物宣传的是进步思想,很快被军阀政府取缔。《下层》遭查禁后,侯外庐为还那笔借款,又去见李大钊,这是他和李大钊的最后的一面,也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

见面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后来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他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赞同侯外庐提出的翻译马克思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谈话,用侯外庐晚年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1927 年 4 月,李大钊遇害。此时,侯外庐已携妻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

李大钊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境界、学识、人格和操守,一直激励着侯外庐,几十年而不变。

初译《资本论》

1927年夏天,侯外庐夫妇登上驶向巴黎的火车。此前,在哈尔滨等签证的时候,他意外地在书摊上买到了《资本论》等数种经典著作的英、日译本,于旅馆中连日研读,想起李大钊生前的嘱咐,侯外庐决定,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

到法国后,侯外庐只在巴黎大学挂了一个名,就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为直接翻译德文本《资本论》作准备。1928年,他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翻译《资本论》,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因而过程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各种学科障碍重重,每遇难点,侯外庐往往不得不停下笔来“补课”,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诗歌、数学、机械学……都在侯外庐的“补课”范围。由于必须倾注全部精力,“勤工俭学之工”已形同虚设,基本经济来源被切断,侯外庐夫妇只能靠家里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渐而由坐吃山空终至囊空如洗。大体

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时也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侯外庐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

实际上,早年译读《资本论》的艰辛,又何止这些笔墨所能形容的点点滴滴呢!我翻译《资本论》十年中,文字上最难进展的时期,是旅法试译的两年。这两年中译得的二十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的。每一段文字的突破,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十几年后在重庆,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这番话虽说是趣谈,却让我感慨不已。我没有梁启超、郭沫若那样的天赋,对我来说,早年翻译《资本论》,从来不曾体验过走一步捷径的滋味,只是全心全意地啃着坚果,而乐在其中。

当时,精通日文的廖梦醒也在法国,她花了不

少时间和精力拿侯外庐的译稿和日文版《资本论》进行核对,然后告诉译者:“和日文版比较,中文意思表达得可以。这简单随意的一句话,侯外庐却感到胜过任何褒奖,信心也因此倍增。

1930年,因一贫如洗,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侯外庐不得不收笔,带着妻儿和《资本论》前二十章译稿动身回国。去莫斯科转接组织关系时,途经柏林,侯外庐特意在此停留了两天,找到正在柏林的成仿吾,



1972年10月,侯外庐(中)与同事合影

希望通过他转告正在莫斯科的张闻天，为自己争取一个留在莫斯科继续翻译《资本论》的机会。成仿吾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和侯外庐共同完成《资本论》的翻译。离开柏林时，为避免麻烦，侯外庐把二十章译稿暂存在成仿吾处。在莫斯科，侯外庐尽管受到张闻天的热情接待，但这个计划终因被中共驻第三国际负责人张国焘否决而未能实现。

此后，侯外庐又几次从零开始，再译三译四译《资本论》，其间，存在成仿吾那里的手稿失而复得，托续范亭带到延安的手稿则不幸毁于战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告慰译者的是，1932年，国际学社出版了他和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直到1938年，听到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即将出版的消息，侯外庐才放弃了这长达十年之久、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和精力的努力。他后来总结说：

《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何况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重庆交游

抗战爆发后，侯外庐于1938年辗转来到重庆。侯且岸说，爷爷在重庆生活了八年，此期间，他开始涉足历史学研究，并自1939年起一直担任《中苏文化》主编，和各界人士（包括国共两党高层人物及文化界名流）有广泛的交往，他本人也对他们有所记述和评论。

在重庆，侯外庐结识了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杜国庠等同行。他与郭沫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天官府。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一见面，我急不可待地告诉他，1930年成仿吾曾有设想，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团出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苏联，和我共同翻译《资本论》。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的译况……那天，我对郭老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我启发极大，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史学，正在继续他做过的工作，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郭老非常高兴，虽说他的名望那样高，我感觉他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我这个小兄弟，自告奋勇地前来与他为伍的。

此后，用侯外庐自己的话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得到过郭老不同寻常的帮助”。例如，郭沫若清楚侯外庐对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认识和他很不相同，因此对一些共同注意的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和他也很不一样。他明知侯外庐会用他提供的材料来佐证侯自己的观点，甚至对他提出异议，却仍把他亲手搜集的珍贵而丰富的材料全盘端给了侯外庐。

在重庆时，侯外庐和翦伯赞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过从最密”。因而侯外庐和翦伯赞的交往，不止于学术上。在侯外庐的印象里，“翦伯赞才思敏捷，性格活跃，善于结交，谈吐幽默，个性鲜明”。翦伯赞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是个忙人，社会活动多，教学任务繁重，但生活很讲节律，事事都有计划，例如写文章，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字数，有条不紊。两家夫人也常在一起聊天，翦伯赞夫人告诉侯外庐夫人，翦晚间工作常过午夜，她每晚必陪侍灯下做针线，从不离开一步。1942年，翦伯赞大概因为《中苏文化》的工作安排问题对侯外庐产生一点误会，侯并未察觉。有一天章伯钧请客，周恩来把翦伯赞和侯外庐拉到一起，说：“你们那个《中苏文化》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来，一起喝一杯！”翦伯赞应声端杯一饮而尽。侯外庐则不明所以，把酒杯轻轻一推，说：“没有的事。”周恩来抓住侯外庐说：“外庐为什么不喝？好，你不喝，再罚一杯。”侯只得从命。周恩来又说：“来，伯赞也来陪一杯。”翦伯赞和侯外庐一起干了第



1949年,侯外庐(中排右二)出席第一届政协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人员合影

二杯酒。周恩来说：“好了，现在和好了。”侯外庐最终也没弄清事情的究竟。但翦伯赞显然解除了误会，此后对侯外庐格外亲热。翦伯赞就是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侯外庐晚年曾说：“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我和伯赞的分歧一辈子都没有解决，不能说由此没有产生一点隔阂，但是，可以说，他和我，一辈子都是相互了解的。他了解我的论点的特点，了解我的为人和脾气，就如同我了解他的思想方法，了解他的品格和个性一样。我们确乎是真正认识对方价值的。”

侯外庐到重庆不久，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鼓吹“乡村建设运动”的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有意思的是，这一年来，两家之间的关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侯外庐说，他和晏阳初甚至“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颌首之谊”。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地道的西化生活，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

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在重庆的八年，侯外庐交游甚多，社会活动频繁。他与周恩来时有会面，曾三次应邀出席欢迎毛泽东到重庆的不同场合的宴会，拜访出过狱不久的叶

挺，他和孙科（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多次发生工作接触，他曾和李约瑟纵议《老子》，和杜国庠、陈家康等人拟定《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计划，他也是“小民革”的发起人之一，他和冯玉祥、王昆仑、邓初民、吕振羽、覃振、谭惕吾、吴茂荪、张友渔、萨空了、陶行知、李公朴等各界名流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过往。总之，他的生活是充实而繁忙的。

遨游 历史的天空”

侯外庐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真正涉足历史研究领域，是在1939年，这年，他36岁。按常理论，起步不可谓不晚。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是，他翻译《资本论》，历十载而未竟，研究历史学，则一发而不可收。谈到这个话题，侯且岸引用了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我曾用两个星期写出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半年完成一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年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年写一部《近世思想学说史》。”抗战期间在重庆，侯外庐一方面和各界人物进行广泛的交往，一方面著述立说，不出几年，侯外庐的学术成果已蔚为大观，并且思维之新、理论之厚、学识之博、视野之开阔，都走在了当年学术研究的前列。

侯且岸说，祖父的成就并非从天而降，历史也

不是一门可以一蹴而就的学问。此前的二三十年，无论是幼年读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还是青年时期攻读法律、钻研理论，以及用十年之功翻译《资本论》时涉猎的各门学科，对侯外庐后来的学术研究，都起着这样或那样的推动作用。一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必然会呈现一个厚积而勃发之势。侯且岸举另一位《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为例，他和侯外庐年龄相仿，以研究经济学见长，但他的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虽不过十几万字，至今就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而言，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从两人知识和研究背景的某些巧合（都是在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本身的某些规律，对一个专题的突破和创新，不仅在于对专题本身所下的功夫，还必须具备开阔的知识面，特别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所谓“功夫在诗外”，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

在世人心目中，侯外庐的本业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但翻翻他的论著目录，就会发现，他的学术视角绝不是这个“本业”所能限量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大量人物、个案和专题，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而在其业内，侯外庐同样很看重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关于章太炎思想的论说，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的上溯到17世纪的近世观，至今仍自成一说。

校长和家

建国之初，侯外庐出席一届政协会议之后，1950年从北京来到西安，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上世纪50年代，著名大学由著名学者当校长，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诸如马寅初（北京大学）、王亚南（厦门大学）、陈望道（复旦大学）、李达（武汉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杨石先（南开大学）等等。六年后，因拟议中的陈寅恪不愿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又调回北京，任该所副所长（所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

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同样倾其全部的精力。他为学校制定了“求实创新”的校训，他大力发展工科建设，尤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西北大学地质

学专业，后来有“中国石油工作者的摇篮”之称。他离校后，对西北大学仍怀有着很深的情感，“文革”中最痛苦的岁月，他还惦记着学校，想着学生，念叨着要回学校看看，但终没能如愿。去世后，他的一半骨灰长眠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对老校长也感情弥深，如今校园里伫立着侯外庐铜像。上世纪90年代，侯且岸到西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很多西北大学老人向他表达了对老校长的怀念，他们告诉侯且岸，当年节日游行时，西北大学曾有学生自发打出了“侯外庐万岁”的标语，可见侯外庐在西北大学的威望和口碑之高。

侯且岸告诉笔者，他出生时，爷爷50岁。因为父母援越，他从小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长大的，名字也是爷爷给起的。当时家里的条件已远非昔比了，冰箱、电视机等一应俱全，住房很宽敞，书房和工作间是分开的。爷爷工作起来精神非常专注，他和弟弟常在爷爷脚下的地毯上爬来爬去，但丝毫不影响爷爷的注意力。爷爷吸烟，经常是烟头烧到了手指也没反应。除了专注，侯外庐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记忆力极强。侯且岸说，爷爷讲课通常是只带粉笔，不带讲稿。

谈到自己的名字，侯且岸说，爷爷对“名学”向有偏好，也爱给人起名字。他自己原名玉枢，“外庐”是后来改的，出自苏东坡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取走出来看庐山之意。他还爱研究别人的名字，曾认为鲁迅之名的“迅”可解为“狼子”、“母亲生的大力士”，并在一次宴会上问过许广平，许笑而不答。侯且岸自己的名字，后来也经常被人猜问，不少人觉得这个名字有宗教含义，揣测他是佛教徒。其实这是一个带有政治含义的名字。侯且岸出生的1953年，正值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和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社会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且”寓意为“新生命的开始”；“且岸”则意为“一个新生命终将会达到彼岸”。作为长孙，侯且岸深得爷爷的呵爱和培养，但世事无常，侯且岸正当读书年纪，十年动乱“骤起，他不得不随大流插队务农。侯外庐后来已不指望长孙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作一个学术传人，虽然愿望还在，这是他的一大憾事。1994年，侯且岸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专门带着毕业论文和学位证书，来到八宝山，用自己的成功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责任编辑 萧 徐）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

● 李妍

“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历史学及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那时刊物刚满一周岁,最近的文章是2005年第4期发表的《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前后整整50年。这在刊物作者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在经历了土改、思想改造、院校调整之后,新中国历史学刚刚起步、真正起步的时候《历史研究》于1954年创刊了。为创办《历史研究》,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新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胡绳、侯外庐、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文,也在第一、二期连续发表声称“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给学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是1955年。过完24岁生日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金冲及注意到《历史研究》在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又在第6期发表了东北师大孙守任的商榷文章。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学术平等的氛围鼓舞激励了刚刚教授中国近代史一年半的金冲及,他利用春节放假写就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文章对胡绳和孙守任的观点不完全赞成,胡、孙纠缠的是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金文认为,历史时期,应该用社会经济的标准与阶级斗争的标准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历史研究》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做什么修改,只删掉了“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几个字。可能是尹达主

编、刘大年副主编觉得,既然是学术讨论,就不要讲“前辈”了。50年以后,金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并由衷称道《历史研究》给予了“牛犊”与“虎”平等言说的权利:“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这种对待青年作者的态度被继承和发扬下来。新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着力培养青年作者仍是其中可圈可点的一页。这些青年作者在老编辑左步青、章鸣九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叶晓青。

叶晓青原是上海一家银行的职员。

1980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姜铎的文章《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重点是强调洋务运动负面的作用。姜文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了叶晓青寄来的文章,与姜铎商榷,洋洋洒洒,有两万多字。责任编辑章鸣九一看就估计到作者是个年轻人,整篇文章尚未达到发表的水准,但他发现其中有一段是谈科技的,讲洋务运动中引进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观点比较新,于是回了一封长信,建议作者专就科技问题展开讨论。叶晓青根据编辑部的意见撰写了《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又改了两三遍,发表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后来叶晓青又送来她的第二篇文章《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编辑部将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分别寄给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李侃、陈旭麓、夏东元、胡滨、唐振常等等十几位近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请他们提意见。这十几个人都回信了,对文章予以肯定,也都提出了意见。叶晓青根据这些意见作了修改,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1期,反映甚佳。这两篇文章改变了一个青年人的人生轨迹,叶晓青从一位银行职员变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专业的专业

研究人员。二十年后,笔者采访就职澳洲某大学的叶晓青,她说:

是《历史研究》帮助我把研究历史变成一种职业。在这之前,研究历史在我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职业且不说,发不发表都不要紧。由于我和《历史研究》这段关系,使我走上可以以此谋生的道路。《历史研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没有《历史研究》,没有《历史研究》发表几篇文章,社科院怎么可能调我呢,因为我是没有学历的。我一直对这个过程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现在还没有克服。

“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已是耄耋之年的著名史学家李埏先生至今仍清晰记得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经过:

解放初期那几年,运动不断,根本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也不敢写。我们都要参加思想改造,自己骂自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后来《历史研究》创刊了,我看到上面有陈寅恪、侯外庐、范文澜几位先生的文章,感觉到《历史研究》还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定,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中,我对侯先生的文章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涉及的专题和我有关系。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就想写点笔记、读后感之类的。刚好不久学校要评职称,需要每人提供一篇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那篇文章。

文章写好后我就投给了《历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说文章太长了,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我改成了23200字。寄去后不久,上面派我到北京,开教学大纲的会议。

到北京后我先去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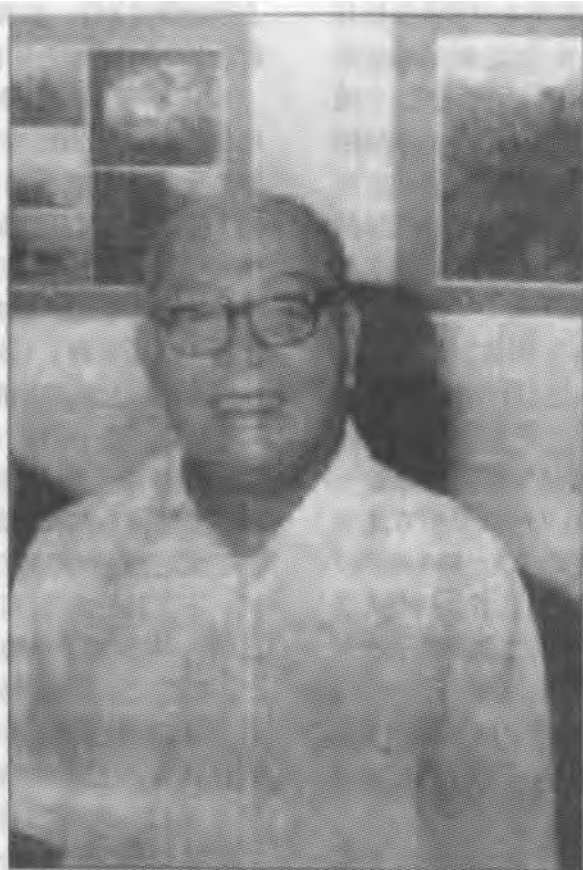
向达先生。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问先生怎么知道啊。向先生说,有一天,侯外庐先生到历史所二所开会,二所即现在的历史所,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侯先生平时来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侯先生到后赶忙说,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因为我修改一篇文章,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结果就迟到了。这篇文章我们要用。有人问是谁的文章,侯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是从昆明寄来的,名字也很怪,叫李埏,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历史研究》编辑部知道我来北京开会,于是他们通知我说,最好到编辑部来一趟。一位编辑拿出稿子对我说,你看上面有很多批语,是侯先生审的稿,侯先生批了很多意见,希望你拿去看一看,你是后辈,虚心一点。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回去看,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辑部。编辑问,你怎么改得那么快,我说,我自己的文章,很容易看,当然看得快了。编辑问,你认为侯先生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侯先生主要有三条意见,但第一条意见我不能接受。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从商周讲起,

这个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侯先生的意见很好,但如果照侯先生的意见做,我只好三年以后再把文章寄过来。编辑说,不行不行,可不能拖那么长时间。我说,文章要是现在登,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我只好保留,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意见改,你们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编辑说,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不过你是后辈,应该虚心一点。

看来编辑部是尊重了我意见,文章不久后就发表出来了《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1956年第8期)。

李先生这篇成名之作的意义不仅仅在学术上,



黎 澍

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家庭生活状况。文章发表后《历史研究》编辑部支付了460元稿费,《新华月报》、《社会科学战线》又支付了400多元的转稿费。

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一下子收到800多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债还掉以后,我又带着小孩到商店里买了三件棉大衣,我自己一件,大儿子李伯重一件,女儿一件。儿子说,穿大衣真暖和啊。那时确实很穷,有了《历史研究》这笔钱后,生活大为改善了。《历史研究》稿费这么多,是出乎我意外的。那时《历史研究》稿费分为12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郭沫若、范文澜他们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等级,是很高的,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沈元风波”

回望五十年《历史研究》,并非都是如此阳光灿烂的故事,也有令人心悸的往事,其中最甚者莫过于“沈元风波”。

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只有17岁,后来下放劳改,回来后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将他推荐给时任《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沈元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顾颉刚1962年7月2日日记云:“近代史所沈元同志前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年二十余,而学问根柢已好,予所作《大诰今译摘要》付《历史研究》,得其细读,指出若干不妥处,乃得修改一过,可爱也!”能得顾颉刚先生的赞赏,看来确非等闲之辈。黎澍爱其才情,怜其命运,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过沈元四篇文章《急就篇研究》,1962年第3期;《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1963年第1期;这一年第3期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中国历代尺度概述》,1964年第3期。其中三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一个史坛无名之辈,更重要的是一个曾戴过右派帽子的青年一连四登龙门,不啻巨石投海,引起轩然大波。有写文章批驳沈元的,有到学部状告《历史研究》重视右派的。中宣部通知学部和编辑部:以后要注意影响,少发表沈元的文章。

1960年代初,黎澍受到毛泽东应该鼓励青年上进讲话的启发,撰写著名的《让青春放出光辉》

一文。此文打磨数年,反复推敲斟酌,可谓字字珠玑,于1964年3月2日在《光明日报》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对这样一篇颇受好评的文章也有人说三道四,指摘黎文反对政治挂帅、鼓吹“白专道路”。联系到所谓沈元问题,黎澍再一次遭到学部、中宣部的批评。文革期间,黎澍挨斗时,沈元陪斗。

1970年,沈元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枪毙了。顾颉刚先生1970年5月3日日记写道:“今日在医院看布告,知沈元以扮黑人期逃出国,日前枪决,年32。”寥寥数语,布满悲凉。一个年轻而睿智的大脑就这样停止了思想。

“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

如果就发行量和“影响”而言,五十年《历史研究》最“辉煌”的岁月恐怕应该是“文革”期间了。30万份的发行数量,今天全国历史学专业期刊发行量的总和也难以望其项背。“文革”期间的《历史研究》是一本书的题目,这里只想讲一讲它在“文革”有幸“复刊”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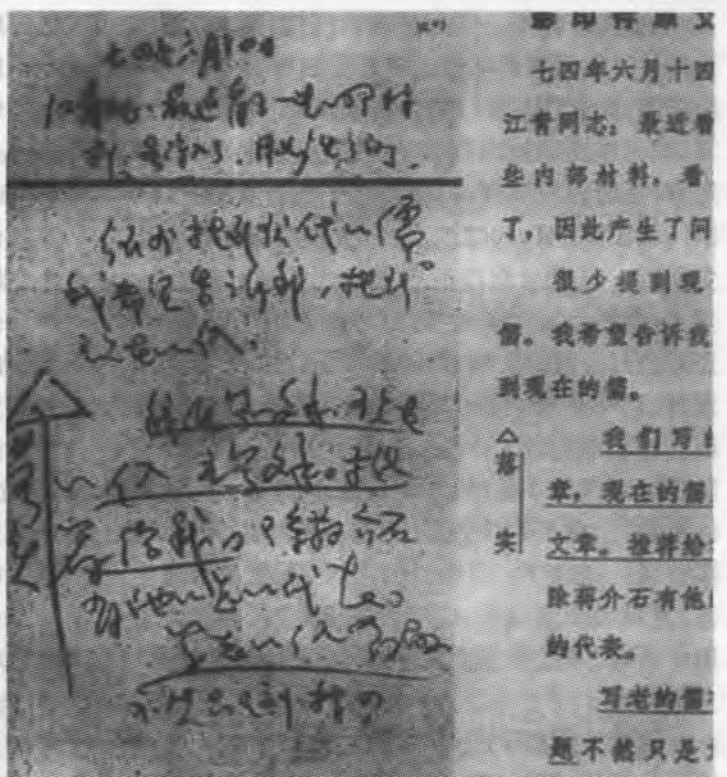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及“史绍宾”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矛头直指《历史研究》和黎澍:“《历史研究》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后,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实际上已经宣判了刊物的“死刑”。《历史研究》在完全失去生存空间的形势下,被迫于1966年第4期停刊。这一“死”就是八年。

1973年5月19日,驻学部军宣队传达《毛主席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听了传达,黎澍马上准备复刊工作。1973年6月5日,黎澍拟就了《历史研究》杂志概况和复刊计划。“计划”中说:“在听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恢复刊物的指示的传达以后,我们立即对《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虑。”这份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情况,二是复刊的条件,三是复刊计划,四是对上级提出的要求。复刊时间定在1974年1月,仍为双月刊。1974年3月黎澍再次提出《关于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的报告》。6月18日学部发出《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等刊物给国务院科教组并请转报中央)的请示报告》。未见批复。

与此同时,国务院科教组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复刊事宜了。也就是说,复刊与《历史研究》原来的主办者学部无关,除了学部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这个重要因素外,也不排除含有不信任的成分。1974年8月1日,科教组将《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请示报告》送给姚文元,8月18日,姚批示同意。8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74)科教办字220号文件《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通知》。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对这伙《通知》作了若干批注。这里将《通知》及黎澍批注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1974年6月14日江青煽动“揪现代大儒”,迟群记录的江青谈话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适应批林批孔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队伍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

黎:下面应加一句:“兹将编辑出版计划通知如下”。

开口便是小偷的语气。“中央领导同志”是少数还是多数?是个人意见还是代表中央意见?非常含糊。是偷梁换柱手法。

一、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

黎:是二是一?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黎:头二句重复,文理不通。

“破字当头”。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唯心史观。

黎:没有讲研究历史,破与立缺乏联系。

开门办刊物。大力组织工农兵写稿,提倡专业理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

黎:不真实。

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

黎:没有做到。

二、任务和主要内容

黎:何者为任务,何者为内容?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总结历史研究,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史学领域的影响。

黎:还有资封是否也要肃清?

(二)批判林彪用孔孟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史,评注法家著作,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黎:如果仅仅为了给法家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何须如此大书特书?前面讲批判唯心史观,这里又加以提倡。一二两点暗藏篡党夺权的阴谋。

(四)开展中国历史(包括各民族史)和外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以近现代史为重点,重视家史、村史、厂史、连队史的研究。

(五)讨论重要历史问题,评论中外历史著作,介绍重要史料,报道国内外史学动态

黎:四、五是对的,但是没有实行。

《通知》的第三部分是编辑机构,要求编辑人员从工农兵理论队伍、高等院校和历史研究部门选调,要老、中、青三结合。”第四部分是出版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印数暂定40万册。1974年10月出版试刊号,印发3000本。11月11日,科教组给姚文元写了《关于〈历史研究〉试刊号修改后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13日姚文元批示,张春桥、江青圈阅。12月20日正式公开发行第1期。因印刷和征订原因,第1期发行255450册,到1975年第1期发行289150册。编辑部拟定了一份《全国工农兵及专业理论队伍联系单位》名单,其中重点单位12个,包括红星公社、首都钢铁公司、大连红旗造船厂、承德军分区;一般单位33个,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等“榜上有名”。这份名单还印有“密件”二字。

黎澍是《历史研究》的主编,复刊时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但并没有让他负责。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组成新的政府,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周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在教育部,应该交回学部。1975年8月学部领导小组组长林修德正式通知《历史研究》将交回学部,准备接收。9月4日晚《历史研究》编辑部领导小组组长拜访黎澍说:经7个政治局委员批准《历史研究》交学部接办。9月8日,正式向学部领导小组办理交接。就这样,刊物回到了学部。学部决定由黎澍负责。

“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

由上述可见,“文革”期间复刊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是在“四人帮”的一手操控之下,成为“四人帮”实现乱党乱军乱国目的的舆论工具之一。我们看几篇论文的题目,大概不会怀疑这个判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1975年第1期)、《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5年第2期)、《道家与西汉儒法斗争》(1975年第3期)、《利用〈水浒〉识别投降派》(1975年第5期)、《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1976年第1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1976年第3期)。此外,还有江青亲自送芒果可为物证。当年编辑部党支部书记的回

忆却展示了另一个历史现场”。

1974年8月24日,急如星火地把我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什么《历史研究》要急于恢复?背景是什么?表面一个背景,实际上有另一个背景。表面的背景是批林批孔,实际的背景主要是跟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三北边界,东北、西北、华北,当时这个背景是不能讲的。领导同志交的底以及后来我们组稿的重点、配备的顾问,让我主抓什么,都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当时要我限期出刊。出刊前重头文章已经组织好了(余绳武、史宇新)的文章,讲中苏边界问题,那是重点文章,别的都是临时凑的。为了配合外交工作,必须在国庆节前出来,这是我的任务。

当时有两条线,“四人帮”是一条线,李琦是周总理这条线,组织上针锋相对。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另外,为了保证重点任务完成,李琦亲自出面,给我配了两个部长级顾问,一个余湛,分管苏联东欧的外交部副部长,一个罗青长,中联部副部长。我单独去见外交部的余湛,单独去见中联部的罗青长,都是讲国际斗争的事,这跟批林批孔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周总理的班子。

《历史研究》即将出刊的消息,新华社广播了《人民日报》也做了报道:“这一期刊登的《驳谎言制造者》、《“新土地的开发”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的见证》三篇文章,就中苏边界的一些问题,用无可辩驳的确凿史实,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苏修的种种谎言和谬论。”重点介绍了余绳武的文章。我们当时在前门饭店办公,苏联大使馆、各国家的大使馆都在找《历史研究》在什么地方,因为刊物上没有写地址。

这是跟苏联的关系,是国际斗争,不能讲。编辑部其他人不知道这个背景,只有我清楚。表面上周一良也是顾问,两个部长顾问只有我知道,李琦给我写介绍信,让我去找他们。重要的稿子表面上是我审查,实际上是送两个部长看,他们从外交口径上,从斗争策略上把关,史实问题他们不管。虽然每期稿子也送梁效大批判组审查,但梁效根本不知道这个背景。

批林批孔,要办这么个刊物干什么,到处都在批林批孔,除了《人民日报》,各地方大报小刊都在批林批孔,还要《历史研究》干什么,而且不惜

重金,住在和平宾馆(开始住在前门饭店),四菜一汤,集中了一批教授。李琦是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如果是批林批孔不会让李琦来抓。再看看那时候的《历史研究》,批林批孔也很热闹,但没有什么重头文章,没有什么特色,都是大路货。没有人交代应该批什么,不要批什么。急于在1974年底恢复《历史研究》,就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反修斗争。表面上也搞批林批孔,所以我说有点“两面政权”的味道。

上述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文字材料来佐证,也没有任何当事人做出旁证。换句话说,这个回忆目前还是一个孤证。但其中不乏逻辑的合理性。

这一出历史剧,落幕不过三十载。两个历史场景,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笔者力所不逮,一时无法判断。个中所展示的历史复杂性,大概也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吧。辨清这一历史真相的任务也许有待后人来完成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题目新颖、思想深邃、理论缜密、文字清新的文章,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在历史学界及其他领域的罪行,许多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

其影响早已溢出史学的边界。编辑们到上海出差,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人奉为上宾,设法从其口中打探理论动态。人们是把《历史研究》当作政治刊物来读的。就在很多编辑部成员陶醉在这“无限风光”的时候,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指示:到了一定阶段,应该把政治色彩淡化,不能老靠批四人帮立足,应该搞学术问题。无论今人后人如何评价政治生活中的这位院长,我们不能不说他的指示,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共产党理论家的卓见。揭批“四人帮”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使命,《历史研究》在出色完成这个使命以后,很快将办刊重心转向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讨论。

300期刊物连缀了《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她是新中国历史学发展演进的一个表征;而这些文本背后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人们,《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是如何写成的,以及她何以呈现如此的样态。这些“故事”与《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骨肉相连”,也与无数历史学者的治学生涯息息相关;可以说《历史研究》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责任编辑 萧 徐)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4641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7 84608848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解决听不见
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 的交往

● 楚泽涵

吴晗（字辰伯）是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当时吴晗叔叔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父亲则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与吴晗是同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和吴晗又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工作，吴晗负责联系青年学生的工作，两人又成了同志，父亲称呼吴晗为“辰伯”，吴晗则称呼父亲为“图南”，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方。父亲则在当年七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同志被暗杀后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并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1948年底父亲取道天津和静海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李家庄，此后不久，吴晗也到了李家庄。这段时间，父亲和胡愈之伯伯、沈兹九伯伯、周建人伯伯以及吴晗等朝夕相处，后来又在1949年3月随齐燕铭叔叔一起进北平，参加北平军管会的工作，一起接收了当时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辅仁等大学。父亲和吴晗又成了朋友。

1949年3月，随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北平和上海的邮路开通，我们接到父亲从北平寄来的平安家信，母亲和当时在上海的我和弟弟、妹妹等四人，得到父亲的消息，当然十分高兴，我母亲立即给父亲回信。考虑到在上海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安全，按父亲的安排，寄到北平的回信不能写父亲的名字，嘱咐母亲将回信写到北平的某个地址，收信人则写“吴辰伯”。母亲考虑到她的笔迹容易被辨认，因此信封是由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来写，这也是我和吴晗叔叔的一点“文字之交”吧，而且我从此也记住了这个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在父亲和吴晗一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期间，吴晗送给父亲一本他写的《朱元璋传》（是该书的最早版本），这本书我家的兄弟和妹妹都看过，甚至在文革期间，也只是撕去封皮，换了一个书皮保留下来，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这本书写的是朱元璋起家 and 做皇帝的史实故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上世纪60年代，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广积粮，不称霸”。我们马上想起这个口号似曾相识，并在《朱元璋传》中找到其出处：朱元璋打下安庆以后，某个后来被他“赐”为“国姓（朱）”的宿儒给他出的主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文革后期，基本上没有新书可看的时候，这本《朱元璋传》被我们时时翻阅，一方面是怀念书的作者，另外对书中记述的朱元璋在起兵后，一面抗元，一面对处心积虑的对付与自己不是一个方面军的张士诚、陈友谅辈，开国后所制造的株连几万人的胡惟庸、蓝玉等案件的种种故事颇多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吴晗各自忙于不同岗位上的工作，来往比过去少了，但是由于都在民盟担任职务，也还有机会见面，工作中也或许有些歧见，但是仍然是同志和朋友。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有较长一段时间吴晗没有来参加民盟中央的活动，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

胡愈之伯伯很注意内部的团结，担心吴晗对民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于是约了过去和吴晗比较熟悉的父亲去看他。在和吴晗的交谈中了解到，吴晗是在1959年春季得到胡乔木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要学习海瑞的精神，敢说话；又说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想请他写点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说，这一段时间，他摈弃了一切活动，收集资料，研究海瑞，写文章。后来在1959年国庆节前不久，吴晗的文章《论海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据说文章还经过胡乔木修改。后来在1960年初，又写成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还演出过几场。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这在文艺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已经意识到是一场运动的开始，而且民盟又首当其冲，鉴于1957年民盟机关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使机关工作都难于维持的前车之鉴，因此不免有些焦虑，于是找到父亲商量和交换看法。父亲当时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不久，正忙于人民外交工作和文艺界联系相对少了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两人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父亲问：“写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姚文元是什么人？”

胡愈老说：“是上海滩上的姚蓬子的儿子。”

由于知道姚蓬子过去的叛变行径，父亲很不以为然：“吴辰伯再有不是，也轮不到姚蓬子的儿子来骂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信任，还说过：“胡乔木应该出来说话嘛！”

当时这些话只能在两个人间说说。胡愈之主持的民盟工作，在批评吴晗的问题上只是应付：拖一段时间，然后开几

次座谈会”，批评批评“学术观点”；甚至到了1966年5月16日，那个有名的“五一六通知”传达后，民盟中央在五月底才有“关于停止吴晗在民盟中央和北京市职务的决定”。也就是并没有罢免和撤销吴晗在民盟的任何职务。实际上，当时的民盟中央在胡愈老主持下，基本的办法是静观待变的应付；而且民盟的老同志中没有任何人对吴晗落井下石。可惜的是直到后来，也没有听到过胡乔木出来对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事的说明。——这是后话。

吴晗在新中国建国后主持编辑过一套《中国历史知识丛书》，每本是32开本的很薄的小册子，每一本记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或一个重要事件，历史资料比较翔实而且容易记忆是这套丛书的优点。父亲陆续买齐了这套丛书，放在书柜中最容易取出的位置，不仅他阅读，而且将其规定为孩子们必需阅读的书目，说是让我们增加和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到现在为止，我的许多历史常识除了中学课本中有限的內容外，很多是得益于这套丛书。我现在之所以没有被荧屏上穿着古装的大辫子和小辫子给“忽悠”了，在颇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套丛书。

谢谢吴晗叔叔！



1949年9月，周恩来和参加新政协的部分文化教育界的同志。左起：沈志远、吴晗、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楚图南



1958年10月,丁西林(前右三)和楚图南(前右五)祝贺巴西艺术家在北京演出成功

《 二 》

胡愈之是父亲从1948年冬季在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认识后的终生的、真正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父亲看到小报,提到造反派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陪斗的一批人中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愈之”,并附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胸挂黑牌的照片。而据小报上的批判材料则是建国初期,胡愈老担任出版总署署长,出版了一大批“坏书”。其实父亲明白,当时宣传出版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

虽然有被批斗的经历,但是胡愈老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被完全“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当时民盟被解散,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愈老,则因为相当多的委员、甚至副委员长都被“打倒”,人大常委会没有任何活动。胡愈老只是偶尔出现在某些迎来送往的活动或是红白喜事的名单中,说不上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但是胡愈老并没有消极,据我所知,有几

件事情是和胡愈老分不开的:

1972年,串联周士钊和杨东莼向毛泽东上书言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求“广开言路”;“关心青年”;“注意教育”;

向当时统战部的军代表反映沈雁冰的意见和要求,后来在胡愈老的一再追问下,沈雁冰在1974年恢复了部分名义和活动;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直到在病危时才被解除“监护”,胡愈老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慰问这位老朋友,老战士;

“文革”期间,冯雪峰同志在遭到多年迫害后逝世,按照当时的规定,只可以在八宝山开一个严格控制人数、不发讣告、不致悼词的“冯雪峰追悼会”,胡愈老据理力争,将会标改成“冯雪峰同志追悼会”,为冯雪峰争得了“同志”的称呼,而且私下动员了许多同志去向这位老同志告别;“文革”结束后又是胡愈老和其他同志努力,重新开了一次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则是后话。

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我后来听许多老同志提起胡愈老,都认为他不避风险,能够抓住时机,锲而不舍,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甚至是别人想不到的事情。真是一位可敬的长辈!

“文革”结束后,胡愈老开始撰写回忆文章,有一段提到,1949年他从南洋回国到了解放区后,曾经表示过希望专门从事自己喜爱的出版工作,而不再搞“麻里麻繁”的党派工作了。为此周恩来同志和他谈了一个通宵,说服胡愈老继续参加救国会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就是在“文革”结束,胡愈老回忆这些往事前后,重新负责宣传出版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表示,希望胡愈老能够出来协助他,担任出版方面的领导职务。胡愈老后来说过,胡乔木对他从来都“很客气”,但是胡愈老还是婉言辞谢了,但也趁此机会要求胡乔木同

意由民盟负责办一份杂志,并定名为《群言》,这是新时期以后由民主党派主办的第一份杂志。

后来,胡乔木写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此文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胡乔木在文章中包括爱因斯坦、卓别麟在内的一批20世纪的外国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都加冕为“共产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将卓别麟说成是美国人;后来出小册子时,胡乔木加了一个注释,意思是根据某个读者的来信,说明卓别麟是英国人,后来侨居美国,50年代迁居瑞士,并对来信表示感谢。父亲从这个注释中看出和联想到一些问题,将卓别麟“定性”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不够妥当。因为卓别麟是1947年拍了电影《凡尔杜先生》得罪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50年代被逼离开美国的,1957年卓别麟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因为讽刺了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而被指责为“亲共”,卓别麟对此还有过某些抗辩。现在如果将卓别麟“论定”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则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美国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卓别麟的迫害是正当的。“卓别麟如果泉下有知,也不愿意带这顶红帽子”“给麦卡锡帮忙,给卓别麟帮倒忙”。

当时,父亲正在应《我们的周总理》一书的编辑者邀请,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领导人民外交的文章,于是父亲特别将他所知道的,有关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接待卓别麟,请卓别麟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指示父亲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卓别麟访华,以及父亲和卓别麟通信联系的经过。父亲特别记述了卓别麟的回信的主要内容:语句恳切的感谢邀请,并请理解他由于认识、特别是处境方面的原因,目前没有条件接受访华的邀请。父亲在这篇文章中还加了一句:“近年有人在文章中将卓别麟等列

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我认为,这或多或少反映了对历史知识的无知,也缺乏对卓别麟本人的尊重。”这段文字在《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被删去,在父亲去世后,编辑《楚图南集》收录该文时,根据父亲在世时的意见恢复。我作为知情者,仅录以备考。

呜呼,此胡非彼胡!要求位高而权重者,不“唯上”难,能够做到不“唯唯上”就算不易。据说有一种学科叫“比较文学”,即将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思路、故事加以比较,并探索各民族文学活动的规律。能不能也发展一种“比较闻人”学科,将某些“名人”或“闻人”的“行状”也做些比较。已经有文章将彭德怀与朱可夫做过比较,今后能否将胡乔木和陈布雷加以比较,写一篇《胡乔木、陈布雷优劣论》,以使后来有志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得到某些启示?

《三》

大约是1962年至1963年期间,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王昆仑在《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专栏连续两期发表了题为《论晴雯》的长篇文章(是其《红楼梦人物论》中的重头文章),而且配了一幅晴雯的画像(我记得是蒋兆和先生画的,待核实):一个留长辫子的姑娘,瞪着眼睛望着读者,十分传神,画像上还题了几句:“心比天高,人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厌。”文章对大观园中的这个俏丫鬟的天真和无邪、心灵手巧、心直口快做了刻意的描绘,对晴雯后来被“主子”寻莫须有的“风流罪过”撵出大观园最后惨死夭亡,表



1985年12月胡愈之(右)、楚图南在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上

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

王昆仑在此前后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对《红楼梦》中另外几个人物的评论,但是,浓墨重彩的、倾注了作者感情的华彩乐章无疑是《论晴雯》。当时,报纸上关于国际问题的主题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问题则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一时在中国的主要报纸上竟出现了《红楼梦》中的一位俏丫头,而且文字又活泼传神,使人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当时刚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北京石油学院)当助教,我记得我的同事们也和我一样,在宿舍和饭



王昆仑

厅,有机会总要议论几句。后来王昆仑将《论晴雯》改编成剧本,并交给当时由韩世昌和白云生主持的北方昆剧院排演。在初次演出时,父亲和母亲都受到邀请去看戏,那天邀请和去看戏的主要客人是周总理。

我母亲彭淑端和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是老乡,而且从小又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在古稻田)的同学,以后又是多年的朋友,而且知道曹孟君当年和我母亲的妹妹彭慧等一样,是抱着当时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印本《红楼梦》,可以不吃、不睡觉的“红迷”。到了剧场,母亲见到曹孟君,两个人拉着手,就到一旁说话去了,看戏时又在一起,曹孟君边看边给母亲讲,好不亲切。据母亲事后回忆:“戏是演得真好”,演员是“真认真”,尤其是晴雯挑灯抱病补孔雀裘,“硬是把个晴雯演活了”。演出结束,周总理在休息室和王昆仑夫妇,还有我的父母等少数几个人谈话。据母亲后来回忆,周总理对王昆仑说:“文章写得好,戏也写得好,演也演得好。但是周总理突然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昆仑啊,听我一句劝,戏不要再演了,文章也不要再写了!过去的就算了。’”母亲后来对孩子们回忆时,还表示过:“多可惜”“这么好的戏让大家多看看嘛”!父亲则没有说话。这以后,报纸上和舞台上,晴雯和大观园里的小姐和丫

头们都销声匿迹了,我也就没有机会看这个戏。

王昆仑也是“文革”期间没有完全被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多年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据当年曾经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王副市长是组织每年“五一”、“十一”游行庆典等活动的专家。所幸的是《论晴雯》和昆剧后来也没有遭到像《海瑞罢官》一样大规模的批判。因此上述的对晴雯故事的解释是本人的理解和体会。按惯例,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的理解往往有所不同,如果对原作者的本意有所唐突,还请在此下的长辈

见谅。

我还要说一句:谢谢昆仑叔叔和孟君阿姨,是他们有意或无意中教会我懂得了晴雯,学会了看戏!祝二老安息,或可在那个世界里和我的父母一起分享读书和看戏的乐趣。

《四》

丁西林伯伯比父亲年长几岁,也是父亲多年的老朋友:1954年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父亲担任会长,丁西老是副会长;1958年国务院设立了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父亲和丁西老都被周总理任命为副主任,一直到“文革”期间这个单位被撤销。丁西老的夫人叫李逸,是云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头人的后代,父亲和丁伯母,又有一层同乡关系。

丁西老早年留学英国,学物理的,说话做事情都很严谨,衣服仪表总是十分整洁,在机关里面,丁西老说话做事都很谨慎,从不多说话,也只不过问与他工作无关的事情。1961年夏季,机关安排丁西老夫妇和我的父母去青岛休假,我的弟弟和妹妹也因正值暑假,就一起去了(我当时因学校安排,在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没有去)。丁西老一家和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同一幢楼里,两家的伙食

也在一起。丁西老对我的弟弟妹妹,就像对他家的孩子一样,要求很严格:吃饭不能出声,搬椅子不能有响动……由于朝夕相处,父亲和丁西老的交往多了起来,而且两老很投缘,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在此以后,放过一部电影《刘三姐》,里面的对歌很精彩,而且是彩色片,风景和演员都很漂亮,年轻人看了都很痴迷。而且当时提出时时事事都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因此这部电影还被当作是批判地主阶级及其豢养的“秀才”的教科书:灵牙俐齿的刘三姐通过对歌把地主老财请来的手拿褶扇、脸上贴膏药的一群酸秀才讽刺挖苦,骂得一无是处,好不热闹,真是体现了“念念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体现了领袖的教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因为这部电影还要介绍到外国去,因此父亲和丁西老都参加过对这部电影的审查,结果当然是通过。

但是在事后,私下,一向出言谨慎的丁西老对父亲说过他的看法,大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由于出身和环境的关系,有毛病,应该也可以教育,何必要由一个黄毛丫头来骂得那么难堪呢!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不对,但是现在读书和读书人总还有点用嘛。这表明丁西老对这部电影所表达的倾向性问题是具有相当保留的。而且在谈话中丁西老还敏锐地感到:是不是又有什么运动,要批判什么人了。丁西老是个好心肠:刚吃饱肚子,大家好好做点事情嘛。父亲则向丁西老表示,对这部电影,他也或多或少和丁西老有同感,总让人感到有点让人不舒服,但又不容易说出来。父亲还劝丁西老,不就个电影嘛,看看就算了。也表达了一种理解和保护的意思。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的人们看电影《刘三姐》大概不会有当年丁西老这一代人的紧张和忧虑,“阶级斗争的弦”也不会绷得那么紧了,电影作为阶级斗争的教科书的作用已经逐渐被淡化,人们对某个电

影或文艺作品的评论也用不着再提心吊胆了。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或多或少演变成“万般皆上品,赚钱品最高”,为了赚钱,就要读书,读书人好像也不那么可憎了。荧屏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又西装革履,神气起来,似乎也不再担心被骂成“翘尾巴”了;而某些来自农村的大嫂和婶子们则忽然成了挖苦的对象……新版的刘三姐至少不再为批判地主老财、知识分子打先锋了,而还原为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善于打情骂俏的泼辣村姑……

丁西老于1974年4月清明节前去世,终年72岁,父亲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没有机会充分的表达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

近日,看到刘三姐故乡——广西宜州来的少男少女们表演的《刘三姐》的歌词,兹录一段:

哥莫器,妹是山顶朝天椒,赌你试来咬一口,包你辣得眼泪飘。

谨以此告慰丁伯伯和丁伯母:刘三姐还是原来那个泼辣多情的村姑,是人们希望美好生活的象征。(责任编辑 赵友慈)

《石西民谈徐铸成划右派实情》 一文订正

● 殷之俊

《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石西民谈徐铸成划右派实情》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某日,石随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去商定《文汇报》编辑部的帅”。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情况是:石西民1955年调上海市工作,1956年7月至1958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宣传部部长,1958年12月至1963年12月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3年12月至1964年12月任上海市委书记,1965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建国后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12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3年12月),1965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由此可见,从石西民1955年调上海市工作至1965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就党内担任的职务而言,他一直比张春桥高,因此说:“某日,石随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张春桥……”,显然在职务上搞错了。

薛禹谷《微生物驻痕》读后

● 张劲夫



选育 NISIN 高产菌株

2002年4月份,薛禹谷写了一本书,叫《微生物驻痕》,送给我。书中讲了她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经历,讲了她的父母,特别是讲了她与小叔孙治方的关系。孙治方原来姓薛,后来到前苏联留学改成姓孙。

书前的序言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希望从科学救国出发,能为祖国繁荣富强添砖加瓦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向往民主自由,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共产党员。十年浩劫几乎把理想变成了梦幻,改革开放又展现出希望的曙光……但又意想不到的阴云出现。社会进步终究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愿从实践中能把真理寻找,期待着明天比今天更明亮。”这代表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代表了像她那样从科学救国出发,然后参加共产党的一批人的心理。字里行间熔铸了对党、对人民、对祖

国无比的忠诚和深沉的爱恋……包括《微生物驻痕》中的若干文章,用十分简洁明快的语言,朴实无华地记录了她光彩夺目的人生。

这使我想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是男是女,只有将自己融入历史,融入人民之中,始终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才能创造出光辉的业绩。

神秘的中共女地下党员

解放初,我当杭州市副市长的时候就与薛禹谷认识了。我知道她是一位神秘的中共女地下党员,有着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因此,她被推选为杭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薛禹谷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1948年8月下旬,她收到父亲薛明剑——荣氏家族(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的大管家,也就是孙治方的长兄来自无锡的一封信。这是在震惊全国“五二〇”惨案后,复旦大学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她当时是助教(父亲担心女儿思想左倾,并不知道当时她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怕她在复旦大学有危险,想调女儿去江南大学任教。薛禹谷及时向中共南方局上海分局领导请示,经组织上研究,考虑到形势发展的长远需要和她在无锡有利于做党的工作的社会关系,决定叫她立即应聘去无锡。组织给她的任务是,除做好江大的教学工作外,要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做好无锡工商界上层的统战工作,并在我军

渡江前后协助安排护厂护校等任务。

荣德生与兄长荣宗敬出身农家，经历过艰苦的学徒生活。但他们都胸怀大志，救国利民，晋身实业，在市场不利的逆境中，敢做敢为，知人善任，终于从一个乡下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庞大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中外有名的“粉纱大王”。荣德生是申新公司的总经理，薛明剑则是该厂的厂长，两人互相信任，关系十分密切。薛禹谷作为中共无锡临工委委员，在中共无锡临工委书记高山的领导下，曾陆续把我党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文件给她父亲阅读，特别是我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文件，他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还都转给荣德生看。荣对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十分重视，反复研究并仔细询问。1948年底，她介绍高山到家中直接与其父面谈。希望转告荣德生先生，谈明政策，不要迁厂，继续搞好生产。临近解放，她曾和父亲多次去荣家，把最新的政策文件及时送给荣看，逐步解除了他的最大顾虑——“共产党来了，能不能继续开厂做生意？”并为迎接家乡的解放，组织了人民自卫队，在护厂、护校、护市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23日夜11时，无锡解放，荣德生所经营的工厂一天也没有停产，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贷款和提供原料等多方面的帮助，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久，荣德生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商界代表，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对能参加人民政权建设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家创办企业的生产发展方面，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展生产力借以克服困难。

当时，薛禹谷的家就在学前街江苏省工业协会会址的楼上，常有机会和前来的无锡上层人士接触和交谈，

如商会主席钱孙卿、立法委员孙翔凤、县参议长李惕平、《人报》主编华洪涛等。薛禹谷身为长女，从小就比较懂事，学习成绩又好，深得父亲的钟爱和器重。她的意见或建议常受到父亲重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父亲的看法和做法，父亲始终只以为她女儿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不是共产党员。一直到无锡解放，她参加无锡地区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会师大会议时，才告诉父亲自己是共产党员。其父备感惊讶，深深地凝视了女儿片刻，又似高兴又似无奈地说：“家中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哪能不胜！”

我国微生物科学的传承人

解放后，薛禹谷当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的助手。戴老退休后，她作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将科学救国的动力，转化为科学强国的实际行动，在微生物学领域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撰写科学论文50多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她临危受命，挑起了副所长、所长的重担，亲自组织整顿被破坏了的科研秩序，收拢涣散的人心，把握微生物科研的大方向，并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把我国微生物科学带到国际科学的前沿。

在薛禹谷八十大寿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门出版了《薛禹谷文集》。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我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谈家桢，为薛禹谷教授的《薛禹谷文集》写了前言，客观地评价说：

薛禹谷教授，1945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她从事科研工作50年，取得了一个一个骄人的业绩。

在20世纪50年代，她在中科院微生物所选育了糖化酶和蛋白质高产菌株，特别是在“文革”以后，她率先在我国开展链霉素质粒遗传和链霉素基因工程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开展链霉素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工作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获得国际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在20世纪80年代末,她又率课题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产生的一种天然食品防腐剂——乳链菌肽进行了高产菌株选育,发酵条件研究和分离纯化,为该产品的中试和工业化生产试验奠定了基础。目前,乳链菌肽已在我国投入大规模工业生产,其产品远销国内外。

她在担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期间,对科研成果应用开发工作十分重视,例如二步法发酵生产维生素C项目,不仅在全国应用,使我国一跃成为维生素C的生产大国,而且在1985年以550万美元转让给瑞士Roche公司,成为当时我国最大一宗技术出口项目。

薛禹谷离休以后,仍然关心和支持所里和课题组的工作,为多种报刊撰写科普文章,继续为科教兴国出力。她如今视力明显下降,请家人给她读报和学术论文……生命不息、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她一个瘦弱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微生物”,在许多人看来,也和她小叔孙冶方一样,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能量。

伟大而平凡的中国女性

薛禹谷也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她不但事业上成绩斐然,同时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有五个子女,个个有出息,个个成才,个个孝顺。历史这样记录着她的成长经历:

薛禹谷的父亲薛明剑,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个人生活十分节俭,粗衣淡食,对公益事业则积极慷慨。幼年时给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刻在家中大厅柱上的两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母亲李钟瑞,是蚕桑专家、妇女活动家。母亲说过“人既来到世间,总要或多或少地做点好事留在人世”,“女孩子对家务事不用专门去学,需要之时再学也来得及,但读书则要抓紧,过了时间则不易读进去了”以及“交友要注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937年抗日战争时,薛禹谷随家避难到重庆,在迁川的国立二中女子部读书。她也曾和同学

们常喜欢在北陪嘉陵江边洁净的沙滩上,凝视着天空变幻无穷的白云,悠悠地编织着一个少女对未来的憧憬。只有当远处传来拉纤船工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时,才惊醒了她的好梦。眼看着成排的纤工弯着几乎和沙滩平行的腰背,吃力地与江涛搏斗的情景,思绪万千,想到祖国还有无数苦难的人。

薛禹谷在合川蟠龙山下度过三年高中,那时候经常响起敌机将临的空袭警报。一次,敌机在蟠龙山上进行了密集的机枪扫射,她亲眼目睹有位新来的同学,在宿舍里被穿过屋顶的一颗子弹打中胸部死去了。当解除警报后,只见防空洞前空旷的田野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受伤的老乡,鲜血染红了大地,有的断臂残肢竟然挂在树枝上。

她18岁考入以“求是”闻名的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说:“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语重心长的话语,如警钟一样回荡在她的耳畔。她在心里回答,到浙大来,就是要学习科学技术,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将来毕业后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当年许下的诺言。

无锡解放不久,1949年薛禹谷调到杭州,先后在浙江省农科所、省农业厅工作。1954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学部,直到1957年调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事工业微生物、放射微生物和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和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1965年作为访问学者曾去英国进修。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薛禹谷同样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薛禹谷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她拼命工作,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1993年她离开了科研第一线,一生奔忙,开始有了歇息,但仍关心课题组的科研工作,致力使实验室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

自然规律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她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老年行列。在生活上可以放缓步伐,抛开几多烦愁,抖去一身风尘,放眼上下,悠然安排晚年时光了。但一颗革命者、爱国者、科学家的良心,仍驱使她一如既往,执著地关心着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和百姓的冷暖。

(责任编辑 萧 徐)

读和凤鸣著 《经历——我的1957年》

● 朱 正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反出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他们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呢?且从这书里举几个例。

作者所在的甘肃日报社反出了11名右派分子。为首的一名是作者的丈夫王景超。他的两篇杂文和会上的一些发言,成了他最重要的右派罪行。而这两篇杂文,一篇1957年5月26日见报,已在决定反右派的党内秘密指示下达12天以后了。一篇1957年6月5日见报,3天之后反右派斗争即公开发动。可以知道,发表之时就已经内定为“毒草”,为供批判的靶子哩。可是为了麻痹他,还给他发了甲等稿费,领导还满脸堆笑的动员他多写,多发言哩。

总编室有一个小青年杜绍宇,平时同王景超有些接触。领导上找他谈话了:“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杜绍宇以为这是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和开脱,于是即按照领导的要求写了些材料。这一下好了,甘肃日报社揭发出了一个以王景超为首的“黑社”,而

杜绍宇呢,就是这个“黑社”的主要成员!

编辑杜博智是个年轻的党员,每开会都积极发言,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他在整风学习会上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导却不是选举的,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人就选不上。”汇报上去,变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再上纲上线,就是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他就这样成了右派分子。

和凤鸣被送到农场去劳动,在那里,接触到一些外单位的右派分子,他们又是怎样成为右派的呢?张掖市医药公司的右派分子石天爱,是军阀石友三的女儿。尽管她在“鸣放”中没有什么右派言论,还是因为这个家庭出身被划为右派了,她自己说,她是“天生的右派”。

地质勘探队145队的徐福莲,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母亲,硬给正在哺乳的女婴断了奶,送来农场改造了。她成为右派,是因为有人揭发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其实,那时她生过小女儿不久,心都放在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她问和凤鸣:“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到这儿劳动的,可我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来的,你说说看!”和凤鸣告诉她: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个答复吓得徐福莲的脸色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

这徐福莲还不是这书中写的最年轻的右派分子,安西县的小学教员王桂芳,才十八岁。她看到单位上公布的选民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去问。

领导上说：“你还不到十八周岁，怎么有选举权？你没资格。”她回答说：“我不到十八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领导上虽然无言可对，还是把她送到农场来劳动了。

书中写的诸如此类的个案还不少，引不胜引。看到这些个案，我就想到，当年只划出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来，是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所编预算的限制，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确定的指标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当年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划出五十多万，已对“百分之十”的上限稍有突破，够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限制，采用诸如此类的手法，要再多划两三百万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这一大批人，给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成了政治的贱民。他们本人，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面对自己身份的这一变化呢？和凤鸣说：“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具体地说，就是争取摘掉头上的右派帽子。劳动中的也好，生活上的也好，精神上的也好，什么困难什么压力都得咬着牙顶住，不这样就怕“表现不好”，影响“摘帽子”。和凤鸣说：“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某场长——以后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编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

盼到1959年10月1日，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应景文章，宣布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使这些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们产生了希望，可是结果呢，她所在的这个中队里，四五十个右派分子只给一人摘帽，实际上只是对这些人的戏弄。在她经历了更多苦难之后，终于想清楚了，她说：“我们当时竟还那么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路。我们的

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竟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在右派分子投入改造之后不久，“大跃进”又发动了。和凤鸣说：“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

大跃进对农业的大破坏，造成了遍及全国持续3年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惨案。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看见过好几种不同的数字，这里只引一个最少的数字。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遇上荒年，灾区的农民常常是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以图逃出一条活命。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却是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没有外出逃荒的可能，面对饥荒，就毫无躲闪的余地了。王景超这时，正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关于这个农场，和凤鸣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做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过饱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这本书以很大篇幅描绘了右派分子在饥饿中挣扎的情形。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有的人把手表、好一点的衣服卖掉，高价向农民买点吃的；有的人寻些野果野菜，或者抓些老鼠昆虫来吃；有的人趁机偷一点菜，如果被发

那可不得了,就有人因为偷一点菜被吊打致死的。一些管教干部,不但不为这些人提供维持生存最起码的口粮,还不许他们自己动手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甘肃日报社财贸组组长罗舒群,这时也在夹边沟劳动教养,一次,饥饿的他偷吃了一个胡萝卜,被批斗了一顿,还被关进了“严管班”。批斗会上,王景超没有发言,后来他们一次相遇的时候,王见旁边无人,竟很认真地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可敬的王景超,你怎么这样迂,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必须放弃一些过去的人生准则来适应一下这个太不正常的环境了。摩西十诫之一是不许偷盗,在这种情形之下偷点吃的,上帝也会允许的呀。你不信,可以去问上帝,他甚至会说他鼓励的哩。结果是罗舒群得以生还,而王景超却以36岁的壮年活活饿死了。和凤鸣可不像她丈夫这样迂。为了求生,她和石天爱、徐福莲合作,偷棉子、偷面粉弄来吃了。一个难友对她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话说得真好。和凤鸣把它记在书上,接着补充了一句:“应该说,威胁我们大家生存的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他们,为了生存,什么东西都找来吃,连从来没有出现在人类食谱中的东西都见到就吃了。你吃过贴标语用剩下的肮脏的浆糊吗?有人把一桶清漆误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抢着吃了,中毒死了两个人,更说明他们饥饿程度的,还不是他们吃了些什么,而是他们是怎样吃的。一些蔬果,例如萝卜胡萝卜之类,本来是可以生吃的,可是没有听说过牛肉也可以生吃的,而杜绍宇和一个难友方正儒一次在半夜里偷了农家的一头小牛犊,方正儒先生吃了牛脑,再分吃牛脊椎上的里脊肉,杜绍宇觉得鲜嫩非常,略带咸味,十分可口。和凤鸣、石天爱她们,也是把偷来的面粉拌到从伙房打来的饭菜中生吃的,煮熟吃怕被发现啊。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明用火是一大关键,使人类最终的脱离了动物界。而现在,这些右派分子们,放着火不用,倒退到和野兽共处的那个蒙昧时代了。

一批又一批的人饿得不能动弹了,于是把他们送到农场设立的“医院”中去。和凤鸣被派到“医院”去烧炕。她在书中说:“我没有见到医生进病房,也没见到给哪个病号吃药,病号们的真正需要是吃饭而不是吃药。”所谓“医院”,只不过是把那些饿得垂死的人集中起来等死罢了。在这

里,她每天都看见死亡,那个请她把炕烧得热一点年轻人,那个请她帮忙把满是虱子的绒裤晒一晒的老头……都一个接一个地死了。

这本书深刻的地方还在于它不是把右派分子和管教干部简单地当作两个对立的群体来写。在管教干部中,当然有不少比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的沙威更可怕的人,他们从肆意折磨那些落到他们手中的不幸者中找到乐趣,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饿死,累死。但她的书中也写了些颇有人性的人,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也给这些不幸者一些照顾。像安西十工农场的场长吴玉璋,副场长邹士杰,在大会上作起报告来,当然是声色俱厉,义愤填膺,但是具体到对待农场里的右派分子,却是很富有人情味的,想办法让他们吃得饱一些,过得好一些。就说在传达文件的时候,遇到说“地富反坏右”的地方,常常把这个“右”字省去不念。这使在场聆听的右派分子们多少感到了一点宽慰。和凤鸣在书中说:“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各种不堪忍受的厄运时,我常在心里默默地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曾经度过的好时光。在那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十工农场曾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它常引起我种种温馨的回忆。”

右派分子也并不是人群中的一个品牌,个个大同小异,他们之间的气质、德性等等,差别可大哩。特别是在那种不正常环境之下,人格全被扭曲了。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论监狱:把一些无辜者关在这里,折磨他们,并且使他们堕落。他说得多么中肯啊。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把一大批右派分子集中起来,用苦役和饥饿折磨他们,于是,也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堕落”!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右派分子为了表现自己欺负难友的事情。书中写了一个原来在公安厅工作的右派分子,表现积极,被委任为小队长,不过是劳教人员中的一个小头目吧。可是,“他自从当上了小队长后,自认为摘帽有望,原来的难友,在他的眼里便成为他表现自己的目标。他个子高大,相貌堂堂。这天,他看见了张汝云吃胡萝卜,便怒不可遏地走过去,拿起张汝云手中正在吃的胡萝卜,猛戳进张汝云的嘴里,并使劲把胡萝卜在张汝云的嘴里摇动,使张汝云的嘴里立即鲜血流出,血污沾得满嘴都是。”和凤鸣评论说:“半年多来,我的这些担任了小队长之类职务的同派,大部分人自认为得到领导的赏

识,摘帽有望,便不惜出卖灵魂,时时捉摸管教干部的意图,处处仿效,对原是难友的同派横眉怒目,由张口斥骂,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完全是一副为虎作伥的架势。此人在胡萝卜地里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例。”她还谈到自己身受的一件事:调到四工农场之后,管教干部要求他们相互之间经常揭发告状,石天爱原来和她相处不错,竟也去告她的密了。她说:“她肯定也是得到领导上的鼓励,也许还是有谁指名要她揭发我。这样,大家作生之挣扎,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作旷日持久的斗争……冷漠自私,成为人们为保护自己采取的最审慎的处世原则。我们的性格、心灵再一次被重新铸造……我们的灵魂都够肮脏的了,这里的一切已严重扭曲了我们原来正直纯净的灵魂。”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上接80页)论为终极真理,甚至将政治权威置于学术权威和科学权威之上,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研究的现象,已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其荒谬性时至今日仍未被充分认识。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学而优则仕”传统中的“学”,是服务于礼制秩序的道德哲学,其基本载体是所谓圣贤的“经典”(如“四书”、“五经”),学习的目标和至仕之途的衡量标准是对这些圣贤经典的熟悉程度,其必然后果是,正心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成为正流,被视为学问的正宗,与仕途经济无直接关系的自然研究被排斥在“学问”的范畴之外;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除了以阴阳五行加以附会臆说外,绝少认真地探索。两千余年的传统治学方式,就是“代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以所谓四书五经为立说根据,专事

冥想,不求实验。在整个古代社会以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发明中,除了一部分如四大发

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她是用整个生命来写这本书的。她说:“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认为我对人民对历史,尚可做出我特殊的奉献,这就是用笔墨把我经历了的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把我经历了的苦难的奋争,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以我独特的视角将它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我对人生的感悟,让苦难和奋争成为一笔精神财富警示后人,使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勿再重演。”

我们这些读者都感谢她写了这本书。感谢她为反右派斗争,为大跃进,为三年自然灾害留下了一部信史。至于说,要使这段沉重的历史不再重演,那就需要我们读者跟她一道努力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明)被改造后服务于统治秩序和实际生活外,绝大部分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得不到重视;自然研究则被视为不务正业。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科学家”如张衡、宋应星其实都不是以科学探索的成就为官府重视。直到清末,作为西方文明具体体现的铁路建设传入中国后,仍被当作破坏风水的怪物,受到上至官方下至百姓的敌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看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面对昔日同窗共读、衣锦还乡的官员同学,还往往不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在政府方面,对于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突出成就的学者,通常的做法往往授之以某个级别的官衔以示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清晰地看到“学而优则仕”传统的旧形,使人不得不惊叹于这个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及其于我民族心态和官场思维的巨大影响。(责任编辑 萧 徐)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回忆红二十八军一次未完成的长征

● 朱国栋

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继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之后,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开始实行新的战略转移,西征陕南找红二十五军。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处境考虑的。一是红二十八军长期同上级领导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大别山;二是敌军多于我军数十倍乃至百倍;三是无根据地,无后方,过去鄂豫皖有二十多个县的大片苏区,自遭第四、五次围剿后,完全丧失了。红军部队都被迫拉到敌占区打游击,物资供应、兵员来源、伤病员医治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如能找到红二十五军,我们部队能得到壮大和发展。但是,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如到陕南有多远路程,红二十五军是否还在陕南,与他们既无电报也无书信联系,对他们情况的了解,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分析。当看到敌人同徐海东部在陕南地区作战的报导时,我们就分析红二十五军应该在陕南,不管他们是否还在陕南,我们也要循踪追迹找到他们。

桃岭伏击敌受挫,准备西征始成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长期跟踪追击我军的敌人王牌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一九〇团,在皖西岳西县桃岭遭我军伏击,一举歼灭该团两个营。敌团长被击毙,俘敌4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十余挺,步枪400余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停下来整顿。其他各路清剿的敌人都忙于调整部署,准备更疯狂地对我军进行清剿。此时我军政委高敬亭,审时度势,抓住这个可贵的片刻同在霍山县黄尾河相会的中共皖西特委会书记徐成基率领的特委会机关和随同行动的246团的干部与红八十二师及手枪团的干部一起开会,研究讨论红二十八军实行战略转移去陕南找红二十五军以及特委会及246团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任务方针问题。

五月九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告别曾生死与共的皖西人民,从霍山县黄尾河镇悄然出发,踏上艰苦跋涉的西征路。与乡亲们依依难舍的指战员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西北挺进。经六安、霍邱、固始等县继续向西进发。在固始县的五尖山,遭敌一〇六师堵截,尾后的敌人一九五旅也跟着追击上来,敌九十六旅一九二团从右面围攻过来,敌人企图在五尖山会歼我军。我军乘夜色突围,急行军进到河南商城南面的赤城县游击区,同中共赤城县委会和商北游击大队会合。五月十五日,我军进到商城北面三里坪,与堵截的敌人,河南省保安一团激战,全歼敌一个营,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二万余发。随后部队进到罗山县杨万店,与阻击的敌人东北军一一二师六三六团激战,歼灭敌人第三营两个连,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万余发。5月中旬,在罗山县长岗乡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军政委高敬亭向道委会领导同志传达了皖西黄尾河会议的决定,将鄂东北

独立团和特务营部队,补充到红二十八军。这时红二十八军已达到二千五百余人,实力得到补充和增强。

深夜越过平汉路,打破敌人清剿梦

平汉铁路是敌人的一道天然而重要的封锁线,敌人虽然精心修筑了很多碉堡据点,但线路长,供我军选择的突破口很多。我们于五月二十三日夜,选择了从湖北礼山县杨平口附近敌人的一个薄弱点,惊险越过平汉铁路,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敌人在慌乱中加紧调兵遣将,敌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编为两个追剿支队,跟踪追击我军,同时骑六师和一〇五师骑兵团沿河南沁阳、唐河方向对我军进行探踪拦截,敌一二〇师五六团又往随县境内待机阻击我军。我军为进一步打乱敌人的清剿部署,越过铁路后,先向西面应山县前进,迷惑敌人,后又转向北面,向唐河、随县、桐柏、泌阳等县疾进,将尾追的敌人甩掉。五月二十八日晚,我军顺利到达沁阳县并在县东南五道岭西北的一个大庙及周围村庄宿营。当晚即进行动员和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出发通过沁阳至陕南地区的一道300多里的大平原进陕南。前卫部队、手枪团的便衣班及尖兵排,走出山口就撞上正面而来的敌人,刚一接火,双方都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此时,我军发现敌人后面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当即向从那方向过来的老百姓询问:“从那面过来的是什么军队?”老百姓回答是“奉军”,由于河南口音“奉、红”发音不清,我们把“奉”误听为“红”,以为是红军,立即向师政委方永乐汇报,方政委说根本不可能是红军。随即要手枪团便衣侦察班,迅速深入敌人后方,将情况侦察清楚,并命令部队撤退到后面山上去待命。敌人虽未向我军攻击,但不停地向我山上打炮,还有一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中午手枪团便衣侦察班回来汇报,称他们在敌人后方抓到一个俘虏兵,查明了敌人是奉军即东北军,有五个师,是从西安开过来的,专门来堵截我军的。

下午,军、师、团首长开会研究,确定部队行动的方针。认为前有敌人五个师堵截,后有敌人二十五路军独立旅跟踪追击,还按原来的路线西进已不可能,如果不改西进的方针,就要选择新

的路□线,但选新的路线,困难也很多,首先是我们没有熟悉这方面地理情况的人,也没有河南、陕西省的地图。这新路线怎么选得出来呢?于是将参谋处的作战、侦察、通讯参谋都找来,让他们在选择新路线上提意见,经过思索,他们都表示提不出好的意见,讨论研究持续了一个下午,没有结果。最后,军政委高敬亭作出决定,说:“如果选不出适当的新路线,我们也不能瞎闯,使部队遭受损失。我看现在暂时就不过去了,打回大别山,打我们的游击去!”军政委的话刚一落音,大家都一致表示同意。

杀回大别山打游击

傍晚部队集合,军政委高敬亭讲话指出,西进陕南找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人有五个师在前面阻截,不让我们过去,若强行通过,牺牲将很大,所以我们要改变计划,不去了,还是再打回大别山,打我们的游击去。当晚,部队急行军,绕开尾追的敌人独立五旅,进到随县固镇宿营做饭吃,接着到桐柏县以东二十多公里的淮河店,碰巧遇到了东北军,他们从信阳开过来的一支运送物资的骡马车辆大队。我们毫不客气缴获了骡马五十多匹及全部车辆物资,装备了自己。随后,部队继续东返,经桐柏山脚,新玉皇顶,到桐柏山东麓的桃花山分水岭。这里山高坡陡,很有利于打伏击战,于是决定在这里痛击尾追的敌独立五旅,打一场伏击战。我们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后,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就乖乖地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的炮火狠狠地射向敌人,敌人几次集中兵力妄图反扑,但都被我们打退。敌人伤亡惨重,计击毙敌200余人,击伤3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为我们回大别山送上一份厚礼,士气得到极大鼓舞。

接着,我军迅速通过桐柏、唐河、枣阳、信阳等县,于六月九日从信阳广水镇以北武胜关南面越过平汉铁路,进抵大别山的罗山县彭新店地区。在这里同分别一个多月的中共鄂东北道委会会合。部队在此短暂休息,军政委高敬亭召集道委干部开会,听取他们汇报和布置工作。并应道委会的要求,留下数名军政干部,重建鄂东北独

立团。至此,部队即向皖西进发。六月十三日,到达光山县南面王园宿营。此时,驻光山县、潢川县东北军的三个团向我军围攻上来,其中的一〇九师六二七团(仅一个营)在前面,直向王园我军驻地攻来。我军占据有利地形,与来犯敌人展开战斗,敌抵挡不住,惊慌撤退,我即趁势猛烈冲锋,手枪团则迂回到敌人后面,向溃退的敌人迎头痛击,顿时敌阵大乱,我军即大喊口号:“东北军的士兵兄弟们,快放下武器,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缴枪不杀,你们放下武器就受优待,给你们发路费回家……”正面的敌人,听到喊话,果然停止了抵抗,缴枪投降。共俘敌8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十八挺,步枪五百余支,毙敌50余人,敌六二七团团部及两个营被全部歼灭。我军伤亡30余人,我二四四团团政委张生先同志英勇牺牲。

当晚打扫完战场,处理好缴获的武器,将炮和重机枪以及多余的步枪全部炸毁后埋掉。然后处理俘虏兵,给他们吃好后,集中训话,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然后给每人发一元“袁大头”作路费,当晚就释放了他们。不少俘虏兵感动得流泪,说“今后再也不打红军”了。

这一仗打得好,消灭了东北军两个营,大杀了东北军的士气,提高了我军的军威,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为我军回师鄂豫皖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

部队次日拂晓出发,经过扶县进入到大别山腹地,经湖北麻城、罗田、英山、皖西、霍山、潜山等县抵达太湖县店前河地区,即与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率领的特委会及二四六团会合。此时,不期而至的豫东南赤城县委书记石裕田同志率领的赤城县委会和二路游击师也“游击”到了太湖店前河,三个部门欣然会合,欣喜异常,军、师领导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尤其是注意听取他们怎样打破敌人清剿计划的主要经验。随后,军、师领导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和经验;同时讲了红二十八军西征陕南找红二十五军受挫的情况,以及重要经验。军师领导说:我们没能实现到达陕南,找到红二十五军的目的,当然感到遗憾,但是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和经验。首先是在此次西征往返途中都是一路“过关斩将”,粉碎了敌军数十个团的围追堵截,还歼敌六个营计3000余人;二是部

队受到很大的锻炼,实践证明,我们部队是一支能拉得出去,打得赢,拖不垮,打不烂的军队。尤其是在过平汉铁路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有时还要夜行军,连续走150至160里路,很苦,很累,但没有人叫苦叫累;三是作战都很英勇顽强,在桐柏县桃花山分水岭的伏击战和光山县王园的反击战,都是打得很猛烈顽强,指战员都表现得英勇机智,奋不顾身,以极小的伤亡,换来较大的胜利;四是我军群众纪律严明,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我军所到之处一路上都非常重视宣传,发动群众,尤其到平汉路西,红军未曾到过的地区,宣传发动群众的效果很好,用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用行动粉碎了国民党说共产党、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面貌狰狞可怕”、“共产共妻”等无耻之言。加上我们的每个战士,不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调戏妇女,买卖公平,还把驻地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行动前为百姓挑满水缸,老乡逃走后,我们用了他的东西或吃了他们的小菜,把钱放在碗柜或灶台上等等严明的纪律,都教育启发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异口同声地称赞说:“红军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从来未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只是有一次部队到唐河县某地宿营,那天早晨,二四四团三营营部一理发员,严重破坏群众纪律,他强拿了老乡一双新布鞋,一位中年妇女紧跟在这个理发员后追着要鞋,不少老百姓围观看热闹。军首长看到后,问清情况,当场将这个理发员逮捕并就地枪毙,以挽回我军的政治影响。围观的老百姓议论纷纷,有的说:“活该,谁叫他拿人家的鞋呢”;有的说:“处理的太重了,为一双鞋死人,太过了,他娘老子把他养到20多岁不容易”;还有的埋怨那个跟着后面要鞋的农家妇女:“太不应该,一双布鞋,没什么了不起,结果害了人家一条命”。军领导指示我们宣传队,去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同时将死者的尸体埋葬好。此次西进,虽未达到预期目标,但部队在往返途中除战斗外都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群众工作,增强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望。

军领导就这次西进作战并联系过去作战的经验,高度概括为三条经验:一是“四打四不打”,即“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太

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作战指导原则。二为根据各部敌人的战斗力,装备好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战术策略,即“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武器装备)”。三为在作战形式上,以游击战为主。

回师鄂豫皖克敌致胜

红二十八军回师鄂豫皖边区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一是敌人又新增加了兵力,从云南、贵州调来一〇二师和一〇三师,总兵力一度达到56个团,外加鄂、豫、皖三个省的20多个保安团和数十县的保安队及地方民团,加大了“清剿”的力量;二是重新调整了“清剿”的部署,它以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担任全程跟踪追剿任务,二十一路军及一〇二师、一〇三师以及其他各部敌军,除负责分区划片驻剿、包围、堵截的任务,还配合协助各县保安队、地方民团在封锁区域之间建立封锁线,修碉堡,木栅栏等;三是在我便衣工作队及红军经常行动出没的地区,实行并村,把小村

庄合并成大村庄,并修筑围墙、炮楼,驻扎敌人,控制老百姓与便衣工作队和红军接触;四是加强保长、甲长制管治,实行户籍连坐法,如有一户通共,九户受株连。

针对敌人的清剿措施,我即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

首先是我主力部队,采取相对的集中与大分散的方针,看准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摧毁薄弱的敌人力量。在高度分散时,以营或连为单位,大胆插进敌占区开展活动,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踪影;二是积极发展便衣工作队,秘密教育争取群众,还把工作做到保长、地主、富农和民团、炮楼里面去,使他们成为两面政权人物,把红军伤病员安置到他们家治疗休养,还要他们帮助红军筹集一部分急需物资等。采取这些有力的措施,使红二十八军能在极其艰苦的困境中得以生存、战斗和发展,使革命红旗在鄂豫皖边区,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一直坚持到1937年秋同国民党谈判,实行国共合作,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东抗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资治文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管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江西出版集团共同主办
《资治文摘》月刊,16开全彩印刷
单册定价8.00元,全年定价96.00元
邮发代号80-366,国内刊号:CN11-5301/G2

省长部长想什么? 厅长局长说什么? 总裁经理干什么?
一册在手,全部都有!



现在及未来领导人、管理者的必读经典

《资治文摘》秉持《资治通鉴》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理想,围绕领导人与管理者的阅读需求,荟萃图书、期刊、报纸、网络中最适宜的书摘、文章、时评、资讯,打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读经典”。涵盖资讯、政经管理类、生活休闲类三大版块,主要内容涉及:“月度人物、高层动态、人事动态、图片新闻、焦点、民生、财经、管理、论坛、历史、生活、文化。”

《资治文摘》强调实用性与可读性,力争给读者提供多维度的思考空间,对于不同领域及层级的领导和管理精英均有裨益。

联系人:周青 高丽红 联系电话:010-65123806/65123855 E-mail: zq_626@hotmail.com gaolihonglu@163.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晓门内10号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 邮编:100005

我的大学母校—— 莫斯科航空学院

● 周 密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生活

1955年夏天，我结束了留苏预备班一年的学业后，赴苏联读大学。开始分配到基辅理工学院学构件制造。57年二年级读完时，正赶上专业调整，我被分到莫斯科航空学院五系（现三系）电气设备专业。开学前一个月赶到莫航报到才得知，转学生因专业变化，都要补足莫航科目的学时。一般人都转入二年级，我和从基辅一同转来的徐振渠同学不想留级，学校同意，但必须开学前补考并通过本专业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基础，其它科目（共七门）允许在三年级第一学期补完。这个条件虽然很严，但我俩决心一搏。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知道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花费相当于培养4—5个国内大学生，两人相互帮助鼓励，一定行。

于是我们请了三系三年级的高材生张志鸿同学帮我们补电工。张志鸿毕业后分到航天部二院总体部，也是技术尖子，做过某地空型号的总设计师，现在年届七十，仍在科技委工作，此乃后话。那时他每天给我们讲2—3个小时，我们自己看书复习。匆匆十几天过去，我和徐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老师家补考。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出了一张试卷。在客厅准备了二十多分钟，到里屋由他口试。纸上四个题，我只勉强算对了一半，老师又问了几个问题，我也没答好。老师说：“本来应该给你打两分的（不及格），但这样你就上不了三年级，所以给你个三分（及格），你先试读一个学期吧。”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徐的情况也不比我好，也是三分。

当时听说，苏联的大学，如果毕业时全部考

试成绩为五分，可获金质奖章。如果75%以上为五分，其余为四分，毕业证书上可盖有“学习优秀”的印章。我俩在基辅时学习都不错，二年级结束时，十九次考试中，我有十七个五分，两个四分。这下拿了个三分全完了！考完，老师还给我们一人一个苹果，真是一口也咽不下去，当时是手脚冰凉、浑身发软。我回到宿舍上床蒙头哭了一场，一天都没吃饭。人们说，人老了以后只记得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想不起“走麦城”了，但这次考试算是我这生最惨也是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三年级上学期是我念书以来最艰苦的半年。七门一、二年级的功课要考试或考查。为了补齐机械制图，有时一个人在学习室画一通宵。为了补齐金属工艺实习课，和那些一年级的学生在车间完成车工、磨工、铸工等作业。钳工作业是锉一把钢锯，徐是男同学，他干什么都比我快一些，早就交活了。我第一次没干完，第二次又去，在那充满机油味儿和嘈杂声的车间，一个人孤零零地锉呀锉，我的手那么没劲儿，觉得真是无望了，禁不住一面哭一面锉，鼻涕、眼泪一大把，那个样子一定很滑稽。被一个师傅看见了，他走过来，一声不吭，二话没说，拿过我的加工件，噌噌几下，就基本成形了。我再打打光，很快就交了活儿，当时我真恨不得跪下给这个师傅磕个头。

这个学期末，我们总算完成了全部补考，本学期的电工基础也都考了五分，老师很满意，我们也很高兴。我的体重也由54公斤降到49公斤，恢复了中学毕业时的体态。有人回忆，说我们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这话一点不过分，特别是在北方漫长的冬天，往往是早上七点多离开宿舍，天上还有星星。在学校大楼转一天，若最后一

节课常常是实验课)在六点以后结束,出校门时天已黑了,或月亮高挂在天上,或路灯下飘着闪亮的雪花。一个人疲倦和孤独地走向宿舍,最易勾起思乡之情,没有坚定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念,实在是很难熬的。

当时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人学得最好。有个别同学甚至在准备考试期间能给苏联同学上答疑课。我的上课笔记借给苏联同学用也是常有的事。我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向苏联派出了近9000名留学生,他们以“学习刻苦、品德高尚、热爱劳动、组织纪律性强”而享誉全苏。九十年代我多次重返原苏联,只要说起是五十年代在这里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无不受到热情友好的对待。同时,也接触了不少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其中不少是自费的,他们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与我们大相径庭,得到的评价也截然不同。俄国人常开玩笑地用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出口俄国的商品质量比喻两个时代留学生的质量。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怪中国学生,现在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奋斗的目标和我们当初不一样。

当然,现在年轻人中也不乏非常努力和学得相当好的,我们那时也有个别吊儿郎当、不努力学习被中途送回国的。而且,当年学习最优秀的同学,往往因为缺乏应对中国政治运动的经验,回国后遭遇坎坷,大都没有出人头地。

莫航的老师们

和中国大学老师相比,我个人现在的看法,苏联大学老师的专业基础面更宽一些,实践和动手能力强得多。

我最敬佩和喜欢的有三个老师。一个是给我打了三分的电工老师库柏良,亚美尼亚人,四十多岁。他讲课条理清晰,不说废话,考试时也要求你回答简要明确。另一个是四年级讲电传动的包里索夫,四五十岁,他曾到北京航空学院讲过课,所以常常用中国学生的刻苦用功来训诫那些上课不专心听的苏联同学。他说一次在北航上大课,后排一个同学的计算尺突然掉在地下,在安静的教室里“啪”的一声响把他都震了一下,可听课的一百多个中国学生没有一个回头看一眼

的。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和蔼可亲,就是走廊里碰到也必是笑容满面地打招呼。第三个是五年级教电气自动化的科涅夫,三十多岁,讲课分析透彻,一句多余的话不讲,一双灰色的眼睛从不扫视同学,而是看着教室的天花板上某个地方,表情严肃,少见笑容。五年级结束,1960年我回国实习前,他答应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并把他著的《半导体应用》书稿交给我,叫我先看看。还嘱咐:“过海关时收好,别叫我倒霉。”当时也没想到我们被留在国内参加工作。60年代初我在同事手中发现了这本书的中文本,老同志们说这是当时对晶体管应用分析得最清晰透彻的书。在图书馆很难借到,且都已被翻得破烂不堪。九十年代初我又回到莫航工作,库柏良和包里索夫已去世,科涅夫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仍在工作,担任306教研室主任,是搞机载电源的专家,参与或指导过好几种飞机上的二次电源设计工作。

莫航是1931年从包曼高工航空系独立出来的。苏联航空航天的创始人中,不少在莫航任教、进修或学习过。如导弹之父柯拉廖夫,飞机设计师依留申、雅可夫列夫等都曾在莫航担任过教研室主任;潜地导弹设计元老、现国家导弹中心的创始人马克耶夫,导弹控制系统设计元老、现自动仪表研究所的创始人别留金及其继任拉佩金,现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科波切夫等都是莫航的毕业生。翻开航空和航天系统所有设计局、研究所的历届正副总设计师名单,几乎都有莫航毕业生。莫航还出了三四个宇航员,后来成了某些部门领导。五六十年代中国派往莫航的留学生和进修生共有100位,回国后基本上都分配到了七机部和三机部(后来的航天部和航空部)。他们很快都成了技术骨干,若干年后,不少人做了技术领导,或成为各级设计师。

我的莫航同学

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后,莫航是较早与中国建立联系的高校之一。1991年4月,为纪念莫航60年校庆和参加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30周年的庆祝活动,莫航通过中国宇航协会邀请中国校友返校,航天部和北航合起来组织了一个30余人庞大的返校代表团,其中有五位莫航

校友：王壮（一系）、陈志贤（二系）、张明瑞（四系）、董世杰和我（三系）。第一次回到阔别31年的莫斯科和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回到那即熟悉又陌生的校园和宿舍，以及周围的街道环境，我们的兴奋激动之情自然是难于言表。组织接待工作几乎全都由我们这届（61届）的苏联同学承担，他们都是原来一系的，和王壮最熟，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几个原来并不认识的同届校友：阿列克、艾力克、托里亚、维加、尤里，等等，他们在我以后的工作中都给予了不少的帮助。在活动期间，通过这些老同学的关系，我们参观了宇航员培训中心、航天测控中心、“和平”号空间站总装厂等。这些单位的头头中，都有莫航毕业生，大都由他们接待，倍感亲切。是年秋天，通过这些老朋友的邀请和联系，我们研究所的考察团一行五人又一次访问了苏联。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等我再度去莫斯科时，那已是俄罗斯了。

1992年5月，航天部教育司派我（一院）和冷冰（五院）去莫航的中国进修生班工作，该班进修的内容是载人飞船技术，由各院抽调的中青年技术人员组成。进修班教室就设在六系（航天器设计系）展示大楼的二层。大楼约五六层高，中央大厅展示着不少苏联各个时期的导弹和运载器、东方号飞船、登月舱等，有的是做过例行试验后不能再飞行的模型产品，有的就是空间返回的实物，真正是一个航天博物馆，大厅两面环绕三层走廊、教室、办公室，艾力克是六系601教研室实验室主任，他工作的601教研室就在此楼三层。讲课人员基本是在各设计局工作过的莫航或包曼的老师。莫航现在的老师，大都出自本校，他们毕业后分配到设计局、研究所工作十几二十年，老了，又回到某个教研室任教。某些有特殊贡献的，同时兼任教研室主任。如当过柯来廖夫设计局总师（后名“能源联合体”）的米申院士，他1969年卸职后就回莫航办起六系，即从原一系中分出航天部分，自己是系主任兼601教研室主任（总体设计），直至前几年去世。九十年代初，他已年届八十，还来过中国几次。又如著名的“应用力学研究所（后名“转子”联合体）是以前院士库兹涅佐夫命名的，后者是原五系陀螺教研室主任，老头退了以后，还常回到莫航辅导工作，甚至仍然坐在过去那间老办公室里。我前面提到

的几位校友中，阿列克、维加、尤里都曾在不同的设计局工作过多年，都是他们专业中的优秀人才。

1992—1993年，尽管国内各类考察团蜂拥俄罗斯，大多参观之后没什么结果，公费旅游而已，但俄国方面对中国还抱有好感和希望，尤其是航天领域，中国也偶有些技术引进。我和冷冰常被国内来团拉去当义务翻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据说国内对我俩的工作还算满意。有一次回国碰到刘纪原部长，他说：“听说你俩干得不错，可是要注意安全啊！”人们说我忒胆大，其实我心中有数，对能推心置腹的人，坦诚相待，打开窗子说亮话比打官腔或藏藏掖掖拐弯抹角好得多。俄罗斯人一般都很直率，肚子里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心眼儿，这还正合了我的性格，不会客套，不会讲外交辞令，反而多了几个朋友，他们对我也常敞开肺腑，什么都讲，包括他们的家庭、苏联时期的历史、对时局的看法等等。

阿列克是我最“铁”的朋友，当年和王永志同一宿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1941年夏天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不久，他的父亲就牺牲了，阿列克当时还不到三岁。他的刚刚20出头的年轻母亲拿起枪奔赴战场，当了一名陆军战士，从士兵升到军官，得过勋章，直到战争结束，1968年去世。阿列克念书时就学习优秀，毕业后分到设计局工作了25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强度专家。1991年秋我们所考察团去苏联，主要通过他帮了我的忙。九十年代他到中国工作了近一年。

艾力克是王壮大学时的挚友，当时这两位常在一起的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就十分引人注目。艾力克毕业后留校工作，他妻子与我同系同届，也是一位控制方面的专家，在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工作。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国内有些团想去他们展厅参观，我都找他，每次他都亲自办手续、亲自讲解。我也受国内单位委托，通过他介绍过几位专家到中国讲学，反映都不错。艾力克办事认真负责，做人实在。办不到的事他绝不肯允，能办的，他一定尽力而为。今年一月我偶然听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介绍这个展厅，听到艾力克那熟悉的、有点嘶哑的嗓门讲了约3-4分钟，我倍感亲切。

尤里是一名弹道计算专家，格鲁吉亚人。他

专业精通,对人十分诚恳,九十年代初他回家了一趟,回来我问他情况,他沮丧地说:“从来没那么糟糕过!”他的同学、同事有各个民族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亲疏也不以民族来分,现在搞成这样,他和父母兄弟及不少亲友成了两个不友好的国家的公民,其伤心可想而知。2001年我去莫航,听说他已离开莫斯科到欧洲什么国家工作了,真可惜。

在培训班常因工作和我争执的托里亚,是诚心诚意希望学员们学到更多东西的,他与我和冷冰的私交都不错,我们也去过他家,吃过他家花园中的草莓,又香又甜,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草莓。2001年我去莫航见到他,已病得叫我几乎认不出来。这些老师们,几乎都同时身兼两处工作,压力很大。托里亚家中只有老母、妻子和一个正念书的儿子,全靠他供养。前不久得知他去世,没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十分难过。

有几个朋友是有“中国情结”的,例如维加和柯里亚。601教研室的维加,是我在1990年北航交流会上认识的第一批朋友之一,他父亲原是克里姆林宫保安队的一名中校,1957年奉命负责中国代表团中毛主席和宋庆龄的安全,家中至今留有合影和不少纪念品。他本人有点爱吹牛,讲话随便得很,来过几次中国,对我们十分友好而无保留。2001年我去莫斯科还上维加家作客,他很想到中国工作1-2年,可惜事情没办成。前不久得知他也去世,十分难过。

强度实验室的柯里亚,是我去找阿列克时认识的。他父亲在20年代内战时期是著名的布琼尼骑兵师团的军官,这个师团下属还有个中国旅,所以他父亲认识不少中国人,还会讲几句中国话。1938年斯大林搞军队大清洗时,把布琼尼师团连级以上军官几乎全部枪毙或流放,只留了布琼尼。他父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儿结识了随父亲流放的一位姑娘,就是柯里亚的妈妈。柯里亚1939年生,人长得干瘦,身体不太好,这与他从小受苦有关系。苏共20大以后,父亲平反,柯里亚才有可能进莫航学习,毕业后分到工厂,最后在莫航强度实验室叶落归根。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一谈到中国,就很兴奋,和我一聊起

来就没个完,对中国这几十年来历史,什么长征、抗日、文革、“四人帮”等等,比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道得还多。我俩说,六十年代初中国反赫鲁晓夫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他最感激老赫的时光,老赫给不少人平了反,还盖了一些居民住宅。老百姓都是很讲实惠的。我从他那儿还学了不少俄罗斯的历史,偶尔在一些工程师朋友们面前卖弄一番,还真能唬唬人。可惜1993年夏天培训班结束后,我再没见过他,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活着。

我用这么多笔墨介绍了几位朋友,因为我觉得,凡为我国航天事业做了贡献的外国人,就不应该忘记。上面我只列举了几位与我相熟的莫航校友,实际上,原苏联对我们有过帮助的老一代航天专家多得是。当然,我们更愿意赞美自己,强调“自力更生、没有外援”;“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等等,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觉得承认别人的帮助与评介自己的成果一点也不矛盾。日本人向国外学习的先进技术不比我们少,谁也不会否认日本民族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他们本身的聪明才智。

事实上,我们培训班出来的十几位中国年轻专家,这几年都很有出息,就拿航天部一院派出的三位学员说吧,现在已是副院长、某重要型号的总师、某研究所的副所长。看着这些已步入中年的“年轻人”,我们心中也深感欣慰。中国航天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面也有我的母校——莫航的一份功劳。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1925年： 加拉罕清华演讲引起的风波

● 金富军

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覆亡。次年,民国成立,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是为清华大学前身。早期清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周有很多演讲,邀请国内外各行各业名人来校演讲,借以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1925年4月,清华学校曾邀请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来校演讲。由于加拉罕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外交官,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苏俄的背景下,这次演讲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加拉罕其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俄甫一成立,各帝国主义国家即采取联合干涉行动,企图将苏俄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列宁领导下,苏俄挺过了艰难时期,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并在外交上打开了新局面。

1923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全权代表前来中国,同北京政府继续举行建交谈判。派出如此高级别的外交官,显示了苏俄对中俄关系的重视。

加拉罕是亚美尼亚人,本姓加拉罕尼扬,全名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1889年2月2日出生于第比利斯。早年积极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曾两次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并负责东方司的工作,是苏俄政府中有名的“东方通”。

中国人对加拉罕并不陌生。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说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亦称加拉罕第一次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

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其内容是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1923年9月4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这三次宣言,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外交截然不同,明确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一切侵略利益,赢得了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的好感,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加拉罕作为苏俄政府代表,连续发表对华宣言,其声名也随之在国内广为传布。

加拉罕来华后,受到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收到了大量民间团体、工、商、学界的贺信,擅长外交的加拉罕也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各界,为他在华使命做大量宣传。对于加拉罕的各种外交活动,作为苏俄对手的英、美、日等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与密切关注。

清华演讲

受清华学校邀请,加拉罕于1925年4月21日晚8点,在清华对三四百名师生发表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也有报道题作《苏俄与东方民族》)的演讲,简要阐述苏俄外交政策要点及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区别。加拉罕用俄文演讲,由俄文专修馆教习译为中文。

加拉罕指出,苏俄的内政制度及外交政策,均由列宁创造。列宁详审世界政策发展历程,根据苏俄国内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合国情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创立了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的使命是联合被压迫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加拉罕指出:“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已常引用,中

国革命的人民,用以代表各种压迫侵袭掠夺之意义,诚属恰当。近日中国进步分子,莫不以争自由除恶魔为目的,若能了解何为帝国主义及其侵入之形式,可愈有成功之望矣。”他又指出:“帝国主义乃一种经济制度的现象,资本主义已成弩末,进一步即入于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不能长久,社会主义继之而起,从而创造出新的时代,新时代第一页即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之成功,非仅表示被压迫之工农阶级之胜利,非仅表示前俄帝国中被压迫民族之成功,更表示此及世界被压迫民族争自由之发端。”这些内容基本上与当时苏俄国内的理论相一致。

据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一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国内。但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并不大。到2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帝国主义被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而逐渐为人熟知,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系统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1925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如火如荼时期,也是“帝国主义”被国内各界认识并接受的时期。加拉罕所宣讲的,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一页即为苏维埃共和国,演讲结尾称:“苏维埃政府对东方各国及中国所持之政策,皆一本其友善之态度”,明显具有宣传色彩。

演讲中,加拉罕还称赞清华学校现在的教育方针,是提取外人特长之点,而予学生在国内有明白本国情形的机会,这是极好的。”这种评论符合清华的实际特点,但以点睛手法托出他人的优点,也显示出一位外交家广交朋友、善结人缘的干练。

舆论风波

当时的清华学校虽属外交部管辖,但相关重大事宜,最后还得听从美国驻华大使馆。或许是顾及到清华本身在这种隶属关系中的特殊性,加拉罕在言语之间对帝国主义更多的是分析,而不是激烈的批判,所以清华学生亦认为前次加使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线分明的国际形势中是不多见的。

尽管如此,由于加拉罕本人的特殊身份与清华的特殊背景,这次演讲还是引起了很多关注。4月23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清华之过激主义》,称:“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清华为美国赔款所设立,美政府既不承认苏俄,当根本不承认其

所持之主义,更不容其主义之宣传于清华。清华学生,皆专心求学,预备留美,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美之权利云云。”

对《泰晤士报》的无礼指责,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依据实际情况,立即致函力驳其非,指出:“清华学校之目的,在求完美的教育,在造就眼光远大、判断力强之人才。清华学生,年龄虽不甚大,然对于种种思想之优劣,皆能切实判别。故不论俄使所讲之正当与否,适宜与否,清华学生各人皆能作精审之考虑,以判别其价值。且清华邀请各方面人才演讲,以明白现今世界思想之潮流,加拉罕演讲,不过千次中之一次耳,与学生学业,决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可毋庸顾虑。”况且,加拉罕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因此《泰晤士报》的指责,“诚出人意料之外也!”言下之意,对方大惊小怪,实在是毫无由头。

但是《泰晤士报》并不理会清华的反驳,仍固执己见,认为美国政府并未承认苏俄政府的合法性,清华不应该邀请加拉罕来校演讲,更不应该听任过激主义宣传于清华。意思无非是,清华由美国退款开办,理所应当与美国保持一致。

面对《泰晤士报》的再次指责,曹云祥校长、谭唐教授复函批驳。谭唐即George H. Danton,此人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员,哈佛大学德文导师,巴特勒大学德文教授,纽约大学交换教授等职。1916-1928年在清华教授德文。谭、曹信中强调,清华乃中国之学校,独立办学,以养成适用中国之人才为宗旨。美国不承认苏俄,那是美国政府的事情。中国既然已经承认苏俄,则清华邀请苏俄驻华大使来校演讲自然是中国内部事情,不属于国家问题。曹云祥信中还指出,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仅是现代文化班的一种副课,其目的在比较当今各国政治问题,苏俄问题不过其中之一而已《泰晤士报》的反应未免小题大做。

《泰晤士报》对这次演讲的无礼指责,在社会上招致了不小风波,也引起了美国大使馆的注意。使馆向清华提出质问,希望了解此事。曹云祥校长向董事会详细汇报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董事会又向美使馆汇报。美国使馆可能觉得无需大惊小怪,没有再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加拉罕的这次清华演讲,本来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演讲,一经《泰晤士报》聒噪,立刻变成一桩牵涉中、苏、美的国际性事件,其中固然有新闻报道为追求轰动效果而刻意夸大、故意渲染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内政不能自主、教育不能独立的窘况。(责任编辑 赵友慈)

说文解字话和谐

● 《羊城晚报》记者 雷鸣 通讯员 谭举正 王瑾

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广东省委全会审议通过了实施意见。为了让广东的老干部更好地理解中央和省委的精神,11月21日至23日,广东省委老干部局和本报联合组织了省级老领导,在梅州召开专题座谈会。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毕德博士作了辅导报告。三天的座谈,老领导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说文解字话“和谐” 中央决策很周全

原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林若首先对和谐进行了妙解:“‘谐’字由‘言’和‘皆’组成,意思就是人人都有发言权。‘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靠民主、靠制度、靠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着重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应从这方面入手。”

原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宗春也有一番高论:“和,左边是禾苗、庄稼,右边是口,指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意为大家都敢说话。人人都有饭吃,都可以说话,这样很好。现在中央的决策,我认为很正确,想得很周全。”

广纳良言听意见 党内和谐是根本

原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方苞在座谈会上头一个发言:“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今后四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指导原则。”

林若,这位曾为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过突

出贡献的老省委书记,先回顾历史,又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提出了精辟见解:“要构建和谐社会,我的理解就是对存在的社会问题要采取和谐的办法来解决。和谐就是讲理、论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林若话锋一转:“再者,现在既然是实行市场经济,允许各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存在,就应该理解和允许各种不同经济成分所产生的思想存在,并通过和谐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统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原广东省顾委主任、老红军寇庆延双眼几近失明,但心里依然亮堂:“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内要和谐,只有党内和谐了,干部和谐了,人民群众内部也就和谐了。”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肖耀堂则提出搭建三大平台,建立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体制,才能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一是社会平台,强调效益又要大体平衡,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的突出问题。二是政府平台,要强调和体现公平,要解决好再分配问题。当前尤其要解决好公共产品的布局和公共财政的透明度问题。三是富人平台,又叫慈善平台,搭建起来让富人出钱救灾济困,发展慈善事业。让财富分配更加合理,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清除腐败才和谐 监督要走法制化

说起民主与法制建设、反腐问题,老同志的话也特别多。王骏深切地回忆说,中央曾要求广东人大先走一步,当立法、实施监督的试验田,当好排头兵。历届广东人大也是按中央的要求兢兢业业地工作。”广东经济发展迅(下转第35页)

谁的红色 何来经典

● 张 鸣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

像又不在话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责任编辑 萧 徐)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中国农民 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15.00	5.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39.80	7.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唐山大地震	钱 钢	28.00	6.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尹家民	69.80	8.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	李海文整理	25.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凤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	朱厚泽	150.00	8.00
渔光曲——安娥作词歌曲集	钟立民	18.00	5.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我国变乱百余年来,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李宗仁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作者以海外留学生常见的两种行为——刷盘子和读书来比喻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两种模式。前者是以出卖简单劳动,以GDP速度为目标的模式,后者是以出卖知识和技术,以技术力提高为目标的模式,在本书中,作者严肃地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坚信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西方工业化的进程,研究了落后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追赶路径,通过中日两国工业化发展的比较,使读者看到了工业化和国家政经体制的紧密联系,并总结出简单而深刻的强国之道:民族责任、长远眼光、科学精神。

本书将会引起关注中国经济和民族命运的人们的思考……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学而优则仕”

传统之说过

● 张绪山

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化进程中,许多东西被作为“传统”保留下来,演化为国人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仕”作为这样的“传统”之一,既是一种有形的习惯,又是一种无形的信仰。这种传统支配中国人的生活观念达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我民族社会政治的影响可谓深远且巨大。

“学而优则仕”一语,出自《论语·子张篇》,原作:“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本意,各家注释不尽相同。有人解作“做事有空闲时应该学习,学习有空闲时应该做事”,将“仕”训为“做事”。但我们知道,主张入世的儒家的根本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子夏所谓“做事”显然不可能脱离这个根本前提。况且,不管子夏的本意如何,两千余年以来的事实是,“学而优则仕”是作为以学至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逾的。在中国传统中,“仕”的概念从未超出“仕途经济”这个范畴。

子夏强调“仕而优则学”,将它置于“学而优则仕”之前,似乎说明在孔子及其弟子辈的时代,“学而优则仕”就已经是很流行的习俗或传统了,所以子夏要反其道而行之,以矫正时弊。但历史演化的轨迹是,子夏刻意强调的“仕而优则学”似乎完全被后人忘记了,而“学而优则仕”则印进了所有士子的脑海,浸入了血液。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作为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问与孔子那高墙万仞,不得其门而入无以窥其美的学问相比,无疑不可同日

而语,但就历史影响而论,子夏的这句“学而优则仕”却丝毫不逊色于孔子的任何教诲。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首先,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典成为士子为学的主要内容。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虽然中国历史上对旧王朝发难、完成王朝更迭者,大多是刘邦式的无赖之徒,但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管理国家的任务几乎毫无例外地重新归于文吏之手。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承认“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训诫,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得源于此。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并非没有文化心理依据。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垢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而在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而优则仕传统有关。两千年来士子们秉持以学问介入世事的信念,直到近代的“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新文化运动,乃至丁文江辈以科学家之资历鼓吹“好人政府”,其脉络仍然清晰可见。

“学优而仕”传统对中国吏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重要特点：它对全社会所有等级的开放。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慨叹，反映的是一代雄主对天下英雄为我所用的得意之情。“学优而仕”传统鼓励士子接受科举制度，将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士子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官僚机构中，成为传统宗法专制制度下吸收人才最有效的途径。这种选才制度，对于以门第血统为依据的唯亲任用制度，及包含极大偏私之嫌的“举孝廉”制度，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尽管“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还有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可鄙且滑稽的血统论沉渣泛起，但“学优而仕”传统下的文吏选拔制度的有效性是无法根本动摇的。

其次，传统社会在本质上是等级社会，其等级结构是很难打破的，但中国社会等级制度与印度式种姓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等级的个人可从“学优而仕”的途径上改变个人的等级地位。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完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改变自己的等级命运。虽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命运的大喜剧只发生在极少数的幸运儿身上，但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存在，足以使众多有才华的穷人子弟得到相应的官位，因此读书人抱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信念，头悬梁，锥刺股，发奋苦读，也有很多得遂其愿的机会。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种姓制度那般僵死。

第三，“学而优则仕”传统绵延两千余年而为中国社会所有等级接受，还在于它确立了一个超越各等级而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原则：学问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但各等级一视同仁地享受“学优而仕”的权利，却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现世之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人人

平等”的宗教观念中获得基本的“平等”意识；对于本质上不信教的中国民众来说，“学优而仕”传统则可以使他们享受到以“学优”而至仕”的平等。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而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虽然上帝权威之下的“平等权”施于所有信众，使皇帝（或国王）与一般信众成为平等之“人”；而“学优而仕”是以皇权至尊为前提，所谓“平等”不过是做皇帝奴才的“平等”，而且仅仅及于为学的士子。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达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士子英雄，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另一方面，进入附庸罗网的士子们也成为专制君主轻慢、侮辱乃至虐杀的对象。这类事例在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如刘邦动辄对士吏自称“尔翁”（用今天的话即“你老子我”），会见士吏多以戏侮为乐，取其冠以为尿器，或者傲慢地一边让女人洗脚一边会见士吏。在主仆伦理之下，士子的任何独立意志，在帝王那里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夺取皇帝宝座后，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原因是孟子反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主张君臣关系的契约式依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与西方中世纪知识人遭受教会迫害不同，中国文人往往成为专制君主淫威的牺牲品。士子以文（或以言）致祸的事例不绝于史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大景观。从秦代的

“焚书坑儒”，到满清王朝的大兴文字狱，以至几十年前全民族的知识人被集体诱入“阳谋”而几被一网打尽，似乎都可以从“学优而仕”传统造就的专制君主的“封主”心态得到解释。

其次，“学而优则仕”传统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以“仕途”的飞黄腾达作为“为学”成功的标志，于是对“学优”的追求转化为对仕途经济的追求。由于至仕之途费尽千辛万苦，成功之后必得报偿方为心甘，所以“升官发财”遂成为士子耗尽心力的永恒追求。这追求中，“升官”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升官才有可能掌握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才有可能“发财”。于是，“巴结逢迎、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精于‘厚黑’之术”，成为官场上必须具备的本领，官场之道成为倾轧和整人术的代名词。

更重要的是，士子个人仕途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读书人个人的前途命运，也攸关家族的兴衰成败。供养子弟读书成为每个家族的头等大事，最大的投资，所以规劝子弟刻苦读书成为整个家族成年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之类俯拾即是“劝儿语”，遂成为千载流传的民众最熟悉的教子格言。在整个家族所寄予的改变现状的重望之下，“升官发财”演化为士子们的永恒追求。受此动机支配，仕途得意的士子要成为两袖清风的廉吏，真是难乎其难。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官场通例。官场上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就只有归隐田园，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这就理解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上，何以老百姓对“青天”的期盼犹如大旱之望云霓，呼唤之声响彻云霄，但“青天大老爷”终是千载之下难得一见的“稀有之物”，因为“学优而仕”的目标就是“升官发财”，不发财岂不有违初衷？

对于“学优而仕”的妙用，历代关心政治的人都是一清二楚。孔夫子骂问稼穡的学生樊须为“小人”，是因为这小子似乎不明白在孔子看来很浅显的道理：只要做了官就有“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宋真宗赵恒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

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更将读书至仕成功带来的一切美好前景（包括食、居、婚、行一切方面）赤裸裸地勾画出来。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以来的所谓“学问崇拜”，其实是对“荣华富贵”的向往，绝不是真正的学问崇拜。在“学而优则仕”传统中，如果有人读读书是为了求知，简直就是痴人之语，会让人笑破肚皮。

因此，“学而优则仕”传统使读书人丧失了两个最重要的人格品质：一是读书人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二是“为学”应有的形而上学的不懈追求；“学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应有之义成为不可能之事。它与古希腊形而上的爱智传统之间差别不啻天壤。在古希腊传统中，为发财而追求知识是愚蠢而可耻的想法。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柏拉图听后让人给这个学生几个钱让他赶紧滚蛋，原因是这样的人根本不了解求学的目的，也不配成为学者。这种传统在千载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再次复活，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而在中华大地上1905年的废除科举之制，曾使许多士子惶惶不可终日。

再次，“学而优则仕”传统虽然承认各等级士子的“平等”参与权，但官僚政治的等级结构使成功“入仕”的士子的最终归位却是等级性的，仕途的升迁成为衡量“学优”的标准，因此，“官大”也就意味着“学优”“；官大学问大”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近代以前学问范围有限，“官大学问大”大致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负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自信“不为浮云遮望眼”的王安石，以及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张之洞，都是历史上官高学问也好的显例。但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各种学问已成“分科之学”，任何一门学问都足以使一个人耗尽毕生精力而难以窥其全貌。政治家（包括创立了所谓理论体系的政治家）除了在其专精的政治学及其政治实践方面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之外，在其他领域都不具备任何知识优越性；他的理论不可能是统领一切、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官大学问大”是至为显然的谬论。但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将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科学权威，以政治权威的“绩”（下转64页）

海峡两岸学者聚会台湾

共同研讨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辅仁大学、南华大学、东吴大学等主办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四次学术研讨会，11月11日至17日在台湾举行。来自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100多名学者共聚一堂，以【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进行交流和探讨。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与民族凝聚力、中华文化与两岸四地的和平发展等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两岸学者不同历史背景及文化条件的对话，促进了两岸学术界的相互了解，达到文化交流及创新、融合的目的。各地学者向大会提交了有关中华文化方方面面的论文62篇。与会学者大都是在中华文化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学者，学术层次和论文质量高，规模大，是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

(王志光)



中華文化與當代價值學術研討會 2006.11.11~17·台北·輔仁大學

与会学者合影于台湾辅仁大学



研讨会主席台



研讨会分会场



台湾辅仁大学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赠书



与会学者在台湾佛光山合影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7年第**1**期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

我的大学母校 —— 莫斯科航空学院

1975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读和凤鸣著《经历 —— 我的1957年》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1 >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